

編 輯 說 明

為了配合當前在全國範圍內逐步開展着的以階級鬥爭、階級教育為中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們編選、出版了這本家史集。

收在這個集子里的作品，大都在最近國內的一些報刊上發表過，也有未曾發表的。它們都在不同的角度上反映和揭示了過去的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的真理，說明了各行業和各民族的勞動者的生活道路都有兩段——一段是黃連鋪成的，一段是蜂蜜寫成的。

不忘昔日苦，方知今日甜。沒有體驗過階級壓迫的生活、沒有參加過階級鬥爭的新的一代，對於過去那種交織着血淚和鬥爭的時代了解得不多，或是了解得還不够真切；對於今天革命已取得重大勝利而階級鬥爭還在繼續，而且還將貫穿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也同樣了解得不多或還不够真切。我們希望，集子在這些方面能對讀者們起一些作用。

不能忘記過去，不能忘記階級鬥爭。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永遠保持警惕，使我們能克服、抵制和防止資本主

义思想的影响和侵蝕，并懂得为什么要更加热爱今天和未来，增强我們投身在新的战斗中的决心和信心，从而更加努力和勤奋地为建設我們繁荣、富强的偉大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編选、出版这类作品，对于我们來說，还是一件新的工作，缺点在所难免，我們热切地期待着各地讀者和作者們的指正。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963年11月

目 录

- 含泪闖关东 王宗昌 (1)
王生家史 張朴 (12)
多少血泪多少恨 聞方 (66)
南阳湖上一家人 張云升 (78)
路 陈浪 朱礼生 (90)
我被卖过七次 范惠珍 (101)
- 我真有千言万語要向毛主席傾吐 蔡金龙 (109)
沒有名字的燒盐工人 李累之光 (118)
表的故事 陈国霖 (159)
永远不能忘記的历史 魯德水 (165)
紡織女工話今昔 王緒生 (176)
我的學徒生活 应德全 (189)
- 在一場民族糾紛的圈套下 劉廷貴 (194)
他沒有等到这一天 李乔 (202)
永远跟着党 克坡 (213)

- 老貧农的話 覺 非 (220)
- 春風吹拂換人間 华羅庚 (232)
- 一个乡村教师的遭遇 叶泮芹 (238)
- 苦难的回忆 李筠秋 (245)
- 科学工作者的苦和甜 黃耀曾 (252)
- 旧恨 承 志 (259)

含泪闖关东

——吉林省撫松縣東崗公社社員王宗昌家史

我家住在撫松縣東崗人民公社。可是，我并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在萬惡的旧社會里，我家經歷了三十多年流離失所的生活，最後才在這裡定居下來。

我的老家是山東省莒縣相邸村。關於很遠以前的事，我記不清楚了，聽我娘說，只知道我的祖父辛勤勞動了一輩子，沒有給我父親（王秀祖）留下一塊地。我父親還是起早貪黑地耕種着從地主那裡租來的几亩薄地。遇上好年景，秋後剩下的糧食，合糠摻菜才能吃上十個月。因此年年都要向地主稟糧借貸。

有一年，山東莒縣春旱夏澇，糧食顆粒無收。地主老財們看我家年年欠糧欠債，誰也再不肯借給點糧食。逼得我爹出外作短工，我娘左手抱着我兩歲的姐姐，右手領着我五歲的姐姐，四處要飯。窮人家都是一樣的缺吃少穿，她只有到地主老財家去討點殘粥剩飯。吝嗇的地主老財，連整張煎餅都不肯給，他們把一張張煎餅切成碎塊，要等討飯的人哀求半天才出來扔給一块。以後，連煎餅渣渣也不給了，他們一見我娘迈過門坎，就連聲吆喝：

“快走吧！沒東西給你們啦！”

靠要來的飯怎麼能養家活口？不到一年，我那多病的祖母就死去了。連口棺材也買不起，我爹就用家里僅有的一領炕席，把奶奶卷起來，發喪出去。我爹是個烈性漢子，他一回到家里，就對我娘說：“這裡沒咱窮人的活路了，凭你五尺高的漢子怎麼拚命，也混不出吃穿！”他越說越氣，憤怒地把鍋拔下摔個粉碎，說：“今天挑灶，闖關東去！”

七吊老錢闖關東

闖關東，也得有點路費呀！可是，那時我們東湊西湊，只有能買十個燒餅的七吊老錢，够什麼用？家中值錢的東西，一件都沒有；若到地主老財那里去借，等於自投羅網。因為，欠債又欠糧，尚未償還，一說要走，他必送官究辦。我爹一跺腳，把我的兩個姐姐裝在筐里，一头一個挑了起來說，“七吊老錢，也闖關東！”就這樣，他領着一家人離開了老家——山東省莒縣相鄒村，本着一線希望，到關外去找一條生路。那時正是一九一二年的春天。

因為沒錢，不能坐車。我那小腳的娘，好像是離家越遠希望就越大似的，每天都忍痛走上五六十里路。

因為沒錢，不能進飯鋪。我那剛強的爹，也不得不跟我娘一块兒向人討要，請人家可怜孩子，施舍點吃的。

因為沒錢，店棧都不准登門。到晚上，我爹和我娘摟着我兩個姐姐，不是睡在店棧門口，就是宿在荒山破廟。

有时，为了赶路，错过了村庄，他们就露宿在路旁、河边、桥下、山洞子里。……风吹雨淋，从来没有睡过一宿好觉。

他们就这样，忍饥挨饿，沿途乞讨，一步一步地走了整整一年，才走到山海关。

出关之后，我爹逢人就问：“穷人到哪个地方能过得下去？”问来问去，很多人都说奉天（沈阳）一带不错。可是，没想到刚走近奉天城郊就惹了一肚子气。那天，我的两个姐姐饿的直哭，爹和娘决定不再赶路，想给他们讨点吃的。他们来到一个财主的大院。可是，刚迈进门槛，迎面就站出一个管事的骂道：“出去！东家大门，是你們臭叫花子进的！”我娘说：“俺是逃荒的，你可怜可怜孩子，一天多没吃饭了。”那家伙说：“不行，东家吩咐过了，不能让你们进来。”我娘继续求他说：“你行行好吧……”这时上房门开了，走出一个挺着肚子的大胖子，指着管事的说：“少废话，把狗放出去！”只听管事的呼喊一声，突然窜出两条大黑狗，张牙舞爪的扑过来。吓的娘和姐姐大声惊叫，我爹急忙护着她们跑出门外，可是他自己的两条褲腿却已经被撕破，鲜血流了出来。我爹咬牙切齿地说：“这里财主太恶了，放狗伤人。走，去告他一状！”一位过路的赵老伯走过来劝道：“爷們，忍着吧。这儿没有說理的地方，沒錢你告不倒他。”我娘也说：“別惹人家啦，走吧！”可是往哪儿走呢？已經快走出半个中国了，也没见着个能落脚的地方。好心的赵老伯把我們領到家吃了一顿饱饭，并告訴我爹說：“通化那儿地多人少，日子好混，你們就到那

儿去試試吧。”爹和娘謝过他，就奔通化去了。

越逃越荒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我家到了通化孤磧子村，正好是离开山东老家三年整。这三年，我爹領着一家大小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难，真是一言难尽。爹和娘商量一下，都不想再走了，就在孤磧子村落了脚，租了姓孙的地主的地。当时讲妥，秋后打下粮食，两家对半分。头一年赶上好年景，加上精耕細作，打下粮食除了交租，剛够一年吃的。可是第二年，地主把地租定死了，不管年景好坏，收多收少，一律按第一年交租的数量收租子。我爹明知道答应不得，可孤磧子村都是姓孙的地，不种他的又种谁的呢？好歹干吧！結果是一年不如一年，天不是旱，就是澇，年年都是交了租子就沒了吃的。沒法儿，我爹只得把地退了。

一九一九年春，我家搬到通化小龙爪沟屯。在这里，我家又租了刘和亮的两垧山地，年租六石。头三年还对付能过活，到了第四年，剛鏟完头遍地，就下了一場冰雹，紧接着又遭了一場大風，秋后歉收。狠心的地主怕我們交不上租，在打場时，就派人守着把剛打下的粮食拉走了。爹一看，这里也活不下去，又把家搬到月牙泡村，租种一家姓王的地主的地。过了三年，生活照样混不下去，就又在一九二六年的冬天，离开通化，逃到了撫松县。

我家来到撫松县的刁窝砬子村借宿时，被一个外号叫姜聾子的地主知道了，他三番五次的找我爹，劝我們住下来，給他种地。他答应租子一定收的低，还借給咱粮食吃。第二天又領我爹去看了地，他花言巧語地說：“这可是三垧好地，土质肥，保險长好庄稼；我只收你八石地租。”当时大雪盖地，沒法看土质，也沒有实际丈量，我爹就信以为实的答应下来。等到冰雪融化以后，去看看，全是沙崗子地。爹忙去找姜聾子，誰知这家伙眼睛一立楞，要賴說：“当初讲的就是这块地，想变卦呀！”我爹說：“不降租子这地俺就不种了！”他奸笑着說：“不种？沒那么方便，不种也得拿租子！要不咱們就进城打官司！”我爹当时一核計：沒錢打官司，上哪儿贏去；再說，不种他的地，到別处也不容易。于是，就忍气吞声的种上了。泥一把，汗一把的弄到秋后，只收了七石粮食，还不够交租子。当时村里一些穷哥們見事不公，就推选出一位老农民崔兆德出面求情，恳求姜聾子減減租子。可是他一边抽着大烟一边說：“春天讲妥，两相情願的，要不他能种嗎？”崔兆德說：“年景不好，你就可怜可怜他这逃荒人吧。”姜聾子眼珠一翻說：“你給添上点，他就交上租子了！”崔兆德說：“我也不寬裕。”他說：“我手头也紧啊，正需錢买大烟呢！”好說歹說，由崔兆德担保，两年后才还清了这笔冤枉賬！

到关外落戶以后这十几年中，我家吃尽了苦头。我爹漸漸地明白过来：自个儿沒地，走到哪，也得受欺侮。打这，他打定主意：要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山野岭上給自个儿

开出一块地来。

第二年冬天，我三叔王秀成也因生活所迫，由山东老家逃到我們这儿来了。为了躲开地主老財，我爹和他商量之后，决意到老林子里开荒。我家就迁移到距三道庙岭村四里路远的前膛子山林里，全家动手盖了两间地壇子，住下来。因为沒錢买鞋，又沒有东西自己作，我爹和三叔俩人，冬天就用点破布包脚，在冰天雪地的大林子里放树，春天就光着脚刨树根，打弄土。流血流汗地开出了一块多地，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到底有了自己的地了！沒料想春天下种时，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个騎馬的人，身上都带着枪。他們从馬背上一跳下来，就橫眉瞪眼的指着我爹問：“你們問過誰，竟敢在这隨便开荒？”我爹說：“这个沟坡子沒主。”一个长着长胡子、穿着緞子馬褂的胖子奸笑着說：“沒主？这是什么？”說着拿出一張紙來递给我爹。我爹虽说一个大字不識，可是看看那上面一方豆腐块大小的血紅印，也就明白了。这时，一个家伙上前來說：“全三道庙岭的山林土地都包給我們張掌柜的了，誰人不知？”我爹見勢問道：“地已經开出来，可怎么办好？”大胡子哈哈大笑，說：“我張平之向来仗义疏財，公平处事。既然你們已經把生荒开成熟地，就自管种好了，七年之内不要你一粒粮食一文錢，你看如何？”我爹不知这里边的鬼把戏，以为这个張掌柜当真是心慈面軟，便向他再三道謝。

自古以来，就找不出一个地主不喝穷人的血的，怎么独有他張平之与人两样？后来弄明白了：这个地区由于

地勢高，氣溫低，新開墾的土地發涼，頭幾年莊稼長不上來，第五、六年土質才變暖，第七年才能發揮地力。儘管這樣，爹和三叔並沒有灰心，他們精耕細作，很快地改變了土質，第四年就獲得了好收成。因為不交租子，咱家頭一年糧食够吃了。

誰知，第五年開春，張大胡子的外柜來找我爹說：“張掌櫃的生意不好，外賬又多，從今年開始四六收租子。”三叔說：“當初講妥七年后交租，現在不能變。”那個外柜將臉一沉說：“空口無凭，拿字據來！”我爹一算，四六租子太重，懇求他：“租子重，減一減吧。”他不耐煩的說：“掌櫃的吩咐，不干就收地！”就這樣，張大胡子凭着那張“隔山照”，沒費吹灰之力就把爹和三叔一滴血、一滴汗費了四年功夫開出來的三垧多地奪了過去，賣給了另一個地主，賺了一筆好錢！

正是種地的時候，地沒了！沒有辦法，我們又搬到東崗村高麗堡子屯。全家動手又在大林子邊上蓋起了兩間地壻子，住下了。可是，這裡的山林土地也都是歸几戶大地主所有，他們手里也都有象張大胡子那樣的“隔山照”。找不到沒“主”的地方，爹和三叔便在大地主尹禿子尹启山的林子里開垦了三垧多地。我那年十四歲，就給尹禿子放牛，當半拉子。

我的三叔王秀成，剛家破人亡來到關外時，還是身強力壯的紅臉大漢。可是，經過這幾年的勞累，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終於積勞成疾，起不來炕了。為了給他治病，

我爹向財主房伍先拾了五十元印子錢（利息一加一），当年秋天沒有还上，就欠上一百元。第二年秋又沒还上，利滾利，变为二百元了。狠心的財主見我們第三年秋也还不上債，就硬把我娘喂养的一口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赶走了；这还不算，又将我家收获的所有谷草（四千多斤）全部拉走，算是頂上了債。这件事，給我正在生病的三叔打击很重，这年腊月，病就更加重了。那时山沟里沒有一个治病先生，也买不着药。人們有病不是拔罐就是扎針放大塞（將血管里的血放出一些）；实在严重了，才把病人送到县城，因为去一趟县城非常不容易（須穿过一百多里路的老林子）。三叔說啥也不让找人把他抬到县城医治，他說：“再欠下債，就是好了也掙不出利息錢。”就这样，沒过几天，我那沒儿沒女的三叔，年仅四十岁就离开了人間。爹和娘忍着极大的悲痛，将他埋葬在长白山下深山老林里。

俗話說，禍不單行。三叔死了不久，轉过年我五岁的小妹妹也得急病死了。全家人的眼泪还未擦干，第三天，十岁的弟弟王宗祥在林子里放猪时又昏倒了。等抱回家来，他两眼发直，光吐黃水。爹和娘觉得救人要紧，想再借点印子錢，明天好把他送到县城去。誰知当天晚上，他喊着“爹呀，娘啊，救救我吧……別让我放猪、挨打……”喊着喊着，就閉上眼睛，断气了……

不到两个月，穷和病夺去了我家三口人的生命。

一災剛过，一禍又來：日本鬼子打来了。从此，更大的灾难臨头了。万恶的日本强盜，为了割斷山区人民同

抗日聯軍的联系，施行了并屯政策。

一天下晌，日本守备队来到屯子里，不容分說，就把我家房子給点着了，全家人冒着濃烟烈火，好不容易才搶出一点东西。万万沒有想到，就在这天晚上，又来了一股如狼似虎的土匪，乘火打劫，我們的淚泪还没干呀，他們又搶走了我家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破烂衣裳。真是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无可奈何，只得在一九三四年冬天，搬到县城。

經過这一連串的打击，我爹就成天愁眉苦臉，茶不思，飯不想。他盘算着再离开撫松逃向別处，可是走南闖北三十多年已經使他明白过来：农民逃到什么地方，也不会得到一寸土地；天下老鴟一般黑，天下的地主老財都是一样的吸血鬼！我爹王秀祖一回想起他五十多年的經歷，一回想起死去的亲人，就忍不住要伤心落泪。沒过半年，他就一病不起了。我清清楚楚記得，他病危那天上午，我去离咱家不到一里路远的福兴大药房請先生的情景：我哀告半天，一个姓張的先生，跟我走出大門站住了，他左右瞧瞧，对我說：“你走吧，我有要紧事，等会再去。”說完轉身进屋，坐在那里喝着茶水，和別人談天說地。我又求他：“先生，走吧。”他却不耐煩的說：“着什么急，再过一个钟头吧！”柜台旁边的人偷偷地告訴我：“快雇辆馬車来，他就去了。”天哪！原来是沒有馬車接，他就不去。那陣我还不太懂事，一气之下，心想：你不去，我还不用你呢！可是等我回家一看我爹心疼的滿炕翻滾的痛苦样子，沒法儿，还得再跑回福兴大药房找那个先

生去。“俺家就在大南門外，离这很近，”我恳求着对他說，“你快去救救俺爹吧。”我苦苦哀告了好一陣，才把他請家去了。他給我爹看了看脉，說：“打一針，还有救。可是，得先交十元錢。”我娘說：“俺也沒有十元錢哪。”他一听说沒錢，就立刻鎖上药包說：“沒錢可不能打針！”我在一边忙說：“你給打針吧，俺就去借。”可是他拿起药包，沉着臉說：“沒錢找我看什么病！”說着就走了。过了还不到一个时辰，我爹就捂着肚子死去了。可怜他五十九年的一生里，豁出筋骨，卖命干活，沒有过过一天溫飽的日子，到死沒有賺得一块葬身之地。

从此，我就靠打柴換錢，养活老母亲。在八年的風雨不悞的打柴生活中，由于时飽时饥，我得了严重的胃病。体力不行，靠打柴不能維持生活了，我又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搬到东崗村，在地主陶元德的西小山开垦土地。我带着病，吃不飽穿不暖，拚命干了一冬又一春，开出了二垧三亩地，可是我又因此得了支气管喘息病。沒办法，我娘又挎筐提棍挨門乞討，不久就也得了病，一到冬春就咳嗽个沒了。我娘时常叨念：“这苦日子多啱能熬出头来呀？”

苦 尽 甜 来

好容易又过了三年貧困生活。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穷人的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晴天一声霹雷响，領導穷人翻身的救星共产党来了。以后，村上成立了农民会，

我当上了民兵，拿起枪杆子，斗倒了地主。我在西小山亲手开的地也还了家。我和娘到地里去埋完木桩子，也不知是喜欢还是悲痛，娘俩哭了起来。土改的第二年，村农会帮助我盖了三间新房子。一九四七年，我三十岁才成了家。

在党的教导和培养下，我在一九五〇年春，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公社一成立，生产队因为我身体多病，不让我干重活，社员们选我当了仓库保管员。我总是想办法多干些能干的活，多做些劳动日，因此，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娘常对我说：“在早那日子象地狱一样，诉不完的苦。如今这生活象天堂一般，说不尽的甜！”

如今，我已有了四个孩子。大小子今年高小就毕业，闺女在念三年级，小三也进学门了。这一代人，是在幸福生活中长大的。他们再也不会象我们过去那样为苦日子操心，再也不会拿起小鞭子给地主放猪放牛，再也不用挎篮提棍挨门讨饭。每逢我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欢欢乐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一想起过去，就使我更爱今天的新社会，干劲也更大了。我心里想：一定好好干，把咱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让子孙代代过好日子。

赵文臣执笔
中共撫松县委三史编写小组整理

王生家史

——《建明公社紀事》家史之一

張朴

舊社會，有錢的地主立家譜，為的是“光宗耀祖”。新社會，我們要為受苦的窮人寫家譜。窮苦人的家譜分兩段，一段是黃連鋪成的路，一段是蜂蜜寫成的書。

昨天

——昨天是黑夜漫漫

在河北省遵化縣建明公社，誰都知道王生要了二十四年飯，他是二十三戶“窮棒子”的苦頭頭。王生怎樣苦？有人說：他的苦處象山澗的流水，彎弯曲曲說不到頭。王生怎樣窮？有人說：他窮得象荒山河灘的一塊石，全身光溜溜，啥也沒有。在舊社會，人們說窮是王生的命，苦是王生的身，窮苦纏着王生家四代人。

三条活命

王生的祖父叫王玉，是个受苦的庄稼人。所生三男一女，王生的父亲王风山排行第二。全家十口人过生活，日子虽然困苦，倒也过得去。到了光緒二十一年，剛交头伏，天下起連阴雨，一連四十七天沒开晴。山洪暴发了，庄稼冲跑了，河滩里的大水翻着白花，村里的茅屋漏的漏倒的倒。受苦的穷人藏沒处藏，躲无处躲，做工沒人雇，討飯沒人給。王玉老汉家十口人病倒了七口。旧話說：“穷人生病閻王討債”，糊口尚且不行，哪有錢来治病。就这样，七个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一場天灾家破人亡，只剩下王玉老汉和两个儿子三条活命。

父儿仨忍饥挨餓，熬过了殘冬，盼来了春天。山坡上露出了野草，树枝上钻出了綠芽。王玉老汉决心要重整家園。父子們打短工、做零活，白天上山割草，夜晚在村拾糞。終黑天沒白日地苦扒苦曳。

这一天，本村地主王家老掌柜的，看見王玉老汉家的糞堆，心眼里乐了。他慢悠悠走进王玉老汉家，这看看，那瞧瞧，对王玉老汉說：

“王玉呀，你們家这么多的糞肥，不想租点地种嗎？”

土是庄稼人的根，地是庄稼人的命，王玉老汉早就有租地的念头，只是担心家里太穷，沒人租給。今几个老掌

柜一說租地，他心里通地一跳，可又一轉念說：

“想是想呀，可誰又租給咱？”

“那好說呀，”老掌柜嘿嘿地笑着，“亲不亲老乡亲。”說着他的眼圍着王玉老汉的院子东張張西看看。“我租給你一点吧。”

“真的，老掌柜？”王玉老汉赶紧問。

“我什么时候說过玩笑話！可就是……”老掌柜更仔細打量着院里的东西，“你拿什么作抵押呢？”

王玉老汉一下子泄了气，他垂下头，蹲在院子里，說：“是呀，要錢沒錢，要东西沒东西，还是租不起呀！”

老掌柜嘿嘿一笑，两眼盯着王玉老汉的三間茅屋，說：“咱們乡里乡亲，好說話。用你这三間房子作抵押吧！”

王玉老汉突然抬起头来，两眼直呆呆地看着茅屋，說不出一句話來。

老掌柜說：“这也是咱們这一带的老規章，租地总得押点东西。其实，你不願意也就算啦，房子是你的，地是我的，两不相干。”他看着那堆糞肥点着头說：“可惜这堆好东西！”一面說，迈开方步子向門外走去。

王玉老汉突然站起身來說：“地，我租下了！”

只因为租下了地主的地，三条活命又葬送了两条。王玉老汉过日子的心胜，决定让两个儿子在家經營租来的土地，自己給地主去当长工。

这一年，秋庄稼快熟的时候，地主怕穷人偷庄稼，让

王玉老汉睡在地里看守。这一带常常闹土匪，王玉老汉总是战战兢兢的。这一天，天刚摸黑，王玉老汉在窝铺里升起一堆柴火，烧他那当晚饭吃的两个窝头，这时山头上忽然响起枪来，有人喊道：“土匪来了！”王玉老汉钻出窝铺撒腿就跑。跑了一程，忽然想起自己的被子还在窝铺里。一条被子对于穷人来说，可非同小可。他拚着性命又奔回窝铺，这时柴火已经把窝铺烧着，他心里一急，一头扎进窝铺，窝铺倒塌了，把王玉老汉压在下面。他抱着被子，挣扎着钻出来，就昏迷过去。直到第二天下午，东家不见他回来取饭，打发人一看，原来他被火烧得躺在地里，才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王玉老汉回到家里，昏昏迷迷躺了几个月，他舍不得叫儿子拿一个钱为他治伤。临死的时候，他还对儿子们说：“地是根，没有地……就会死在……财主……手里……”话没说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

这一年王生已经八岁。爷爷王玉死后，日子更加困难。这一年赶上夏旱，热风吹得天像个干锅一样，几十天没下一个雨点。租种地主家的沙滩地，正好种的打瓜，瓜秧被太阳晒焦了，王生父亲的脸色也象是晒焦了似的。他不怕辛苦，又赶种上了晚豆子。幸好赶上了一场小雨，豆子出来了；可是到了阴历八月初，又下了一场早霜，豆子被打死了。辛辛苦苦的一年劳动落了一场空。王生父亲正焦虑一家人的生活，地主又来收租。地里颗粒未收，哪

有糧食交租。就这样，地主收了地，又把王生家的四間茅屋（后来又接了一間）頂了租子。王生父亲一气之下，得了氣結病，臥床二年就死去了。

兩个苦命人

王生的父亲死后，家里的全部財產，除了发送父亲，一无所剩。当父亲入土之后，母亲哭着說：

“孩子們，你媽沒有能耐，再也养活不起你們了，你們各自逃命去吧。”

全家抱头痛哭，难舍難離。

王生給地主打活掙一点錢，帮助母亲养活两个弟弟。这一年王生整二十岁，个子虽然不高，长得却象个铁打的汉子，再加上他为人忠厚，少言寡語，干活牢靠，不怕受苦，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有些人常和他开玩笑說：

“王生，二十岁的大人了，該成家立业娶媳妇了。”

王生有时笑笑，有时就回答一句：“誰肯把閨女往火坑里送。”

天下真有这样奇巧的事，正当人們这样开玩笑的时候，有一个姓樊的“花子”，願意把閨女送給王生作媳妇。人們笑着說：“这可真是門当戶对。”是呀，除了王生这样的人，誰又願意討要飯吃的閨女作媳妇呢。

常言說：不爱金，不爱銀，穷爱穷心內亲。樊家的閨

女是个有心人，一定要亲眼看看王生。王生剃了剃头，洗了洗脚，走进一座破庙里去相亲。樊家的姑娘一見王生，看了看头，瞅了瞅脚，把头一低，打心眼里喜欢上他。可是王生头不敢抬，眼不敢看，活象个泥胎站在那里。樊家的姑娘心里想：

“你說句話呀！只要你說句話，我就跟着你走，就是天邊海緣我也不怕，只要是离开这人罵狗咬的日子。”

王生心里想：

“只要你不嫌我穷，我保險对你好，就是把我这身力气使尽了，也让你受不了屈。”

姑娘心里想：

“怎么他不說話？莫非是个哑巴？”

王生心里想：

“一切都由你决定，你說中就成，你說不中咱就走。”

姑娘实在憋不住了，心內着急，可一个姑娘家又不好問什么，只好說：“你老站着干啥？坐下吧。”

王生說：“庄稼人站慣啦，不累。”

就这样一句話，这門亲事就定了。

王生要結婚了。有錢人結婚有酒席，有鼓乐，有洞房。王生結婚連个住处也找不到。難道說新婚夫妇还象花子似的去住破庙？樊家的姑娘堅決反对，她說：“我住破庙住了十几年，从嘎啦一声住到这么大，結婚出門子——人家都說这是人生大事，就不能換個地方嗎？”說

着滾下泪來。王生想來想去，忽然想起西鋪西头有个大車店，王生夫妇就在这个大車店里入了洞房。

按王生当时的說法是，人不該死总有救。过了些日子，东鋪的地主要找个看院場的，院場里有一間破茅屋，茅屋的草頂实在是太破烂了，地主答应只要院場看得好，轉年給換一个新草頂。王生夫妇就搬进这間破茅屋。誰知道，這間破茅屋就成了王生全家悲慘生活的开端，就成了二十四年討要生活、一件一件血泪史的“見证人”。

王生夫妇尽心尽力地替地主看院場，出力卖命地为地主干活，可是換屋頂的事地主再也不提起。一年、二年过去了，王生夫妇生下第一个孩子，头顶上还是那堆破烂草。王生夫妇又生下第二个孩子，那正是阴历五月間，刮着急風下着暴雨，屋頂漏着水，有的地方眼看着往下塌，王生用树枝棍子頂住架住，可是風越刮越大，雨越下越急，闪电雷雨震得茅屋直搖晃。忽然，有一块屋頂塌下来，風雨一下子扑进茅屋，王生的大儿子哭叫着，王生急忙抱着茅草去堵窟窿，雨水、泥土、烂草順着王生的头顶滾下来，烂草泥水糊住了他的眼睛，……

一場暴風雨躲过了，第二天，王生的眼睛肿起来。他以为閑一两天就会过去，誰知道越閑越厉害。想治治沒有錢，地主却催着上工，孩子老婆又需要人伺候，王生心里火燒火燎地着急。眼睛越肿越厉害，直閑了一个多月，才漸漸地消下肿来。王生睜开眼睛一看，啊！天地怎么变了

样？到处是一片昏暗，看不见南山，看不见树木；只听见鸟叫，看不见鸟飞；河里的流水哗啦响，看不见河水往哪边流。他伸手揉了揉眼，用力把眼睛睁大，可是什么也看不见。“难道？难道……”他不敢想下去，一屁股坐在地上，闭起眼睛，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切心事都涌上心头：上有老母，兄弟年幼，下有老婆，孩子更小，都需要他养活。他不能瞎！他不相信自己会瞎，站起身来，磕磕绊绊地奔到河滩，摸到小河旁，他捧起水来洗呀洗呀，直洗得眼睛发酸，睁开眼睛一看，眼前还是一片昏暗。山在哪？树在哪？村在哪？河在哪？他分辨不清楚。王生一下倒在河里。从此，这个铁打金不换的汉子，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

王生瞎了眼睛，全家哭得象泪人儿。母亲可怜儿子，就拉起棍子，带着两个兄弟沿村讨要起来。这五十多岁的老人，怎么经得起这跋山涉水，东村跑西庄奔，人骂狗咬，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整天价唉声叹气，泪水洗面。有人见她可怜，就劝说她：“趁着不算太老，往前走一步吧，也救救两个孩子的命。”起初，王生母亲听了这话只是摇摇头，当作耳旁风。后来日子长了，眼看着儿子的眼睛没有指望，再不愿意给儿子添更多的烦恼，年纪又一天比一天老了，讨要也一天比一天难啦，就起了嫁人的念头；可是一想起另归别姓，心里就象刀搅。这一天，王生的母亲奔跑一天，没要到一点东西，小儿子哭着叫着喊饿，王生

媽心一橫，就把王生叫到面前說：

“孩子，不是媽心狠，是媽的命不好。世界上千條道，萬條道，哪條道媽也走不通。別怨恨媽，媽知道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們，可老天要媽這樣作，媽又有啥办法？将来死在九泉，你能在爸面前替媽說句話，证实一下媽的心，就算媽沒有白養活你一場。媽……要……”

王生媽再也說不下去。

王生跪在媽面前哭着說：

“只要媽不走，儿子就討着要着也要讓媽吃飽……。”

媽低下头，再也沒有說什么。

活，活不成！死，死不得！

媽媽改嫁，媳妇生病，孩子要吃，家里无粮。几根绳把王生的心絞得象条麻花。无奈何只有自己拉起棍子去討要。可是一想，自己乍瞎失明，路不平，脚无根，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庄在哪方？門在何处？如何要法？左思右想，愁思千万，无路可走。忽然儿子跑來說：“爸，我領你去打水。”這句話提醒了王生，要是让儿子坐在自己肩上，他的眼我的腿，不是可以出去討要嗎？儿子听说和爸出門，高兴得跳起来；王生却不觉落下泪来，心想：“小孩家，怎知道这样出門的难处！”父儿俩拉着棍子走出庄来。碰到高崗，儿子就喊上坡，碰到坑洼石头，儿子就喊繞路。就

这样，走村串庄，东西要的倒是不少，直到日平西，儿子要回家，王生也結記家里的病人，就肩起儿子奔家走来。一天奔波，儿子劳累了，坐在父亲肩上直打瞌睡。王生不見兒子說話，以为是路好。可是觉得脚下坑坑坷坷不平，剛想問兒子，脚下一空，父儿俩順着陡坡栽下去。儿子大声地哭叫，王生双手和磕膝盖流着血，父儿俩抱在一起痛哭起来。王生心里想，“天呀，你叫人怎么活下去！人到了这一步，不如死了好。”可是孩子一面哭一面喊：

“爸爸回家，想媽媽。”

王生心如刀絞，只好爬起来拉着孩子奔了家。

儿子再也不願意跟王生出門討要，一家人只好餓肚腸。

这一天，天下着小雪，到了中午一家四口还水米沒沾牙。大人还可忍耐，孩子却不停地哭叫。正在这个时候，要飯的老徐珍搖搖晃晃地走进門来。老徐珍也是靠討要過活的，这几天臥病在床，今天实在忍受不住饥饿，才勉強爬起来。他問明了王生家为什么哭叫，叹口气，搖搖头說：

“唉！一样的命呀。好，我也正想出門要口吃，我領着你，你扶着我，一块去吧！”

雪已經把山路蓋住，北風卷着雪絲在山坳里尖叫旋轉，山路凜滑，行人稀少，在灰蒙蒙白茫茫的山路上，只走着一老一瞎两个要飯的。

常言說，下雪要飯最不是時候，有的人家關門閉戶，圍爐取暖；就是不關門閉戶的，任你再喊再叫，他也不肯冒着風寒給你送出一點東西來。老徐珍領着王生奔走了一天，只要到几口冷湯，几把豬食。肚內無食，身上寒冷，北風越刮，大雪越下。眼看着天氣漸漸地灰暗下來，老徐珍搖搖頭說：

“看來，今個這根腸子又得閑起來。好，這近處有個破廟，我領你去過夜。”

兩個人進破廟，覺得比外面暖和多了。老徐珍哈哈手，把廟門關上，怕風吹開，搬過供桌來頂上門，兩個人背靠着供桌坐下，誰也不說話。過了一會，老徐珍因為由冷乍暖，突然咳嗽起來，王生趕緊給他捶背。一陣咳嗽过后，兩個人又默默地坐起來。忽然王生叹了口气，心想：老婆孩子不知這一天是怎麼過去的？老徐珍好象看見王生心事似的，就對他說：

“睡吧，別瞎想啦，老天給咱窮人安排的就是這樣的命。”

飢餓燒腸，千思萬慮，加上身上越來越冷——才進來時那點溫暖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怎麼能睡得着！老徐珍又咳嗽起來，王生不斷地為他捶着。老徐珍喘過一口氣來說：

“既然睡不着，咱爷兒倆說一會話吧。”

“中！”王生急忙答應着。可是心里想，有什么話好

說呢？

老徐珍說：

“我小時常聽奶奶說，南山有個仙人會種葫蘆，葫蘆種在最高的山頂上，每天日頭出來第一個照見它，葫蘆要長一百零九天，要用一百零九眼泉水來澆它，少一眼也不行。仙人養着一對金鵠子，每天夜間，下山含水澆葫蘆。澆到一百零九天上，不要等日頭出來，就要把葫蘆摘下來，這個葫蘆就成了寶葫蘆，要什麼只要一拍它，就來什麼……”

“大爺，你說這個干什么？”王生奇怪地問。

“孩子，你不知道，”老徐珍停了一下說，“今個白天咱們路過燒餅鋪的時候，你可沒能看見那油炸的麻花，我已經三十年沒吃过那玩藝了，要是有個寶葫蘆，能要個麻花來吃吃，我就是死了，也心滿意足了。”

王生心里一陣難過，趕緊說：

“大爺，明天咱想法去买一個麻花。你干什么老說死呢？”

“不，孩子，我是吃不上麻花了！”說着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王生趕緊替他捶背。老徐珍繼續說：“聽說死了比活着好混，不用吃東西。不過還得穿衣服，還得要有錢，听说三十六道鬼門關，關關給錢才能過得去……”

奔跑了一天，王生不知跌了多少跟斗，已經够勞累的了，雖然身上寒冷，可還是漸漸睡去了。等他醒來，天已

經亮了。他觉得身上有个东西，一摸是老徐珍的破棉袄。再摸摸徐珍，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渾身冰涼，早已經死了多时啦。王生哭着从村里喊了人来。村里人問明了徐珍家里沒人，就对王生說：“你走吧，我們把他埋掉。”王生一定要等着埋了再走，村里人怕他再死在这里，两个人架着把他送出村去。

王生一路走着，徐珍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徐珍的話老在他耳旁响，好象这些話句句是在說他，将来他老了就是徐珍这样下場。想到这里不覺渾身打了一个冷战，直觉得天轉地旋，心內一陣酸痛。他忘了朝哪个方向走，也忘了走的是什么样的路，磕磕绊绊，高一步低一脚，忽然脚下一滑，整个身子直栽下去，咚的一声，被水嗆了一口。他急忙抓撓着爬起来，用手摸了摸，有溜腰深的水，周圍是圓的磚牆，他这才明白是掉在井里。他大声喊着：“救命呀！有人掉到井里啦！”喊了几声不見有人来。他慢慢地靠在井边上想：“喊人干啥呢？这不是死的好机会嗎，把头一扎，人不知鬼不覺地就完了。”他剛要把头扎下去，忽然想起老婆孩子：“我死了，他們怎么办呢？誰來照管他們？他們怎么活下去？不能死，为了孩子，說什么也不能死！”他抬起头，大声喊着：“救命呀！救命呀，有人掉到井里啦！”他一面喊，一面圍着井帮轉，用手摸索着，想找到一点什么东西攀登上去。可是井帮上长滿鮮苔，非常光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他喊得筋疲力尽了，就站下来休息。水浸湿了他全身的衣裳，阵阵冷风由井口吹来，冻得他瑟瑟打战。他心里想：“完啦，看来今天是非死在井里不行了！”这样一想反倒安心起来。觉得这样死了倒对得起孩子們，他自己叨叨念念地说：

“孩子們，孩他媽，別怨我，不是我心狠，抛下你們不管，是我命該如此。以后你們怎么活下去，全靠你們自己啦，一百斤的担子，你們自己去担吧！”說到这里，泪珠刷刷地滾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傳来了脚步声，咚地一声，两只筲筒頓在井台上，王生急忙喊：

“救命吧，有人掉到水里啦！”

“你是什么人？”是一个年輕人的声音。

“要飯吃的！”

“要飯吃的沒长眼，为什么单往井里掉？”

“我是瞎子，看不見。”

“瞎要飯的，你把整个井都弄髒了，还叫人救你！”說着担起筲筒走了。

王生急忙喊：“行行好，救救命吧！”

可是脚步声越来越远，已經听不見了。

王生一陣心酸，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过了一会，又来了几个人，他們系下一只筐，把王生拉上去。一到上边，北風一吹，王生渾身的衣服馬上冻得

硬梆梆，象铁板一样，冻得他得打战。这时候那个年輕人站在旁边大声对王生喊道：

“你个臭要飯的，把整个井都弄髒了，你不給掏井你走不了！”

一个老汉对年轻的人說：

“也不能怪他，他是个瞎子，願意自个儿掉在井里？”

“你們都是一类貨！臭要飯的。”

老汉急忙把王生扶到自己家里，一进家門，老汉啐了一口，罵道：

“有錢的崽子，說話也不怕缺德！”

老汉生上一盆火，让王生烤着衣裳，又問他吃了飯沒有，王生說：

“不吃啦，哪还有心火！”

老汉給王生端来一碗高粱米饭，澆了一点热水，让他吃。王生吃了一点饭，觉得身上暖和一点，衣裳也烤干了，就趴在地上給老汉磕了个头，說：

“你老人家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老汉急忙拉着他說：

“別說这话，我也要过饭，唉！这要饭——受罪、挨罵，一句話，比死了强点。別說了，你赶紧回家吧。”

老汉把王生送到村外，指给他路，王生又再三謝过老汉，就顺着山路走下去。

离开猪狗生活，过着牛馬日子

一九三五年，大汉奸殷汝耕把冀东二十二个县出卖給日本帝国主义。隨着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开始，日本人的軍帽、皮鞋和刺刀也來到遵化县一带。人們到处傳說着，八路軍中有个叫老包的（当时冀東軍区的副司令員包森同志），帶着一支神兵，到处打击日本鬼子和偽治安軍，吓得鬼子和治安軍修起崗樓，蹲在窝里准备挨打。

四十里鋪也來了八路軍，收了地主王維平的枪，王維平全家老小收拾东西夾着尾巴，跑到遵化城里去了。

这一天，王生出門討飯，被偽治安軍捉住，硬說他是八路軍的探子，把他打得死去活來。王生渾身血糊淋漓地闖進家門，一头扎在炕上。老婆問他是怎么回事，他只說了一句話：

“不打走鬼子汉奸，連飯也要不成了。”

王生在家养伤，老婆帶着孩子出門討要；在閭屯村小儿子又被地主家的狗咬傷，娘儿俩哭哭啼啼轉回村来。村里人們看着他們娘儿俩可怜，就紛紛地議論起來：

“看，这媳妇年輕輕的多可怜！”

“是呀，跟着瞎子要飯吃，还不如自己走个主呢。”

这时候有个叫王興的走过来，对王生媳妇說：

“这样兵荒馬亂的年头，怎么能要着东西，还不如找

地方侍候侍候人，混碗飽飯吃。”

王生媳妇叹口气，說：

“哪有那样地方，就是有，人家也不願要咱这要飯吃的。”

“遵化城里有，就怕你不去。”

“能帶孩子嗎？”王生媳妇是离不开孩子的，再說，帶出孩子，就帶去一張嘴。

王兴想了想說：

“帶一个孩子，白吃飯，不掙錢。你回家跟王生商量商量。”

晚上，王生媳妇把這話一說，王生想了想，叹口气說：“你們娘儿俩逃活命去吧！”

王生媳妇来到遵化城里，王兴把她領到一家。进门一看，原来是四十里鋪地主王維平家。王維平自从离开四十里鋪跑到城里，就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区团长。王維平的媽得了屎癆（慢性腸胃炎），全家人誰也不願意走近她一步，在城里雇人侍候，人家一听說是这种病，沒人願干，这才把王生媳妇找了来。

王生媳妇一看是地主王維平家，从心眼里不高兴，可是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王維平的母亲是个尖嘴猴腮的老婆子，因为长期拉肚，臉色发青，两腮深陷，脑袋活象个落干了的瓢葫芦。她整天象猪似的哼哼，怨天恨地，不住声地罵着人。不住气

地拉着屎，說拉就拉，一时盆子拿不到，不管被上炕上，一拉就是一大片。可是她吃起飯來，还能頂个小伙子。王生媳妇每天要为她刷五六次被褥、六七次炕席。因为王維平家买水吃，不准用家里的水，刷被褥得跑到城外护城河边去。刷炕席只給一点点水，却要刷得非常干淨，不准留下一点味。每次刷完，老婆子都哼哼着象狗一样，把鼻子伸到炕席上嗅起来，要是有一点味，就抓起拐棍，不管脊背脑袋一頓乱打，祖宗三代地一頓臭罵。王生媳妇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王生媳妇每一次到城外护城河边刷洗被褥的时候，眼望着家乡的山巒，总会滚下泪来，心想：“躲开了猪狗的日子，过上了牛馬的生活！”

母子俩每天吃的不是椽子面就是豆腐渣；偶尔吃一次玉米面窝窝，还有限制，母亲两个，孩子一个。就这样王維平的老婆还常常罵街：“吃，吃，吃！象猪一样，就是知道吃！吃起来沒完。”

大人挨餓尚可忍耐，孩子可怎么受得了。小儿子整天圍着母亲哭着喊餓。媽媽只好把东西給了儿子吃，自己餓着。

有一天，王維平的儿子拿着一个白馒头在院里玩，王生的儿子吃着手指头，不停眼地看。王維平的儿子見王生的儿子站在旁边，便撇撇嘴，掰下一块馒头，喂了他家的小狗，然后又掰下一块馒头，丢在地上，对王生的儿子說：

“你来学狗爬，就让你吃了那块馒头。”

王生的儿子狠狠瞪了王維平的儿子一眼，罵了声“你个狗娘养的”，上去抓起馒头，投在他的臉上。

王維平的儿子哭着叫着告狀去了，說王生的儿子打了他。

这一下可闖了大禍，王維平的老婆闖出屋來，千花子、万穷鬼地罵着，硬把王生媳妇叫出來，逼着她打自己的孩子。

王生媳妇被逼不过，就舉起手來，輕輕打了儿子两下。这一下可惹火了王維平的老婆，她轉身走進屋去，提出王維平的馬鞭子，沒头沒腦地抽打王生媳妇。抽得她自己沒勁了，才把鞭子拋在王生媳妇面前說：

“我看着你，你給我打这个小臭要飯的！”

王生媳妇无奈，拾起鞭子，一看儿子——儿子兩眼射着哀求的光，手象提着千斤的石头。

“打！打！”王維平老婆逼迫着，吼叫着。

王生媳妇把眼一闔，举鞭向儿子抽去，每抽一鞭，比抽在自己心上还痛，儿子每哭一声，就象錐子扎她的心……

沒娘管的孩子

母子俩离开家，王生心里难过得不行，可一想他們能

吃上飽飯，也就心平氣和下來。

這幾天王生的傷勢漸漸地好起來，就帶着大兒子出門討要。他們走一庄過一村，天到晌午的時候，來到小寨。時令已是中伏，天氣炎熱。王生直覺得頭暈腦脹，老想嘔吐。就對兒子說：

“我們在樹蔭里歇歇腳，睡一會，等涼快一點了再進村討要吧。”

王生躺在樹下，不一會就睡着了。

等他一覺醒來，用手一摸，不見了兒子，叫了兩聲，也沒有回答；正在納悶，一班孩子領着個六十來歲的老奶子，氣汹汹地走過來。說：

“你們要飯吃的怎麼也禍害人？我家剛做好的一鍋黍米粥，你的孩子把一個黎雞窩給捅在鍋里，叫我們那些受苦的回來喝西北風？”

王生趕緊賠禮道歉，說一定好好管教他，抓住他要狠狠地揍他一頓。

本來老奶子氣頭很大，見王生瞎目失眼的，帶着孩子討要，也怪可憐，又一個勁地向她說好話，氣也就消下去了。她叹口氣說：

“你知道這鍋粥的米，來的多么不容易呀！”

王生央求走了老奶子，就到處找兒子，東喊一聲，西叫一句。其實兒子就在旁邊一棵樹上，他聽父親說，要狠狠地揍他，不敢下來。

日头平西了，听不見儿子回答一声，王生心里有些焦急，他想也許是他自己跑回家去了。摸到家一找，沒有儿子。这下他可急了，圍着村到处喊起来。

这时太阳早已經下了山，鳥儿入了林，家家都吃过了晚飯，有的在院里乘涼，有的已經入睡。村庄山谷靜悄悄地傳蕩着王生喊儿子的回声：

“大……有……子……”

不知是因为夜靜，还是因为他声音的哀伤，使人听了非常淒凉。老人們磕磕烟袋說：

“沒娘管的孩子，多可怜！”

黎明的时候，西鋪的武委会主任杜奎同志出差回来，走在村边上，看見一个树窟窿里有个人影一晃，他怕是坏人或敌人的密探，就举起枪来，对准树窟窿喊道：

“什么人，赶紧出来，不出来开枪了！”

一个小脑袋探出来晃晃說：

“是我。”

杜奎一看是大有子，就問：

“你怎么在这儿？”

大有子眨眨眼，不敢說實話。杜奎說：

“走，回家吧。”

王生一見儿子，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从心眼里感謝杜奎。把杜奎送出門去，待轉回屋来，儿子又不在了。他心想：“这次走不远，过一会他自己就会回来。”可是，一天，

两天过去了，儿子踪影皆无。他吃不下坐不稳，围着村到处找着。后来，听村里传说，有人在鸡鸣村看见大有子放猪。他就赶紧奔到了鸡鸣村。

鸡鸣村有个叫贾广发的，是个比较富裕的户。这天傍晚在村边树下看见躺着一个小要饭的，面黄肌瘦怪可怜的。贾广发问他是什村的，为什么不回家？小要饭的说怕爸打。贾广发说：

“你给我家放猪吧，让你吃得饱饱的，比要饭强。你願意嗎？”

小要饭的跳起来说：

“願意。”

这就是大有子。

王生看见儿子很好，心想：放猪比要饭强，反正能吃饱。就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过了一些时候，一天中午贾广发慌里慌张地走进门来，见了王生，为难地说：

“大有子出了事。”

王生象晴天霹雳，赶紧问：

“出了什么事？”

“摔坏了。”

“怎么摔的？”

“他去放猪，”贾广发摘下草帽一面擦着一面说，“我们村的治安军正在修岗楼，被狗日的驮子撞下山去，头和

腿都摔破啦。”

王生一听不知如何是好，在屋里轉了两个圈，抄起要飯棍子，拉着賈广发說：

“走，我去看一看。”

儿子的头和腿都摔伤了，血糊淋淋地躺在炕上，昏迷不醒。王生用手摸着儿子，連声地叫着，他睜了一下眼，馬上又闔上了。急得王生沒抓沒撓的，扎撒着两只手連連地說：

“怎么办？这怎么和他媽交代，他媽要看見孩子摔成这个样，要心疼死了。”

这句话提醒了賈广发，他叹口气說：

“王生大哥，咱是有啥說啥，孩子摔成这个样，我看还是把他媽叫来好，万一要有个好歹哩。”

王生說：

“我馬上去叫，”說着他摸起要飯吃的棍子向門外走去。賈广发从后面赶来塞給他两个餅子。

王生来到遵化城里王維平家，把孩子摔伤的事和老婆一說，老婆馬上落下泪来。两个人去和王維平老婆請假。王維平老婆手夾着烟卷，眼望着窗戶，听完他們的話，又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着說：

“你走了，誰侍候老太太？”

王生是个老实人，遇事沒主意沒办法，只会心里着急。王生媳妇和他可不一样，是个能說会道、办事利落

的人。她一听王維平老婆的話，氣得臉都白了：

“太太，叫你這一說，我們孩子的命還不如老太太的屎要緊呢唄？”

王維平老婆一听王生媳妇話里有刺，氣得把眼一瞪，把烟头往地上一丢，說：

“一個臭要飯的，死一口子兩口子的算得了什麼！”

“是呀，”王生媳妇氣得嘴唇打着顫。“窮人的命，路上土，任人踏來任人踩，誰叫他們窮呢？可太太你也有孩子、也有老人呀！……”

“什麼？……”王維平老婆氣得說不上話來。

王生怕老婆說出更難聽的話來，就趕緊拉着她，向王維平老婆哀求說：

“太太，你行行好吧，就算你積了陰德，孩子好了一定來謝你。”

“來謝我！”王維平老婆用鼻子哼了一聲，“我還不見呢。一句話，你不能走，吃了我們家的飯，就是我們家的人，叫走，你走；不叫走，你老老實實地給呆着。”

王生老婆氣得眼前直冒金花，轉臉對王生說：

“好，你帶着這個孩子回家吧，孩子死了，是他的命。你回家要好好地照看着這個孩子，千萬別……一定要叫他長大成人……”說着掉下淚來，“他們既然不讓我的孩子活，我也要在这兒死給他們個樣兒看看！”

正在這個時候，王維平走進門來，王生媳妇的話他听

了一清二楚，他怕鬧出事來惹麻煩，就趕緊說：

“既然孩子病啦，就回去看看吧。咱們鄉里鄉親的，有話還不好說。”

王生趕緊轉過身來說：

“謝謝王先生，謝謝王先生。”

王維平一面脫着衣服一面說：

“謝什麼，咱們一村一土的。”他脫下衣服，點着一支烟繼續說：“王生呀，現在我是困難呀，等我鬧好了，亏待不了你們。讓你媳婦回家看看，就叫她很快地回來。”

“好吧，王先生，只要孩子好了，就叫她回來。”

王生媳婦一句話沒說，轉身走出屋去。

當他倆領着孩子出門的時候，上房傳出王維平老婆的聲音：

“你叫那窮婆子走了，你自己去侍候你媽！”

王生攜着孩子，老婆領着王生，一路跌跌撞撞地來到雞鳴村，雞已經叫了。王生媳婦闖進門去一看，孩子已經好多啦，也睜眼啦，也說話啦，雖然她落下淚來，可是心眼里安稳多啦。

賈廣發給王生夫妻做了飯吃，天已經明了。王生媳婦說：

“還是讓孩子回家養傷去吧，我再也不回遵化啦，在家守着孩子。”

賈廣發也怕再出事，就趕緊說：

“好呀，亲媽守着比誰也强。家里困难，在我这携斗粮食去。唉！我家的日子也是困难，在这人死鬼活的年月，有什么办法，要不他撞了咱的孩子，甭說你們，我也和他拉倒不了。这个，你不找他，他还想找你呢。唉，熬着吧。”

死，也要死在一起

一斗糧四個人吃，能吃几天。王生只好出門去討要。

這一天，天摸黑了王生還沒有回來。王生媳婦心里焦急，孩子們不住連聲地喊餓。王生媳婦只好到本村去要點。她走進屈福亭的家里（屈福亭是本村地主賊六子的狗腿子，過去凭着地主的勢力，想盡辦法欺侮老百姓），屈福亭的媳婦見她領着孩子進來，就趕緊說：

“咱們本村本土的這是干什么，來，快坐下。”她把王生的儿子領過來，上下仔細地打量着說：“這孩子多精神，看餓得這樣子。”說着由籃子里拿出一個餅子，塞給孩子說：“吃吧。”

她讓王生媳婦坐在板凳上，說：

“唉，這個年頭可真不好混呀！”說着她用眼瞟着王生媳婦。

“唉，誰家也比我家強。”王生媳婦低下頭。

屈福亭媳婦眼珠轉了三轉說：

“我說大有媽，現在的年月是自己的道自己走呀，你不能太死心眼了，放着鮮菜不挑，光溜着道边走。”

“唉，我可有什么办法！”王生媳妇叹口气說，“守着一个瞎子，两个不懂事的孩子。”

屈福亭媳妇睨了睨吃餒餒的孩子說：

“咱們乡里乡亲，我說句不系外的話，这样下去大人受罪是小事，要把孩子糟蹋了。就說你們老大吧，要真摔个腿斷胳膊折，你們能要着吃养他一輩子嗎？”

“是呀，那可有什么办法呢？”王生媳妇觉得這話說的也对。

“办法是有呀，就看你走不走。”屈福亭媳妇緊接着話茬說，“要我說……算了吧，这話說出来叫你伤心，还是不说好。”屈福亭老婆故意把話头停住。

“你說吧，我不伤心。”王生媳妇平时也常为这些事伤心，今个有个人說說，心里也敞亮敞亮。

“要我說……咱們亲近我才說這話，要系外的我才不管呢。”

“你說吧，我不怪。”王生媳妇急于要听她的話。

屈福亭老婆故意把声音放低：

“叫我說，你們把二小子出給人，让他逃条活命，你們的日子也緩緩肩。”

王生老婆吃惊地瞪着两眼，說不出一句話。

“要是不对你的心思，就当我沒說。”屈福亭老婆用眼

瞟瞟王生媳妇，見她沒怪罪的意思，又补充說：“你想想，这世界上卖儿出女的多着呢，想不开是个难受事，想开了是条活路。你想他将来长大了，还能忘了你們是他的生身爹娘？还能亏待了你們？这又是一个靠山！”

王生媳妇虽然心里难过，可生活逼得她无路可走，觉得这话也有点道理。就抬起头來說：

“这事我自己也拿不了主意，等他爸爸回來，我們商量商量再說。你的好意我領情。”

屈福亭老婆見有活口話，滿臉噴笑地說：

“这个事你可得拿定了主意，他們瞎的瞎小的小，全靠你养活他們呢，你不救他們誰救他們！”

王生媳妇告辭了。屈福亭老婆滿心高兴，覺得今儿个这个事真凑巧，正想找她，自己送上门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屈福亭有个朋友想买个孩子，出的价钱不小，屈福亭夫妇就把这笔买卖攬过来。那个朋友来过几次，曾看见过王生的二小子，說象这样的就行。

王生回来，媳妇把出孩子的事和他一說。王生听媳妇的口語并不反对，就叹口气說：

“我瞎目失眼的，全家就靠你养活，孩子也是你拉大的，你如果願意，我不拦擋。”

王生虽然这么说，心眼里可非常难受，晚饭他一口也没有吃。王生媳妇也象失魂掉魄似的唉声叹气。有心不卖，怕养活不成孩子；有心卖了，这心头肉真难割呀！

第二天屈福亭老婆来催她，王生媳妇说：

“我们还没商量好，商量好了去找你吧。”

其实有什么可商量的呢！王生倒在炕上唉声叹气，他明明是不同意，可不愿意说出来。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可真难呀！王生媳妇趴在炕上痛哭起来。哭着哭着，她忽然想起大嫂子——王荣家的，去和她商量商量，也许大嫂子会给她拿个主意。

王荣家的把王生媳妇让在炕上，王生媳妇未曾说就先落下泪来。她把卖孩子的事先先后后说了一遍，最后说：

“大嫂，你替妹妹拿个主意，这也是咱王家的骨血。”

王荣家的想了想，说：

“家贫、路窄、日子不好过，这是真的。可儿到底是儿，他是娘身上的一块肉，怀胎十个月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费了多少心血才拉扯这么大。为了一时的方便，就把他卖了。文书一写，更名改姓，任人家骂，任人家打呀，到那个时候，你心疼你难过，你有多少眼泪流不完呀，你就是抬个银山去也换不回来啦！……嫂子，你还是死了这个心吧，咱王家再穷、再苦，也不能把亲骨肉往火坑里送呀。”

王生媳妇一面听着一面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等王荣家的把话说完，她一头扎在王荣家的怀里说：

“嫂子，是我一时糊涂，你算是救了你侄子的命；就是

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屈福亭老婆的买卖沒做成，就咬牙切齒地在街上大喊大叫地說：“王生這家窮鬼，不依好，放着活路不走，再要飯誰也別給他，餓死這窩窮鬼！”

今 天

——今天是阳光普照

王生沒有餓死，他不會餓死。要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人不該死总有救。不過，過去是从這一個火坑中被救出，又進到另一個火坑；今天，是永遠地跳出火坑，是受苦人自己救自己，是受苦人組織起隊伍，在共產黨、毛主席的率領下，打下了天下，徹底地翻了身。

春雷第一聲

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解放區響起了第一聲春雷——土地改革開始了，千年的封建制度要消滅，受苦人的窮根要拔掉。遵化縣四十里鋪也象其他解放區的村莊一樣，敲起春雷般的大鼓。這鼓聲召喚着人們，鼓舞着人們，受苦的人站起來，向地主階級進行鬥爭，收回祖祖輩輩的勞動果實。

王生这个被旧世界压倒的人，在鼓声中抬起了头，挺起了胸，站在自己的阶级队伍里振臂高呼：“打倒封建地主！”王生的眼睛是瞎的，可是他的心突然亮起来，他好象看見，受苦人的黑夜过去了，东方升起一輪紅日。

在全村訴苦大会上，人們要王生訴苦，可是他站在台上却說不出一句話来。他的苦处太多了，是語言所表达不出来的，他只有痛哭流涕，人們就跟着痛哭；他只有热泪双流，人們就跟着他流泪。王生的眼泪，不完全是悲痛的眼泪，是悲痛和欢乐混合起来的，是告別昨天迎接今天的眼泪。就在这种眼泪和欢笑声中，他家分得了七亩八分土地和一些家具。家具他并不怎么喜欢，可是土地，当日宣布这七亩八分土地屬於王生的时候，他止不住热泪盈眶，滾滾流下。土地呀土地，爷爷不是为你而死的嗎？爸爸不是为你而亡的嗎？全家人不是因为你才流离失所、东奔西跑地討要嗎？今天你到底回来了！

王生有了土地，就計劃着生产。一想起生产，他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到底种上了自己的地；难过的是：自己是个瞎子，孩子又小，光靠老婆一个女人家，能把地种好嗎？

这一天，王生和老婆来到自己地里。老婆看看这么一大片地，又沒有牲口又沒有农具，怎么个种法呢？就又悲又喜禁不住落下泪来。王生說：

“哭什么，有了媽媽还怕生不出孩子来！毛主席既然

把地分給我們，我們就是用手刨，也要把它种上，就是用眼泪澆，也要让苗长起来。”

王生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种上了第一年的土地。苗儿出来了，长得还不错，他乐得阖不上嘴。可是到七月間，蔣介石匪軍由长城退下来，路过四十里鋪的时候，把他的苗子割去喂了馬。王生媳妇为这大哭了一場。

第二年种地就更加困难了。一方面天旱，再加上缺劳力少肥料，这一年王生的七亩八分地并沒有打多少粮食，日子还是不好过。这个时候王生才明白，光有土地，沒有劳力肥料，还是打不出粮食来呀！加上这年秋后，村里出卖土地的很多，他心里慌慌的想：“这还了家的土地，真个的就保不住了？”

这一天，村里有个叫張让的到王生家来串門，說了几句閑話之后，就对王生說：

“听说了嗎？咱村好多人出地啦，你有意思嗎？白馬嶺有人想要你的地，出的价钱可不少呀。”

王生一听，头頂轰地一下，就象天塌下来一样。他驟地站起來說：

“我的地是毛主席分給的，是穷人翻身的地，是打倒地主的站脚地，是穷人的心，是穷人的命，他就是給我万两黃金我也不卖，想买我的地是瞎了心，瞎了眼！告訴他們吧，讓他們黑天白日想着去吧！”

王生躺在炕上，心里比燒上一把火还煩躁，左思右

想，觉得过去的日子又在眼前晃哩。正在这时，王国藩走进门来，见王生愁眉不展，就问：

“二叔，有什么发愁事？眉头上结着疙瘩？”

王生叹口气说：

“唉，甭提啦，国藩呀，有人想买我的地。”

王国藩说：

“是呀，听说了吗？咱村出地的可不少呀。”

“听说啦，这得请上级想个办法呀。”王生着急地说。

王国藩嘿嘿笑起来。

“上级早想出办法来了。”

“什么办法？”

“互助合作，组织互助组。”

“什么是互助组？”

“就是大家在一块干活，你少农具，我缺牲口，互相帮助，就能克服困难多打粮食。”

王生高兴地喊：

“那太好了！”

“好，你愿意参加吗？”王国藩问。

“那还用问，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提出来的办法，我都干！”

“问还是要问，”国藩笑哈哈地说。“因为这互助是自愿的！”

“我举双手自愿。”

从此王生参加了互助組。

參加了二年互助組，糧食比過去打得多了，可是還不夠生活。王生每年除了領取國家的救濟糧救濟款和寒衣之外，有時還不得不拿起他的討飯棍子和破鐵筒，到遠的地方去要一些。

最後一次討要

到了一九五二年，村里出賣土地的更多了。互助組雖然好，可是抗不住天災人禍。

這一天王生由外面回來，王國藩和杜奎正在家裏等着他。王生一進門，王國藩就說：

“我們組織農業社，你參加不參加？”

“這農業社是干什么？”王生問。

“農業社就是把土地歸在一起，牲口車輛是大伙的，大伙在一块種地，打了糧食地一半勞一半。”

王生想了想說：

“這農業社能叫大伙不賣地嗎？”

杜奎一听哈哈大笑着說：

“哥呀，農業社這個藥正是治賣地這個病的，不信你吃付看看，保險你這輩子再也賣不了地。”

王國藩也笑着說：

“不但保你這輩子，它能保子孫萬代。”

王生說：

“要是能保不卖地，就是跟着农业社要飯吃，我也走在前头。”

逗的王国藩和杜奎又笑起来。国藩說：“这农业社是引导大家走向幸福，再不受穷的道路，怎么能要飯吃呢？”

王生也笑了。

“我是打比方，表表我这心。”

就在这一年，王生参加了全国聞名的“穷棒子社”。

晚上，“穷棒子社”在王荣家开全体社員大会，大家討論了土地、牲口和农具問題。計算來計算去，二十三家只有三条駢腿，最后大家討論明年种地的籽种，有人說：

“咱們办起了农业社，国家还不貸給咱们籽种呀！”

王国藩說：

“咱不向国家伸手。我打个比方，咱办社好比一家子过日子，日子剛一过就向人借錢，那样的日子能过好嗎？”

又有人說：

“可咱們这二十三家是全庄最穷的，大家拿不出种子来呀。”

杜奎說：

“头年大家是怎么种的地，籽种是哪来的？”

大家囁嚅着說：

“那还不是亲戚家要点，朋友家借点，凑合着种上啦。”

有人说：

“有的还是討要来的呢！”

王国藩說：

“对，我們就是討要，也要把籽种弄来。要沒有这种精神我看社办不好。有人不是罵我們是穷棒子嗎？我們就是要让他看看这点穷棒子勁。”

王生心里想，“着，要按这样办社，这样过日子，社还能办不好？明天我就去要种子。”

第二天王生起来，換了一身干淨一点的衣服，拿起要飯棍子，提起铁筒，对媳妇說：

“我去替咱社要种子去啦！”

王生媳妇笑着說：

“哪有要籽种的？”

王生說：

“看，要来千家粮，种咱社里的地，这是个吉庆事儿。旧社会那嬌生的孩子，不是要穿百家衣，长命百岁嗎？咱社里种上千家粮，幸福万年！”

說的王生媳妇也笑了。

王生今天出門討要，和以往二十几年的討要心情完全不一样。过去是饥寒交迫，如赴法場；今天象是赶庙会，走亲戚，总觉得象有点喜庆事在等他。他在山坡上不知不觉地哼哼起“皮影”来。

傍晚，王生回到村里，他要来了不少的籽种，其中最多的是瓜子。那年建明社种了不少的瓜，每逢社員吃瓜

的时候，都說：“这还是王生要来的瓜子呢。”說着大家哈哈笑个不止，此是后話。

吃过晚飯，王生拿着要来的籽种，找到王国藩和杜奎，他把籽种往地上一放說：

“这是我要来的籽种，交給你們。”

王国藩和杜奎一看各种籽种都有，就哈哈地笑起来，笑得王生不知道咋回事，就問：

“怎么，太少呀？”

杜奎說：

“我的哥喲，你真去要籽种去啦？”

“你們不是說就是要籽种，也要把咱社里的地种上嗎？”

“那是我們办社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的决心，不是真让你去要籽种。你可好，給你个棒錘，你就当‘針’认。”

国藩也說：

“你入了社，就是社里的人啦，出門討要走陡坡过山梁，要出个差錯，咱社里要担心，外人也笑話咱。”

王生說：

“看，我要了半天籽种，倒受起批評来了。”說完他哈哈大笑起来，又接着說，“国藩，杜奎，你俩知道，我要了二十多年飯，以为我還沒要够嗎？可是为了咱的社，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不过話又說回來了，这次討要，是我此生此世最后的一次討要了。”

討籽种这件事，直到現在，在建明社还傳为笑談。

第一年丰收

春天到了，社里开始种地。这可愁坏了王生。自己瞎目失眼，能干什么活呢？王生已經二十多年沒正式干过庄稼活了，在互助組的时候，組里的人都不要他換工，一方面是可怜他，再一方面怕他把苗子糟蹋了。現在入了社，还不是和在互助組里一样？

街上人喊牛叫，下地的人們象赶庙会，好象是故意向王生示威似的。他在屋子里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象是丢了魂一样，坐下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正在这个时候，杜奎走进門来：

“二哥喲，社里給你分配活啦。”

王生驀地一下站起来，結結巴巴地說：“給……給我分……分配了活啦？”他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接着問，“我……我能干什么呢？”

杜奎說：

“別問啦，到地方你就知道啦。”說着把他拉起就走。他們来到一个羊圈的旁边，杜奎交給他一把铁鍬說：

“这是一把铁鍬，这是除出来的羊糞，”他拿着王生手中的鍬拍拍，“这是筐，”他让王生用手搖搖，“你把糞裝在筐里，我們就往山上担。”

王生本来就是干庄稼出身，装粪这活又算不了什么，虽然他眼睛瞎，他的耳朵和感觉是灵敏的，他装得非常好，就是有一点半点撒在地上，他都听得见，等筐挑走了以后，他再用铁鍬撮拉回来。

一筐筐的粪挑走了，只剩下王生一个人。他双手拉着铁鍬，心里想：“我到底又能干活啦，我到底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啦，大家干活我也干活，大家說笑我也說笑，这有多好，多叫人高兴！人們不是常說幸福嗎，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王生激动地流下泪来。

送粪的人们回来了，他们担来上圈的垫脚，倒在羊圈旁边。王生又为他们装上。人们又挑着走了。王生刚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他忽然想起来，我要是把垫脚撒在圈里，不省得他们再垫吗？他攥着羊圈门，走进圈去，用脚摸着量量羊圈多宽多长，就站在羊圈外面撒起垫脚来，他撒得非常均匀。

王生的活路越来越宽，他不但能装粪上圈，还能出圈、铡草，不过这些都是家里的活，他总想干干地里的活。这一天，他找到国藩和杜奎说：

“二位主任，你们看地里的活这么多，大伙都忙不过来，能分给我一点吗？”

国藩向杜奎挤挤眼，意思是说：你看这没眼的人干劲都这么大。就对王生说：

“地里的活杜奎是总管，让他給你分配吧。”

杜奎想了想說：

“对，咱們正在耕地，咱們那‘三条驴腿’拉耩，还需要一个傍耩的，你要駕耩，让驴拉套，这不省下一个傍耩的嗎，你看行不行？”

王生駕着耩，凭他的感觉和精心走得非常直，如果后面一喊停，他馬上把套一拉，驴馬上就站住；这样他們配合的非常好，拿耩把的說：“比有人傍耩还好呢。”王生听了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象是飞出籠的鳥，能隨便地在广闊的天空中飞翔了。

晚上回到家里，王生拿过扫帚来扫扫院子，整理整理柴火，这些活做得非常利落快当，好象他的眼睛根本不瞎似的。王生媳妇有点奇怪地說：

“这老头子怎么啦，真象是越活越年轻啦。”

不錯，王生的青春正在恢复着。

經過一年的苦战，建明社得到了大丰收，平均每亩产量一百二十八斤。全村轰动了。这是四十里鋪的坡地从来没有过的最高产量，全社所有的人都象晚鳥歸林似的議論着，異口同声地說：“这农业社就是比互助組优越！”

这一年王生全家做了二千八百多工分，共分現款八十多元，分粮三千二百斤。各种各样的粮食都有，破茅屋里盛不下，就堆在院子里，王生象喝醉了酒似的，守着粮

食坐着。晚飯做熟了，老婆叫他吃飯，他說：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吃。”

王生老婆也笑着說：

“我也是吃不下去。過去要飯吃的時候，一天價肚子餓；現在有了糧食，倒吃不下去了。”

月亮升起來，孩子們都睡了，王生還是捨不得離開。過一會，他抓起碎石般的白馬牙玉米，從這個手裏倒在那個手裏；過一會，又抓起大粒黃豆，從這個手裏倒在那個手裏。他總是喜歡不夠，總捨不得離開它們，心里想：

“過去全家的糧食就盛在要飯吃的破鐵筒里，破鐵筒就是全家的倉庫。全家人的生活，要看鐵筒。鐵筒滿着，全家一天的日子好過；鐵筒不滿，一家就要餓肚子。如今社里的地，從南山到莊西，從北河灘到莊東，面積是这么大，收的糧食是这么多，光我一家就分了幾千斤，要用那個破鐵筒來量，那得量多少筒。過去唯一能保護全家的是那條要飯吃的棍子，那條棍也不過能擋一擋地主家的狗。如今保護全家的，是全社，是全國，是社會主義！”想到這裡，他微笑着滾下眼淚，眼淚落在白馬牙玉米上，映着月亮，閃發着光亮。他又想到過去常聽見人們說：受苦人的眼淚是苦的，享福人的眼淚是甜的。他趴下嘗了嘗自己的眼淚，笑着說：

“我的眼淚是甜的，我渾身上下都是甜的，我全家，我們全社都是甜的。”

董見光明

近来王生的眼睛总是发着光亮。人們都这样說，王生自己也这样感觉。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日子好过啦？还是因为生活痛快啦？恐怕这两样都有。有的时候，突然一下王生觉得眼睛亮起来，眼前的人影、树木，社的牛馬、羊群、車輛，都在他眼前晃动起来；然而，就是那末一下，馬上又模糊起来。他心里想：“这大概是自己太想看看社里的东西了吧！脑袋里想出来的，不是真的看見的。”

这天清早，他起身时天还不甚亮，他要到南山去办一点事。走到山坡上天漸漸亮起来，他无心地抬起头来，啊！在他眼前出現了綠油油的庄稼，河滩的楊树閃着白光，弯弯曲曲流水的小河……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举起双手揉了揉，庄稼、树林、小河仍然顯現在眼前。他睜大了眼睛，可勁的看着，可是这些东西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消失了。

王生回到家里，把这情况对老婆一說，老婆劝他說：“你到医院去看看吧，万一要能治好呢？”

王生一笑說：

“治什么，都快五十岁的人啦。”

“看你这个人，”他媳妇有点不滿意地說，“你平常不

是常說，我們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們越活越年輕，怎么今儿个倒卖起老来啦？”

王生搖搖头說：

“我不是卖老，我总觉得是我的心看見了，不是我的眼看見了。治也治不好，何必費那个事。”

“有枣沒枣打一杆子，治得好治不好去試試。馬上去，和社里說說去。”

在老婆的督促下，王生找到國藩，把治眼的事一說，國藩說：

“前两天我們在社委會上也議論了一下这个事，准备放你的假，让你去治眼，医药費由咱們社擔負。去，让佟啟先給你开个介紹信，到区卫生院去檢查一下。”

王生來到雞鳴村區衛生院，把介紹信交給張院長。張院長一看是建明社的王生，知道他在舊社會受了不少的苦，就特別关心仔細地為他檢查了眼睛。檢查过后，張院長說：

“你這眼睛要動手術，需要住院。”

王生一听要動手術，心里想：“眼睛怎么能動手術呢，弄不好会瞎得更厉害。再說，社里的活正多，過一陣再說吧。”于是就對張院長說：“我回去商量商量，要是治我就再來。”

王生走的時候，張院長再三囑咐他，不能再耽誤，一定要很快地回來。

可是王生一去再沒有回來。

又过了一些时候，卫生院搬到四十里鋪；張院長專門到他家去動員他治眼睛。王生只是笑笑，既不說治，也不拒絕。他媳妇和張院長也熟，就打趣地說：

“你这治病的先生，都找上門拉大买卖來了。我們治病沒錢呀！”

張院長笑着說：

“國藩主任早說啦，社里包起來，不用你們拿錢。”

王生媳妇也笑了。又說：

“你三趟兩遭動員我們治眼，你能保好嗎？”

“你看，”張院長說，“我們都找上門來了，還不想治好嗎？”說的大家都笑起來。張院長又說：“這次治眼，你不用住院，把你送回家來，我每天來給你換藥。”

王國藩和杜奎也幾次勸說王生，就在大家督促之下，他的眼睛動了手術。他躺在家里，張院長每天到家里來給他換藥。一個星期過去了，張院長取下他眼上的紗布，讓他試一試，看看能不能看見東西。王生睜開眼睛一看，眼前一片明亮。人、房屋、窗外遠處的山峰，都清清楚楚顯現在眼前。可是他不相信這是真的，用手揉揉眼再看，這些東西越來越清楚，再也沒有消失。他感動地抓住張院長的手說：

“舊社會讓好人變成瞎子，新社會讓瞎子又長出眼睛來。”

一次現身說法的宣傳

一九五五年秋末。地淨場光，王生媳妇要带着二儿子到薩河橋去看王生的三弟。

清早起来，娘儿俩换上了新衣服，穿上了新鞋袜，收拾得渾身新鮮，上下光亮，真象个走亲戚的客人。他們又提着一个籃子，籃子里装上点心、白饅头，就动身了。

薩河橋在迁西縣內，离四十里鋪四十五里。娘儿俩走过几条河滩，爬过几道山梁，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的地方，正不知道走哪条路对，那边走过来一个卖泥娃娃的。王生媳妇問：

“借光問一声，上薩河橋走哪条道对呀？”

卖泥人的一看这娘儿俩穿得这么新鮮，就說：

“你們上薩河橋呀！同路，搭伴走吧。”

三个人一路走，就拉起話來。王生媳妇問：

“你是哪庄的？”

卖泥人的說：“我是迁西縣人。”

“你們村成立農業社了嗎？”

“成是成立了，我還沒參加。”卖泥人的怕問，自己先說了。他接着問：“你們是哪庄上的人？”

“我們是遵化縣四十里鋪的。”

“四十里鋪的？”卖泥人的重新打量一下娘儿俩，“你

們庄的农业社出名呀，你們的主任王國藩，不是还进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嗎？是真的吧？”

“是真的。”王生媳妇笑着回答。

“好，正好。”卖泥人的换一下肩說，“我正想問你一件事，你們村有个叫王生的吧？”

王生媳妇笑了，心里說：“你算問着了。”就馬上回答：“是有个叫王生的。”

“听说他要了二十多年飯，家里苦得不行，还是个瞎子。入了农业社第一年就分了几千斤粮食。这是真呀是假呀？”

“是真的，第一年分三千二百斤，第二年分了三千七百斤。”

“我不信，农业社再好，一个瞎要饭的，一年就能分几千斤粮食，那除非是作梦，要不就是吹牛說大話。”

“是真的，不是吹大話……”王生的儿子想和卖泥人的爭辯，媽媽向他摆摆手，儿子还有点不高兴。王生媳妇說：

“这一說你不信，是吧？”

“我不信。”卖泥人的搖着头，“几千斤粮食，那得多大一堆，得多少布袋盛？要叫我一个人吃，得吃好几年。”卖泥人的羨慕地搖着头。

“怎么样才能叫你信了呢？”王生媳妇問。

“除非我亲眼看見。本来我想到四十里鋪去看看，因为道远，最近身子骨也不結实，就沒去了。”

王生媳妇笑了笑說：

“叫你亲眼看見也不難，咱可要賭點東西。”

“你說賭什麼吧？”

“不用賭別的，你要看見了，就把你這泥人給我們兩個，我們拿回家去給孩子玩。”

“那還不容易，大的小的你隨便挑。”

“一言為定。”王生媳妇低頭笑了笑，用手撢了撢衣服上的塵土說：“那麼先請你看看我們娘兒倆這個穿着打扮，還有我們走亲戚拿的這些東西，”王生媳妇說着，掀開籃子上面的毛巾，讓他看看點心和白饅頭。“我們家象個什麼主呀？”

卖泥人的不解其意，更仔細地打量着他們娘兒倆。王生的儿子抿着嘴不敢笑出来，站直身子让他看着。卖泥人的說：

“你們家呀，最少也得種它個二三十畝地，養着一头牛，也許還有個小毛驴子，十幾只羊。”

“要按成份俺象個什麼農？”王生媳妇問。

卖泥人的想了想，說：

“中農吧，新社會中農比過去也高啦。”

“不再高點嗎？”

“高不了啦！”

王生媳妇噗哧一笑說：

“現在就讓你亲眼看看吧，我就是王生的媳妇，这就

是王生的儿子。”

卖泥人的惊得站住脚步，上上下下地看着娘儿俩。忽然噗嗤一声笑了。

“你真能逗呀，这样的事还能开玩笑！”

王生媳妇郑重地说：

“开玩笑有愿作人家媳妇当人家儿子的吗？”

卖泥人的一想，也是呀，就问：

“你们真的和王生是一家人？”

王生的儿子骄傲地说：

“真的是一家人，王生是我爸爸。”

卖泥人的顺手把挑子放下说：

“好，我信了！我认输了！你们挑泥人吧。”

王生媳妇说：

“那只是说说笑话，哪能真要你的泥人。”

卖泥人的拣了两个最大的泥人放在地上，挑起挑子就走。王生媳妇赶紧说：

“我们不要你的泥人，赶快挑着卖去吧。”

卖泥人的回过头来说：“我不卖泥人啦，回村参加农业社去，泥人算我送给建明社啦。”

新房旧屋

四十里铺分东西二铺，中间相隔一条道。这条道，南

去上长峪山谷，北来下河滩树林，是东西二鋪的中心。全村有什么集会、娱乐、庆祝的事，都在这里集合。这里常常停放着社里的拖拉机、胶輪車，或其它的新式农具。东西二鋪的社員們，每天上山收拾果树，下地拾掇庄稼，都从这里走过。去建明公社参观的人，也必須經過这里。

就在这样一个显要地方的东北角上，有一間破茅屋。那真是破得不象样子——屋頂的茅草，好多年以前就发了朽，有的地方凹下去，有的地方凸出来，茅草变成酱黑色，活象多年的陈馬糞，如果走近了，还会嗅到一股朽酸的霉味。再看那牆壁，簡直象乱石堆，有些地方还有点牆壁样，有些地方窟窿窿的，用乱石堆堵着。整个茅屋活象个干癟的狗尿台，上面濺着稀泥。这样的茅屋不用說人住，連豬狗都不让进去，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險。这就是伴随着王生全家要了二十多年飯的那間破茅屋。

就在这間破茅屋的西北面，也不过相隔十步远，盖起了五間寬大的石头新房。这房真是又坚固又漂亮，青石垒的根基，白石作的牆壁，白灰灌浆，青灰抹縫，石头的楞角对得非常巧妙，构成了自然的花紋；远远看去就象古代的图案。屋頂是石灰抹的，三年五載也別担心会漏。就连屋頂的烟囱，也是亭楼式的，烟不是从上面冒，而是向四面出。再看看那焦黃的窗戶，已經上过两遍油，閃閃发亮，衬得窗上的玻璃都分外清亮。屋里面的牆壁是白灰亮过的，鏡明雪白，尤其是太阳照在窗上，屋內显得又豁

亮又寬敞。这就是王生参加农业社四年后盖的新石房。

那間破茅屋和新石房并排地站在那里，显得它那么縮气，那么难看，石房是那么高大，那么雄偉有气魄。对比之下是那么不相称。路过这里的人，都会这样想：在这样漂亮的房子旁边，为什么非留着这样一间又破烂又陈旧的东西呢？拆了它，垒上一道新墙，再种点瓜瓜菜菜的，不是更好看更合适嗎？对，这新房旧屋的主人——王生也是这么想的。

新房盖好的那一天，王生让老婆做了頓肉餃子，外加二两燒酒。吃完餃子，王生驀地跳下炕去，伸手抄起一把铁鎬，对老婆和两个儿子說：

“走，拆那間伤心的破茅屋去！”

茅屋沒拆了。为什么？咱們話分兩头說。

近来王国藩看到一些現象，使他很伤脑筋。比如，有些青年人过上了好日子，却不知道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一年，全村有二十几对結婚的，这是很大的喜事，可是这些年輕人結婚后，不說好好閑生产，让地里出产更多的粮食，却都摆起闊气，讲究起穿戴来。今天这一对請假赶集，明天那一对請假进城。下地晚，收工早，队长教育他們好好干活，他們却說：“忙什么，有吃有穿，銀行里存着錢，少做点沒啥。”就連戴存这个受苦的孤儿，也穿起买的千层底鞋上山干活計。这些事总是在王国藩脑子里轉游。

那天，开了个支委会，决定对这些年輕人进行一次新

旧生活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請区委选一些教材。区委来信說：“光书本上的教材还不够，最好是活的真人真事，西舖这样的教材是不少的。”

王国藩和杜奎一个个地盘算着，看看哪个最合适。这个时候正赶上王生的新房剛盖好，王国藩看看石房，再看看破茅屋，灵机一动，手拍大腿，心想：“这不就是最現成最好的教材嗎？这不就是新旧生活最好的对比嗎？”

說來也巧，就在这个工夫，王生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拿着鍬鎬走来。王国藩一看，赶紧迎过去問：“你們干什么？”

王生說：“拆了这个伤心的东西！跟着它受了一輩子罪。”說着叭嚓就是一鎬。

王国藩上前抓住鎬把說：

“这間茅屋可不能拆！”

“为什么？新房盖成了，出来进去的看着它，就想起过去，想起过去就伤心，不如拆了心淨，把过去的苦日子忘它个一干二淨！”

王国藩笑了，說：

“嗨，就是为了你說的这个，才不能拆它。”

王生眨眨眼，不明白王国藩話里的意思。

王国藩看看那間破茅屋，說：

“咱们上了几岁年紀的人，吃过旧社会的苦，尝过苦日子的味，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才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来

的不容易。那些年輕人，吃水不知道井怎么挖。不知道过去就不懂得現在，忘了过去就是忘了根，忘了本。天长日久，沒根沒本，就象山上的树，風一刮雨一打就倒下了。這間破茅屋就是過去，這五間新石房就是現在，讓他們看看茅屋，讲讲过去，想想現在，这样他們就会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你說這間破茅屋拆得嗎？”

王生听了这一番話，感动得把鎬一扔，說：

“好，叫你这一說，不只年輕人，我們上了岁数的人也不應該忘了过去。我把它留着，出門看看它，进屋想想它，閑着沒事說說它，让子孙万代記住它，知道我們的日子是由什么道上走过来的。”

說得王国藩笑了，王生夫妇和儿子也笑起来。

过了几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建明社的記錄影片，正好拍到王生夫妇过去討飯這一段生活。拍电影这是个新鮮事，全村男女老少，尤其是年輕的小伙子、姑娘和媳婦都来看热闹。王生家的院子里鬧鬧嚷嚷，風雨不透。这时候王生夫妇穿着过去討飯的衣服，拿着破铁筒和棍子（这些东西是特为保存下来的），走出屋来。大家一看，挺新鮮，都哈哈笑起来。这时拍摄工作还没有准备停当，王国藩看看是个机会，就把王生夫妇叫到破茅屋跟前，指着破茅屋問一个小伙子：

“笑半天，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嗎？”

小伙子撇嘴一笑，說：

“誰不知道，這是王生叔過去要飯時的房子。”

王國藩又問：“他們是怎么要的飯，为什么要飯？跟這間破茅屋有什么關係？他又是怎麼瞎的？”

小伙子被問住了，直楞着兩眼答不上來。

其他年輕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也直了眼，他們心想，“是呀，過去只知道王生叔他們要飯吃住這間茅屋，王生叔他們是怎么要的飯，又是怎麼瞎的眼？跟這間破茅屋有什么關係？象也聽老人講過，當時沒仔細聽，日子長了，模模糊糊地也記不清了。”

有些才過門的新媳婦，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心急地問：

“是怎麼回事，主任，你給講講吧。”

“還是讓他自己講吧！”王國藩指着王生說。

王生就把他們夫婦如何結婚，如何瞎了眼，怎樣討飯，從頭至尾講了一遍。

有些人聽呆了，年輕人的臉上表現出憤怒。

這時王生臉上兩行熱淚，刷刷地滾下來。他是為過去的苦日子傷心呢？還是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感動呢？恐怕兩者都有吧。

就這一天起，新舊生活對比的社會主義教育開始了，課堂上講，實生活里看，王生的“新房舊屋”就成了有力的活教材。

直到現在，全西鋪的人每逢走過這間破茅屋的時候，

总是看它两眼，想想过去的苦日子。他們把这間破茅屋，当成新旧生活的标志，每逢看見它，就想起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无形中身上增添了新力量，不管干什么活，勁头都好象用不完。

尾 声

《王生家史》写到这里應該結束了，也許有人要問：王生家現在的生活怎么样？我可以簡短告訴大家：一步比一步好。因為他們正沿着人民公社这条康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幸福，走向人类的希望——共产主义。但是，王生深切地知道，幸福的取得是多么不容易，需要付出多少痛苦、眼泪、斗争和劳动呀！王生全家現在常說这样一句話：“要不是共产党，我們哪有今天。”這句話听起来很平常，然而出于王生之口，这其中包含着多濃厚的感情和切身体会呀！新社会旧社会，一字之差，生死之別。有誰比王生全家体会更深刻呢？

王生不会讲理論，但对新旧社会的深刻体会，使他的話总是能让人信服、尊敬。他常說：“过去的日子是过去了，可給我們留下的痛苦要永远記在心上，永远不能忘本。”

多少血泪多少恨

——黑龙江省庆安县久胜公社林場大队

党支部书记路凤桐的家史

黑 方

春 节 的 团 聚

今年春节，路凤桐哥三个又团聚了。

路凤桐住在久胜乡的王誠屯。他两个兄弟住的屯子并不很远，一眼就可望见；但是农活很忙，哥三个要碰在一起，談談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久久盼望的春节来了，去年的收成又很好，两个兄弟便到王誠屯，給大哥路凤桐拜年来了。

路凤桐自然滿心欢喜，虽然他害肺病已有七八年，去年还吐血，一見亲兄弟到来，就急忙張罗包餃子。他住在新盖的兩間新房里，玻璃窗透亮，白雪闪闪，照得屋里分外亮堂。两位兄弟在炕上坐定，就摆上炕桌，烫了酒来。

这样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年，在解放以前是不能想象的。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生活过得象火炭般紅，这兴旺之气，不仅路凤桐心中高兴，那两位早已成家的兄

弟，心中也是热乎乎的。

喝着酒，谈着心，二三十年前的往事都来到嘴边。多少欢乐，多少愁苦，就象乱线似地交织起来。

突然，路凤桐说道：“二兄弟没有活到今天！”

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兄弟，都放下酒杯，象触了电似地一下呆了。只有阳光照着炕桌上热气腾腾的菜碗，屋里忽然显得这样寂静。

他们都在想，想二兄弟。

岁月象呼兰河的流水，滚滚而去。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事情忘怀了，多少人的面影记不清了。但二兄弟，他的面貌，他的声音，他走动的样子，他在气绝之前的呻吟，是那么清晰地留在心上，浮在眼前呵！二兄弟，二兄弟！他早就走了，含着眼泪，染着一身鲜血，死了。再也不会看見二兄弟了。

路凤桐按着炕桌，哭了。地主的皮鞭也没引来过他的眼泪，而今天，他那么伤心地哭了。

两个兄弟望着大哥，想劝慰大哥的话还没有说出口，眼泪已象断线的珠子一样，一个劲地流着、流着。他们靠在大哥身上，他们抱住大哥，痛哭起来。

二兄弟早就死了。哥三个的幸福生活，他看不见；哥三个凄切的哭声，他听不见。他是含恨而死，他是受屈而死，他是被折磨而死的呵！

二兄弟之死

东北解放前三年，路凤桐二十七岁，他的二兄弟才十四岁，小小的年紀也跟他的大哥一样，从小就跟人扛活了。力气小，半拉子活也頂不住，誰个財主願意雇这样的小孩呢？那年春节，路凤桐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一粒米也沒有，揭不开鍋盖，路凤桐便与他的二兄弟，拉着一个小爬犁，頂着呼啦啦的雪風，从这个屯子到那个屯子，討飯去了。

积雪遍野，家家閉門，哥俩个在这一家的門前站一会，又到那一家的門前站一会，路凤桐不敢叫，二兄弟也張不开嘴。冻了一天，只好空着两手回家了。

家里，有六个人等着吃呀！

娘說：“討飯，就得大声叫！”他們听娘的話，用額头貼着冰凉的門縫，叫着，喊着，等待着，哀求着。

他們拉着小爬犁，快把冰雪拉化了，春天快来了。

二兄弟終于得到一个机会，給富农王玉家放牲口了。

全家人都高兴，爷爷、奶奶，腿殘廢了的爹，身体衰弱的娘，都高兴。但高兴的日子是那么短！那一天，春雪飘飄，冷風逼人，二兄弟赶牲口出門晚了，就犯了东家的律条。

“你太早了！”东家冷酷地說着。

年幼的二兄弟還沒有來得及細想，東家便從他手中奪去了放牧的鞭子，緊接着便是劈头盖脸的一頓抽打。打了那么久，打的那么重，牛群都惊惶地躲开了。二兄弟先是用手护着头；后来，他被东家踢倒在雪地上；鞭子打断了，用鞭杆打着，不停地打着，雨点似地打着。二兄弟的血，流在雪地上，又被雪花盖住了。荒凉的曠野刮着刺骨的寒風，流蕩着凄惨的呼叫声。那是一个如此黑暗的日子呵！誰來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呢？

二兄弟被打坏了，二兄弟被吓坏了，東家也打累了。二兄弟爬起来，一臉一身都是鮮血。父母不在他的身边，兄弟不在他的身边。要哭，沒处哭；要訴，沒处訴！他帶着一身伤痛，逃跑了。当他从王誠屯子跑到劉家燒鍋屯子，他便倒下，昏迷不醒了。

路鳳桐的爷爷知道他的孙子昏死在劉家燒鍋屯子时，天已經很晚了。老人把孙子背回家，放在土炕上，亲人圍在被毒打的孩子面前，亲人的泪滴在被毒打的孩子身上，亲人的喊声响在被毒打的孩子身边，二兄弟是看不見，也听不見了。

这垂危的伤勢請誰來医治呢？沒有一个錢，医不了的！这仇，这冤屈，向哪儿去告呢？沒有一个錢，告不了的！二兄弟！你能看看亲人的眼泪也好！連这点在无告中的安慰也落了空呵！过了两天，二兄弟便死了。

二兄弟死了，穷人的苦难并没有完。

又是一个春节

二兄弟死后，路凤桐的四兄弟又去给一个姓张的地主扛活。四兄弟年纪小，不能下大田，还是放牲口。每天要把三十来头马和牛，赶到大甸子去。

真是行船偏遇打头风，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兄弟在甸子上竟丢失了地主的四头牛！

四头牛！象塌了天，路凤桐全家都吓昏了。

地主说：路家兄弟要扛四年活，来顶牛钱。

这年是白干了。

春节来了，地主回到街上过热闹年节去了。地主临行时，吩咐他的管事：“路家的欠债还不清，不准借粮！”

狠毒的地主，要饿死路凤桐全家。

没有地方可去，没有路可走。除夕，路凤桐在屯子里走了半天，明明知道是刀山火海，也只得向地主家走去。他去求地主的管事了。

管事推得一干二净，开口说：“东家不准借粮！”闭口说：“东家不准借粮！”

路凤桐想往回走，往回走没有路。家里早就没有吃的了。

千求，万求，地主家勉强答应了——从年初一开始，

鋤三天草，給一斗黃米。

大年初一的早晨，漫天的風雪，路鳳桐穿着妻子出嫁时的那件又小又破的紫花的薄棉袄，用条破麻袋片遮着下身，去給地主鋤草。

馬棚外的积雪有二尺深，鋤刀把凉得粘手，他坐在鋤刀边，哆嗦着，一把一把地鋤着草。不到一袋烟功夫，手脚都冻的沒有知觉了，大腿冻的象刀子扎似的。他只好起来跳一陣，跑一陣，再坐着干活。就是这样，地主家也看不順眼了。

“怕冷就回家吧！”

路鳳桐只好听着，只好坐着，哪怕冻的腿上都起血泡了。

多么艰难的一天过去了，多么长的一天过去了。晚上，回到家里，娘看見儿子冻成了这样，媳妇看見自己的亲人冻成了这样，悄悄地把流到嘴边的眼泪咽了下去。

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

当第三天的晚上，路鳳桐回到家时，他的双手完全失去了知觉，僵硬了，象石头雕成的一样。当娘看見儿子这双僵硬发白的手时，老人忍不住惊叫起来。老人看見，只要一敲，指头就会象冰柱似地掉下来。

庄稼人的手是命根子呵！去年，一場斑疹伤寒，全家人都被傳染，老老小小躺在一鋪炕上，沒有吃，沒有喝，更不用說請医生、吃药了。沒有几天，爷爷死了。又过几

天，爹也死了。母亲把唯一的一件破棉袄脱给爹，光着膀子躺在炕上……路凤桐就成了全家的依靠。而他的那双手呵，竟被冻成冰棍一样！

被惊吓得浑身颤抖的母亲，端来一盆凉水，把路凤桐的没有一点知觉的双手，浸在凉水中。母亲喃喃地为儿子祝愿：“能把冰缓出来，就得救了！”

路凤桐的灰白色的手，浸在冰凉的水中，渐渐，手指周围结上一层薄冰了。渐渐，手背手掌都结上一层薄冰了。渐渐，薄薄的冰变厚了。路凤桐的手终于从冰壳中退出来了，终于活动了。母亲摸着那双得救的手，才放声地哭了。

第二天，路凤桐去到地主家，拿着口袋去装一斗黄米。谁能想到，地主家是骗他的。地主的管事告诉他：“东家说的，牛钱不够扣，黄米不给了！”

黄米不给了！路凤桐差点送掉一双手！他白干了。在地主家欢欢喜喜过春节的日子里，他白干了；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他光着手脚，用麻袋片裹着下身，替地主白干了。他差点气疯了！

有多少苦水在路凤桐的心中呵，能流成河，流成海！

年年苦年年愁

路凤桐是一九一八年在王诚屯出生的。他的父亲是

从小就給人扛活的，父亲二十来岁时，給地主拉粮食，被铁車把一条腿压断了。父亲过早地失去了劳动力，九岁的路凤桐便給地主扛活了。

他的童年是在地主残酷的剥削中度过的。

他开始是放猪。他从未离开过家。母亲疼爱他，但留不住他。艰难的生活使幼小的路凤桐成天跟猪群作伴，当他把猪群赶到野地时，他多少次放声地哭过。哭了，臉上的眼泪又被風吹干了。

他从十岁起，就放大牲口了，放馬、放牛，給富农放过，給地主放过。

冬天在路凤桐的童年里，是最无情，最凶狠的了。穷困得連飯也吃不上，哪有錢买鞋，买袜呢？那些冬天的早晨，冰雪遍野，北風卷起雪花，象烟似地旋轉着，牛馬的身上都挂滿白霜；就是在这样严寒的时刻，路凤桐赶着牲口，向白茫茫的甸子去了。他赤着脚，渾身发抖。唯一的期待，就是牛馬能拉一泡屎或撒一泡尿。当牛馬拉屎了，他就赶忙站在屎堆中，这样来暖和一下他冻得血紅的双脚；当牛馬撒尿了，他就立即站在尿中，来暖和一下冻得象針扎一样的双脚。

路凤桐十八岁那年，才算一个整的劳动力，給地主赶車了。

姓路的地主是以貪婪聞名的。他見路凤桐在冬天还穿着单衣，有时披一条麻袋片子，怕他冻病了影响給他干

活，便把一件馬皮的上衣給了他。馬皮上衣自然比麻袋片子擋風。沒有几天，地主又怕那件破旧的馬皮上衣被路凤桐穿坏了，要收回，不給他穿了。路凤桐是人穷志不窮，他把那件馬皮上衣扔給了地主。他說：“单衣我一样过冬！”

从此，每当他赶車的时候，他就不能坐車了，只能跟着車跑。赶一天車，就跑一天；赶半天車，就跑半天。有时，車走得慢，他得欢跑，跑的老远，又跑回来——用跑来对付严寒。

他除了赶車，还挑过沙子。一天到晚地挑，肩头压了一个坑，那一层又厚又粗的茧皮，紅头火柴在上面一划就着了。

这样劳累，这样受穷，还是不能改变一家人的景况。从姓王的地主家，走到姓路的地主家；又从姓路的地主家，走到姓張的地主家。这些地主都象大石碾子一样压榨他，象狼一样吃他。他的童年在受冷受餓中过去了。他的青年时代也在苦掙苦斗中过去了。三代人八口之家，有的被富农打死了，有的在地主的盘剥之下，穷死了，病死了。最后只剩下哥三个了。

地主豺狼心

难忘的是路凤桐十八岁那年。

他长大成人了，不是干半拉子活了，他心里曾暗暗欢喜过：从此能为家里多挣几个了。跟他同辈的年轻人，也曾羡慕过他腰圆膀宽，力气过大。

那年秋末，他为姓路的地主赶车，拉豆秸。

他把豆秸捆在车上，赶着牲口往屯里去。地主看见了，叫住了他。

“我的饭不是白吃的！”

路凤桐没有白吃地主的饭！哪一天不是起早贪黑地象牛马一样干活呢？

地主凶恶地指着车上，豆秸没有压紧，太松了。

路凤桐从小就沒有穿过鞋子，要把乱七八糟的豆秸压紧，非得爬到车上，用脚使劲去踩。他爬到车上了，踩着，又踩着。再把豆秸抱上去，再踩着，踩着。豆秸上的刺，就象千万支小针，密密麻麻地扎在他的脚上。这样，他一次又一次地赶着车，每走一步都象走在刀尖上。

晚上，他回到家里，他的脚已疼的不能挨地了。

早晨，母亲看見他的双脚，因扎满了豆秸上的小刺而变成黑色了，肿的就象发面一样了。

有什么办法把那数不清的小刺拔出来呢？沒有。已经是早晨了，还得去套车，还得去拉豆秸，还得让那数不清的小刺继续扎进脚里去，还得继续在干裂的土地上忍着疼走着，跑着。

一个工都不能歇的。歇几天，一年辛苦就給地主白

干了。

就是鋼筋铁骨也經不住这样的摧殘！

路凤桐的身体很快就累垮了。

他的心象一座要爆裂的火山，心中压着千仇百恨。

他二十七岁那年，解放了。土改时，他家划为一类，是全屯最穷的一家。

那天，他們哥三个去到地主家，指着姓張的鼻子問，“我們哥三个来还你牛來啦！要活牛？要死牛？”

那天，他們哥三个去到富农家里，指着姓王的鼻子問：“要你偿我二兄弟的命！”

仇恨的火山爆炸了。

一九五〇年他入了党……

一九五三年他带头成立了九戶人家的初級合作社……

結 尾

今年春节，路凤桐哥三个在这难得的聚会中，都哭了。

苦难的日子永远不会回来了，地主阶级是被推翻了，但那些深深的苦难，是永远不能忘的；在土改时的訴苦会上，路凤桐說过这些話，而这天，他又向他的两个兄弟說了。

路凤桐說：“沒有共产党，我一家人就沒了。”

路凤桐說：“公社党委要我休息，我不能休息。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

他最心疼的一个小闺女来到他身边，嚷嚷着：“今年給我买一双新鞋。”路凤桐把小闺女抱在炕上，輕輕地問她：“你知道我小时候穿的什么鞋么？”

阳光照在小闺女紅艳艳的小臉上，她摟着经历过无数辛苦的她的爹了。

1963年8月6日

南阳湖上一家人

——吉林省蛟河煤矿七井老工人潘建章家史

张云升

一提起旧社会，老工人潘建章便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和愤恨，一时热泪盈眶，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顿时阴沉下来。他长叹了一口气，向我们一句句述说了一家人苦难的往事。

—

潘建章（原本姓徐，乳名福子），原籍在山东省微山县的枣栗庄。福子爹徐全仁领着一家三口人，靠着仅有的二亩薄田，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枣栗庄位于南阳湖畔，庄子中间有一条运粮河，贯穿南北，两岸四十余户人家，只有姓杨的地主家是青砖瓦房，他残酷地剥削着这一带的庄户人。南阳湖十年九涝，时常泛滥成灾，不知夺去过多少穷苦人的生命。福子就生在这天灾人祸、苦难重重的南阳湖边。

一九二七年，福子刚刚三岁，秋天，连绵大雨下了四

十五天，南阳湖水暴涨，泛滥成灾。一天夜里，霹雷闪电，风雨交加，湖水和运粮河水汇成一股滾滾巨流，向庄里涌来。福子爹徐全仁在大水浸泡的破房子里手忙脚乱地收拾仅有的一点衣物，二十一岁的母亲把啼哭喊叫的福子放在一个大筐籮里，准备涉水逃命。这时，嘩啦一声，房盖塌了下来，只听见父亲“哎呀”地叫了一声，福子娘不顾一切地在泥水里推着筐籮向丈夫消失的方向扑去。可是，漆黑的暴风雨夜，只見一道道闪电，一声声巨雷，却看不到丈夫的影子……。

天亮了，乌云仍然密布在天空。母子二人昏昏沉沉地被冲到岸上，枣栗庄已經被大水淹没，只有庄里顶高的大树的树梢在水面上摇晃着，白浪滔滔的水面上漂流着门板、房木、尸体……，到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

二

福子爹踪影皆无，又无亲可奔，无友可投，福子娘若痴若呆，紧紧抱着福子放声痛哭起来，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福子娘想，无论如何我也要找着福子爹。于是抱起孩子，拖着疲倦的身体，边哭边喊着丈夫的名字，在南阳湖边转来转去，寻找一个月也没有消息。听说逃难的人都往北方去了，母子二人便餐风宿露，沿门乞讨，也随着逃难的人群，茫然地向北奔去。

天气漸漸冷起来了，福子光着下身冻得直打冷战，媽媽的单衣服也磨得大窟窿小眼子的遮不上身子，又冷又餓，福子娘瞅了瞅眼前的处境，不觉默然泪下，用手捧着福子的臉，悲切地說：“孩儿啊，咱們娘俩要冻死餓死啊！”三岁的福子看見娘哭了，也随着大哭起来。万般无奈，福子娘到荒郊野地的乱尸崙子拣了件死孩子穿的衣服，洗了洗給福子穿上，又在垃圾堆里拣了点破布把自己衣服上露肉的地方堵了堵。

希望一点点地破灭了。虽然向北走了好长时间，仍然沒有找到福子爹的下落。母子二人想要往回走，又不知道家乡在哪里。光記住枣栗庄，又不知哪府哪县，問問过路人，大家都搖搖头。就这样，娘儿俩背井离乡走了一年零八天，流落到一个叫做潘家台的地方。想找个庙住下，可是庄头的土地庙早已住滿了无家可归的人。轉了一天，腿都要僵硬了，好歹在潘家台找着一个破玄帝庙安下身来。

討飯的滋味真苦啊！一天，母子俩要飯来到何屯朱家大院。这地方，当地要飯的根本不敢来，外乡人哪里知道底細。剛一走上朱家的阴森森的黑漆大门台阶，黑心肝的地主便放出了两条恶狼似的大狗，一口将福子拽倒，福子的脚后跟被咬了两个大窟窿，鮮血象泉水一样涌了出来。福子娘惊叫了一声，不顾命地扑过去；幸亏赶集的人上来帮忙，才把福子从狗嘴里搶了出来。此后，福子娘

再也不敢領福子去討飯了，每到一庄，就解下腰中的麻繩把福子拴在庄外的小樹上，或是場院的碾子上，讓他在那等着。可是福子一離開娘就大哭起來，福子娘心亂如麻，松開了繩子，狠狠心又綁上，走了幾十步遠又趕快跑回來看看，无奈，還得扔下“苦命”的孩子，含着眼淚，擔着心独自走去。

媽媽進莊討飯，十有九回是空手回來；福子餓急了，當媽媽不在時，就爬着啃吃道旁的青草和野菜。一來二去，肚子鼓得溜明淨亮，得了“大肚子”病。

這一年冬天，北風刮得透骨涼，福子病得奄奄一息，母子二人在玄帝廟里凍得昏沉沉的。媽媽顫抖地對福子說：“孩兒啊，老徐家就你這一條根苗，指望着你，誰想到你變成這個模樣！說什麼你也要活下去，讓娘好有個依靠！”說着說着，眼淚便流了下來。夜裏，娘倆凍的抱成了一個團，福子娘想起老人說過的話：人前后心凍不着就死不了。于是在自己背心上綁上兩只鞋，在福子前胸上放上兩只鞋，緊緊地抱着孩子靠在廟牆上，他們就這樣苦熬着那些不眠的夜晚。

三

還是窮苦人的心連心，住在廟西邊的一個拣糞的老人潘庆道，看到這孤苦伶仃的母子無依無靠，難以為生，

三番两次地劝福子娘改嫁。福子娘看着身染重病的孩子，只好点头答应了。从此，福子才改了姓名叫：潘建章。

福子的继父潘占庭，四十岁才算成了家。这本是一件喜事，可是在旧社会，对穷苦人來說这却是压上了千斤重担。一家人也是吃这顿愁那顿。福子娘改嫁后总是泪水不干，漸漸眼睛上起了一层云翳，双目只能模模糊糊看見点光亮。潘占庭为了給妻子治病，把仅有的一間破房子和一点地典当出去了。一家人的“飯碗”沒了。万般无奈，最后只好选定一条“活路”，逃荒上关东。

第二年早春，福子继父領着妻子和五岁的福子逃到了大连。潘占庭在碼头上当了裝卸工。誰知道人穷禍多，剛剛对付上一口飯，灾难就象无情的浪头連連打來。

一天傍晚，潘占庭在碼头上卸貨，干了一天了，两腿直发颤，走着走着腿一軟，扛在肩上的箱子一下子摔倒地上。把头赶过来不容分說，照着他的背后狠狠地用棒子打了起来。潘占庭是个倔强人，第二天便得了气鼓病。福子娘泪流滿面地守着这被打得遍身青肿的丈夫，到第七天头上，潘占庭一句話沒說便抛开了她們母子俩，离开了那万恶的世界。他昼夜奔波，可是到死时仍然穿着干活时那件破衣服。从此，福子娘两眼便什么也看不見了。

继父一死，生活的担子落在年幼的福子身上。他領着双目失明的母亲，流浪在大连街头，整整討乞一年。小福子的大爷听见了弟弟惨死的消息，从潘家台赶来把他們

娘儿俩接回去。穷乡亲们凑了几个钱把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赎了回来，让他们母子住下。这个周济点米，那个给点柴；可是大家都是受穷受苦的人，哪有更多的东西啊！瞎了双眼的母亲拉着儿子的手说：“孩子啊，咱们别老累赘着大家伙，还是自己想点办法吧。”于是，福子又拾起讨饭的破铁罐子，在周围村庄讨了四年饭。

到了十二岁，福子去给肥城县的富户王士奎放羊，言定一年工价七块钱。白天放羊上山，连双拖脚鞋也没有，光着下身赤着脚在漫山坡上撵羊，脚被树楂子、杂草划得一道道的口子，直滴鲜血，疼得他一步一咧嘴。夏天还好过，一到深秋就更难熬了，冻得两脚不敢沾地，看到老牛拉粪就赶忙跑过去站在上边暖和暖和。晚上回到家，吃点人家孩子剩下的饭，夜里就蜷伏在羊圈里。

这些苦处福子是不敢向娘讲的，每逢回家，娘便用手摸着福子的脸，一边哭一边说：“孩子啊，妈妈眼睛看不见你，能摸摸你也就放心了！”那时候的生活，真不如王士奎家的一条小羊羔啊！

四

福子十六岁，这一年肥城县来了招工的，说是到东北去，吃的好，赚钱又多。福子瞒着娘与同村的小伙子前去报了名，每人预支了三十块钱。夜晚，由肥城县万德站登

車，車开出了几百里路，化裝成老百姓的八路軍隨同勞工混入車箱，他們向大家点破了招工的騙局，砸开了車窗，領着大家跳火車逃跑了。回到家乡，同庄的年輕人都跟八路軍走了，福子也想去，但是因为有双目失明的母亲，被劝阻留下了。

福子偷跑回来，还使了招工的三十块錢，在家肯定呆不不了，又起了闖关东的念头，便和母亲商量說：“娘儿俩在哪也是苦，不如出去闖闖也許能混上一口飽飯吃。”娘也无法可想，便同意了。福子搀扶着老娘，在一个阴暗的夜晚悄悄离开了潘家台，到东北蛟河县找表哥王培海去了。

有錢的財主哪里认得穷乡亲。福子的表哥王培海住在蛟河县德河沟，家有四十多匹牛馬、两套大車，雇了七八个长工。一見福子瘦小枯干又帶着一个瞎母亲，知道是吃閑飯的来了，小眼一斜，瘦臉立刻拉了下来。

福子娘看不到当时的情景，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述說自己的苦难，哀求王培海留下母子二人。王培海总算是开了“善門”，让这母子俩住在一个破“馬架子”里。表面上見着福子娘还是舅娘长、舅娘短地称呼，其实骨子里却使了坏主意：不到五天就唆使村长抓福子的劳工，亏得福子躲藏的快，两次都沒抓着。

王培海一計沒成又生二計。一天，他笑嘻嘻地向福子說道：“兄弟，这里你是不能呆啦，我看你还是上奶子山

炭矿（现在的蛟河煤矿）吧！”福子看破了这狠心狠的奸计，二话没说，辞别母亲来到了奶子山，在井下开水泵。

五

旧社会下煤窑就是下地狱，日本鬼子、把头、外勤就是阎王小鬼。上班，工人就像一群羊似的被赶进窑洞；下班，就把人塞进阴暗潮湿的工房子里。人不断地死去，奶子山上矿工的白骨铺平了山坡，惨不忍睹。

一九四二年冬天，大雪飘飘，西北风刮得睁不开眼，天刚蒙蒙亮，福子下班了。伙计们求福子给捎“工牌子”（以工牌子来计算工时，当时捎工牌子是不允许的），他走到“牌子房”，刚把牌子放进去，不料被姓孙的外勤看見，一把扯住福子的脖领子，把他绑在“老虎系”（劳务系，当时管工人最厉害的机关，大家都叫它“老虎系”）门外的电线杆子上，也没打也没骂。福子心想：“这回也許冻死我就算完事。”不料姓孙的狗腿子从“老虎系”屋里端出一大盆洗脸水，狠狠地向福子头上泼下来。福子被浇得象一只落汤鸡，转眼之间身上冻了一层冰，脖子底下结了大冰瘤，脸都冻白了。回到工房子，福子一头扎在土炕上便起不来了。

第二年春天，矿山闹起传染性的伤寒病，身体瘦弱的福子也没有逃脱这一灾难。一个破工房里九十多人病了

一大半。鬼子、把头不但不想办法給工人治病，反而怕傳染給他們，派了大批的狗腿子到工房里，把病重的全拖到奶子山后的万人坑活埋了。同房的老乡姜川良怕福子摊上横禍、扔下双目失明的母亲无人奉养，便偷偷地用大筐把福子送回蛟河县德河沟。四个月以后，福子病好了，也失业了，但总算是虎口余生，侥幸活了过来。

六

狠心狼王培海看到福子病剛好，不頂一个劳力用，便把福子找来冷冷地说：“兄弟，如今年月不大好过，我这小戶人家也养活不了闲人，我介紹你到老吳家去帮帮忙吧！”就这样，福子又成了地主吳万增家的“半拉子”。秋天，福子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原状，王培海看見福子挺能干活，眼又紅了，便把福子接回来，炒了四个菜，打了二斤酒，象迎接高門貴客一样，滿面春風地說：“在外边也是干活，不如回家帮帮哥哥，哥哥不在乎你們娘儿俩……。”福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心想：“穷死餓死也不給你这狠心狼卖命。”于是，独自一人离开家上了“木帮”（伐木队）。

进山里伐木头，沒有鋪盖不行，只得花了积蓄的十五元錢买了一床大綵子被。福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盖上被子，心中乐的不得了。沒曾想，睡了一宿觉，被里就蹬个窟窿，用綫一縫，連上这块坏那块。原来这床被子是地主家

多年的老箱底，早已腐蝕了，他白白地受了騙。“木帮”的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整天在大森林里出沒，天不黑不許进工房。吃的是难咽的橡子面，穿的衣服磨得光剩下棉花套子了。福子一年磨飞了两套棉衣、三双靰鞡，到年底一算帳，去了穿的就落下一張嘴。

“木帮”工人有病根本沒人管，看看病的不行了，“山把头”就在病人身上抹上油，用铁勺子刮肋骨，說这是去毒火，刮得病人一声爹一声媽地慘叫。想跑吧，叫“山林队”（山林警察）抓住就得打死。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不久大炮响了，小鬼子倒台了，苦难的日月熬出了头。福子和穷哥們一齐下山，又回到了蛟河县德河沟。打地主、斗恶霸，斗倒了狠心狼王培海，福子娘儿俩才算从深仇苦海里爬出来。

七

一九五一年，福子又回到解放后的奶子山，旧社会到处流浪的母子搬进了嶄新的职工住宅，福子也成了家。福子娘的眼睛瞎了二十七年，寻思是沒指望了，可是，經過矿山职工医院千方百計地治疗，动了四次手术，終於在一九五六年又重見天日，視力完全恢复了。福子娘乐得心都开了花，看見了已經长大成人的儿子，看見了膝前的

孙男孙女，看見了新生活，她又重新拣起針綫颤巍巍地試着給小孙子縫起新衣裳。

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福子娘想起了往事，念念不忘被大水冲散不知死活的丈夫，心想让福子写信找一找，也許能找到。可是不知道哪府哪县，光記个枣栗庄，山东这么大个地方到哪去找枣栗庄呢？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七非來了一批新工人。一天，福子上班，听见一个名叫張金道的山东人說話口音和娘相似，一打听，原来是山东省兗州府微山县的人，离枣栗庄二十余里。哪府哪县找着了，全家人乐得一夜沒合眼。

一封查找亲人的喜信捎到了故乡，徐全仁手捧着这封天外飞来的信，老泪纵横。闊別三十六年，一顆想念賢妻儿子的心象一汪死水又复活了，等不得写回信，星夜登車赶到蛟河煤矿。

一进门，全家人都不敢相认，徐全仁呆呆地站在门口，福子的娘也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这“陌生”人。半天，徐全仁才开口說道：“我从山东枣栗庄来，我姓徐。”福子娘这才失声叫道：“福子爹！”眼泪跟着唰地流了下来，徐全仁嘴唇哆嗦着說不出話來。夫妻二人分別时是一对年輕人，現在已經都白发蒼蒼了。想想过去，看看現在，一家人抱头痛哭，把几十年的苦水都倒了出来。原来，徐全仁被大水冲走后，第二年就回到了家乡，为了找他們母子俩，把仅有的二亩地卖掉，买了些針头綫腦，扮做貨郎，六

年时间他走遍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到处打听亲人的去向，可是母子二人如同石沉大海，影信皆无。后来，他叫日本鬼子抓去硬说是八路军，打得遍体鳞伤。解放了，这条老命才算保全下来。

真是：

旧社会苦难重重暗无天日，
新社会党救娘亲重见光明；
旧社会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新社会家人团聚生活美满。

路

——江西省新建县芦洲公社后洲大队

贫农涂孔美家史

陈浪 朱礼生

引言

从英雄的南昌城沿赣江而下数十里，有一个一望无际的洲子——芦洲，这就是新建县历来号称魚庫粮仓的赣江“二十四围”。这里地肥水足，数以千計的农民，自古以来，就在这里辛勤劳动。

可是，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广大农民备受地主、恶霸、流氓的剥削和压迫，較之牛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們有的惨死在地主的蹄爪之下；有的流离失所，客死外乡；有的卖儿卖女，骨肉拆散；有的想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穷奔苦趴，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旧社会的鎖鏈終于沒有能使他們驅开恶运的黑雾，他們只好由貧困走向破产，最后死亡。

涂孔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今年六十三岁了，滿臉皺紋，留下了当年苦难的風霜。

破　迹

孔美能記事的时候，他家里是一个标准的中农。那时，他有父亲、母亲、弟弟和一个童养媳，一家五口，有祖傳下的三亩田地、三間瓦屋、一头耕牛和齐全的农具。一家人辛勤劳动，日子倒也还过得去。

父亲常把他們兄弟两个叫到身边，伸出一双粗黑的大手，說：“仔思，要不受穷，就要靠这双手。作田人，要肯出力，来日收成好了，也好置办些产业。”

当时，小孔美虽然不能完全領会這句話的意思，但从父母起早摸黑，省吃儉用的行动中，他体会到了庄稼人只有穷奔苦趴，才能有好日子过，所以放牛、担水、打柴、撈草，他从小就不吝惜自己的力气。稍大一点后，他就到田里摔打去了。不几年，就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学会了做田的一十八般武艺。而且他为人老实，勤耕苦作。

就在这时候，他們的邻居，一个叫涂孟引的、圆头肥耳、长着一双老鼠眼的富农，却早已眼紅了，只是孔美家里并无敗迹，才迟迟沒能下手。后来，他借口修房子，故意把屋檐向孔美家这边伸延了两尺多长，然后說“滴水为界”，霸占了他們的地基，并把烟囱对着他們的家門。一家人着实气愤。但是，自古道：“財好入辣”，怎么惹得起

別人？左思右想，也只好忍住了。

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农历正月初一这天，孔美兄弟随母亲給穷亲戚拜年去了。当他們回来时，忽然看見自己屋里起了火；赶到家时，大火已經封住了門。全家除了搶出一条牛，一条小猪和一担火燒谷之外，家中財物都化为灰烬。有人亲眼看見这大火是涂孟引放鞭炮引起的，但他財多勢大，孔美一家忍气吞声，不敢要他賠償損失。

火灾的風波還沒有平息，涂孟引就亲自上門，呲着滿嘴黃牙，口口声声以接濟他們为名，要买过孔美家祖傳的三亩地。

田地就是种田人的命根子，他們怎舍得卖掉呢？何况又是涂孟引作买主！但是生活的重負，又压得他們喘不过气来；父子考虑了整整一夜，才决定忍痛把田地典當給洲上的地主涂孟实，自己就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佃农。

从这一天起，他們更是日夜奔波，想按期贖回自己的土地，重創家業。但是，做牛做馬、流血流汗、吃糠咽菜的結果，除了偿还按月累增的租谷債息，連一家人最低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了。没有办法，父亲只好以二十吊錢的代价，把孔美的二老弟卖给了外村人。买主領人那一天，孩子直叫娘，死拉活扯地抱住母亲的两腿不放；全家嚎啕大哭起来，眼見骨肉分离，但他們又有什么办法呢？

从此，父亲額头上的皺紋增多了，孔美也更沉默了。他把旺盛的精力都投在农活上，一天到晚，只顧拼命地做事，好象只有这样，才能安慰父亲和自己似的。

一波未息，一波又起。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父亲在外做零工，被軍閥军队强拉为挑夫；因为受不了残酷虐待，半路跳入塘中逃脱。后来虽然逃出了虎口，却因天寒地冻，回家之后，就生了一場大病。孔美只好典当借債，含着眼泪給父亲治病。但是，为了掙碗飯吃，稍能走动，他父亲就去給村主守港，而寒冬凜冽的湖風，却使他的病情恶化了。在一个夜晚，狂風卷走了棚頂，他沒向外挪动半里路，就扑倒在雪地上了……

大雪不住地飄落，漸漸地蓋住了他破棉袄上的敗絮，蓋住了他腰間捆扎的黃色草绳，蓋住了他蜡黃的臉孔……。一个在肥沃的芦洲土地上辛勤勞累了一生的农民，就这样悲慘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孔美聞訊赶来的时候，父亲的尸体已經冻僵了。孔美含着深沉的悲痛与无声的眼泪，把父亲驮到家里。

好心的叔叔伯伯們，在极端穷困的情况下，湊了些錢为孔美的父亲买了一付薄板棺材。但是，按照族規，老人过世一定要宴請族尊、长辈、地富乡紳，否則棺木不能入土。孔美只好向恶霸地主涂序栋賒购了六吊錢猪肉。地主当时說：“这点肉拿去吃就是，我們邻里邻舍的，我又不等錢用。”几天以后，孔美在穷朋友們的帮助下，还是还了

五吊另四百文錢，剩下的六百文，言明日后偿还，涂序栋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逼 債

以后，孔美总想还掉这点小債。可是，手賺嘴吃，連年总无盈余，这笔債就給拖了下来。誰知这点小債，却成了地主以后更加殘酷地剝削孔美的借口。

两年以后的大年三十晚，正是地主老財們燒香拜佛，祈禱上天保祐他們大发財源的时候，孔美空着肚子，掮着鋤头，从田里回来。行到半路却听说涂序栋正拿刀子找他要債！他只好暂时躲避一下。

二更以后，打听得地主走了，孔美才悄悄回家。走到屋里，里面黑洞洞的，灶里沒有一点火星子，缸里沒有一顆米粒儿，母亲伏在床上哭泣，妻子抱着五岁的孩子，哼着含混不清的字眼，哄他困觉，孩子直嚷着肚子餓……。

娘告訴他：涂序栋說，欠他的六百文肉錢，今天要还他六担谷；今年不还，就要算“頂头利”，到明年要还十二担。娘最后又說：“他还叫你去画个押；不还，不去，他就要杀掉你，要你今天回話。”說着又嗚咽地哭起来。

孔美一听，說了句“好狠！”心里实在气憤。

娘胆小，老婆也怕事，都劝他去认了这笔債。

唉，有什么法子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去画

了押，应承明年按期归还十二担谷子才算完事。

創　　業

父亲的死，家庭負担的沉重，洲上地主恶霸的狠毒，并沒有使孔美丧失对生活的幻梦；他总記得父亲生前所說的話：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总可以創立一份家业，摆脱貧困。后来，他听別人說离芦洲四十里有个叫丰和洲的地方，荒地很多。在“天无絕人之路”的思想支配下，便產生了出外謀生的念头。

一九三五年，他又不惜高利，千方百計地向几家地主借了五十担谷子的重債，扶老携幼，添制农具，来到丰和洲牙湖湖畔开垦荒地，准备孤注一擲，大干特干一番，以便創家立业。

兄弟两个，早出晚归；孩子打草放牛；母亲、妻子除了照管家务、侍弄菜地，还摸黑熬夜打草鞋、織魚网，一次一次挑到鎮上去卖。

洲田湖地虽然肥沃，单枪匹馬又怎能抵擋洪水的冲击呢？一年夏天，眼看着秧肥苗旺，新谷抽穗，一家几口，笑得合不攏嘴，緊張的劳动后，还計算着可以偿还多少債谷，做着发家的美梦。忽然一陣洪水，冲走了庄稼，也冲走了他們一家人罕有的希望和欢乐！

就在洪水襲击之后，孔美的母亲，也一病不起，与世

长辞了。

此后，又是接連两年的洪水；他們颗粒无收，生計艰难，一家人垂头丧气。孔美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然后从牙縫里迸出了三个字：“回芦洲！”

當他們重回芦洲的时候，地主們一翻陈帳，毫不留情地宣布，他們还有三百多担谷的积欠。还不清的債，付不尽的息，象一条条毒蛇紧紧地纏着他們的周身，使他們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孔美下定决心，等还清了債谷之后，宁願討飯、餓死，也絕不再向地主借債。

在茫茫的黑夜中，他还有一線希望——相信自己身强力壮，三弟、孩子也都大了，穷奔苦趴，总能偿清債務，置得一份家业，“天无絕人之路！”

第四章

孔美一家返芦洲后，租种了地主涂春苟的一十八亩滩田，一家老小，又开始了在地主压搾下的奴隶生活。

这时，日寇入侵，国民党反动派不事抵抗，反而趁此时机抓丁派款，勒索人民。孔美兄弟二人白天不敢出門，躲丁躲仗，夜晚插秧作田。

滩田地势低洼，易于成澇，他們到处开沟排水；地质貧瘠，产量不高，他們全家积肥，还替別人代养小猪，积储猪糞，一齐挑到田里，鋪了一层又一层。为了第二年多收

点谷子，他們还总是从牙縫里省下点谷子，換來了紅花草籽。

由于他們精心苦作，經過三四年光景，十八亩滩田变成了良田。收入增多了，也漸漸地能还一些旧債了，孔美一家好不高兴。

一年春天，孔美看着滿田的紅花草长得墨綠墨綠的，心里正高兴地盘算着，几年之后还清了債谷，再积錢置田买地的时候，忽然地主涂春苟的人来叫他。

孔美心里猛一惊，象一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跑到涂春苟家里时，本村的流氓恶棍涂怀江还在跟地主咬耳，桌上堆滿着礼品。

啊，夺佃！这是天外飞来的横禍。眼下紅花草长得正好，谷秧出齐，地主却要夺佃了，这叫他一家人怎么活命呢？孔美含泪恳求，涂春苟一副恶象地甩出契约說：“笑話！老子的田，老子还不能作主？”說着就轉身走掉了。流氓涂怀江却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說：“孔美，俗話說得好，‘人走天下路，馬吃天下草’，你人勤勞力强，还怕餓肚子？”

绝望中的孔美，忽然气愤地指着涂怀江說：“你……”話剛出口，涂怀江就摆出一副流氓象，边走边說：“春爷的田，你种得，老子也种得！”一轉身也走掉了。

孔美满腔愤怒地离开地主家門，門外，烏云蓋天，要下雨了。

一路上，他不平地想到：世上地主、老財都是頂惡的人，窮人在这个世道上，無論你怎么穷奔苦爬，也難抬頭……

受尽欺侮，孔美决心不在芦洲呆下去了。他打发妻子、孩子到南昌去帮工，給資本家、闊太太們做佣人，弟弟无处可去，就在四乡討飯，剩下孔美一人，把房門一釘，只身走到河下撑船度日去了。这时孔美已經四十七岁。

邊　　緣

這已經是臨近解放的時刻了。

洲上的大地主們，早已逃之夭夭；小地主們整日提心吊胆，祈求神靈保祐。为了敬神拜佛的需要，地主涂序祿雇孔美的船到南昌去运火紙、綫香、鞭炮等迷信品，当时言明運輸力資偽币四百元。可是东西运到芦洲后，地主涂序祿閉口不提力資的事。靠着卖劳力为生的孔美，家中哪有隔宿之粮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上門討了两次，涂序祿却支支吾吾地說：“过两天算，过两天算！”

当孔美第三次上門时，地主竟破口大罵：“操你个娘，比要命債都急！”

孔美不服氣地說：“你罵人？”

“老子罵你，还要揍你呢！”涂序祿一副凶神惡煞的样子，順手檢起一块石头，就朝孔美头上打来，頓時使他嘴

角鮮血直流；接着又是一石头，打得他的左臂也立时青肿起来。地主还在发火，幸亏两个长工把孔美救走了。

孔美站在芦洲堤头，望着墨黑墨黑的江水，脑子里怀疑起“天无絕人之路”那句老話了——世上有地主、恶霸拦路，穷苦农民有什么不絕之路呢？

这时，这个穷奔苦趴了一辈子的农民涂孔美，望着滚滚的江水，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想着今天一家五口（妻子、儿子、媳妇，討飯归来的弟弟和他自己），挤在一間破茅棚內，共盖一条破棉被的生活。这条补了几层漁网的棉被用了多少年，在他們的記憶中，已无可查考了。他們身上只有一件破棉衣，夏天拆除棉花当单衣穿，天冷再把棉花装进去。饭籃里装的是糠团、柳根、野菜。一条千疮百孔的小船。还有呢？就是連他們自己也数不清的債谷。

这就是旧社会給貧苦农民所安排的一条生活道路：貧困——破产——死亡的道路。

茫茫蒼天，烏雀飞翻。奔流不息的贛江水呵！你流尽这旧世界的苦难，洗刷这人間的不平，开拓出一条广闊的新路吧！

迈 进

贛江江水急促地倾流着，終於流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間。芦洲解放了，全国解放了。和全国五亿多农民一

样，芦洲人民开始走向了新的生活。現在，在集体化經濟的康庄大道上，芦洲人民的好光景一年胜似一年。孔美一家自然也不例外。

去年，六十三岁的孔美老人，共做了二千七百多个工分，按他八分半的底分計算，共出勤三百二十多天。家里养了两头肥猪，一头卖给国家，买回了球鞋、水瓶、臉盆等等日用品；另一头一百六十多斤，全部自留食用。現在孔美一家五口（弟弟已分居，他也添了一个小孙女）共有新棉被六床，用品齐全，老人还为儿子买了一張价值几十块钱的宁波床。較之过去，真有天壤之別。孔美常笑眯眯地夸耀着自己的生活过得鮮甜鮮甜的。

集体化的道路，更加激发了老人的积极性，他努力劳动，还积极争取进步，他常常要求大队書記帮助，渴望早日入党。他一連八次被评为模范社員，最近又当选为后洲大队貧下中农委员会的副主席。他說得好，“現在我才曉得了，不是什么‘天无絕人之路’，是党中央、毛主席領導好！是集体化道路走得好！过去的路子越走越窄，今天的路子才越走越宽，只有紧紧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才有铁打的江山。”

我被卖过七次

上海市川沙县六里公社
下西浜大队妇代会主任 范惠珍

在旧社会，我被卖过七次，受尽了地主、官僚的摧残，所受的苦，几天几夜也訴不完！

八岁落入“狼窝”

我只知道我是湖南人，姓范，小名叫妹子，生在湖南小营州。家里除了爹娘，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們住在一座祠堂后面的一間破茅屋里。爹娘租种地主的土地。一九三〇年的冬天，那时我八岁，地主家里来了四五个狗腿子，張牙舞爪地向爹逼租。我們草糠充饥，衣不蔽体，哪里交得出什么租呢？地主的狗腿子逼不到租，就打烂了我家仅有的一点东西，我吓得直哭，躲在爹的身边发抖。过了几天，地主派人来把我拖了去。后来我才知道，爹因为交不起租，只好噙着眼泪把我卖给地主当“童养媳”。

地主哪要穷人家的女孩做“童养媳”，不过是把我当

奴隶使喚。我虽然只有八岁，可是燒飯、洗衣、打水、割草、砍柴样样要做，每天从鸡叫做到半夜。我一年到头連冷粥殘羹也吃不飽，夜里睡在一張破席上，冬天也只蓋一条破棉胎。娘知道我在“狼窩”里受苦，有一天，要我哥哥偷偷地送一只鸡蛋来給我吃。不料被地主婆看見了，她瞪着眼睛說：“你也有福气吃鸡蛋？”說着就把鸡蛋搶去給她的儿子吃了。

吃不饱，穿不暖，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到了十岁，我累倒了，两腋下生了两个大疙瘩，两只手痛得动也不能动。我实在吃不消了，就在一天夜里，乘地主熟睡的时候，偷偷地逃回自己的家里。我和爹娘两年不見面了，爹娘看到我人不象人，鬼不象鬼，都楞住了。我一头栽倒在娘的怀里，哭着說：“娘！我是妹子啊！”娘也哇地一声哭了。

第二天，地主婆坐着轎子找人来了。我吓得逃到屋頂上。听见地主婆在屋內恶狠狠地說：

“你們要妹子很容易，她两年的吃喝穿著統統給我清算！”

“妹子已折磨成这个样子……你发发善心吧……”娘胆怯地爭辯着。

“沒有錢，拿人来！”

于是，我又被押回“狼窩”。地主婆拿了一根粗木棍，沒头沒腦地打了我一頓，痛得我在地上直打滾。这一天，連一口水都不給我喝，晚上还命我跪了一夜。

兩年中我被轉卖了五次

一九三二年，我十岁，狠心的地主以四十六块錢的代价把我卖给离家更远的一户大地主家里当丫头。

我还记得，那天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勾结人口贩子，骗我说是去看我的娘。当晚，他们就把我拉到一个镇上，把我关在好象是一家客棧的擋楼上。我知道他们不存好心，急得双脚蹦跳，哭喊着：“我要娘啊，我要看我的亲娘！”可是不管我怎样呼喊求救，却没有人理睬。

三天以后，新的东家派人来把我连搶带拖地领走了。这家地主的房子很大，大门、小门一道又一道，阴森可怕；佣人、丫头有十多个，光地主一人就要有三个小丫头服侍他。地主睡觉的时候，我们跪着，一个替他敲背，两个替他敲腿。敲呀，敲呀。一直敲到他象猪一样打鼾为止。地主睡着后，这时我们的两手已酸软了，两膝也青肿了，可是还得替他烧红枣莲心湯。地主一觉醒来，喝了莲心湯，又要我们给他敲背、敲腿，等他熟睡后，我们才能去睡觉。两眼刚刚合上，天就亮了，我们又要起身站到地主的床边，听候使唤。地主眼一睁，如果看不见人，我们就少不了受一顿毒打。

有天晚上，我替地主敲腿，累极了，眼皮实在张不开

了，打了一个盹，不小心，一滴口水滴在地主的腿上。地主霍地坐起，大罵道：“你这个賤貨！你的口水滴在我的腿上，今生今世也抹不干淨。”說着噼啪兩巴掌，打得我鼻血、牙血直流。他由于打得過猛，自己的手也有些痛了，更是怒不可遏，就叫另一个丫头去拿铁棒来打我。这个丫头吓得木楞楞地看着我。地主見她站着不动，就当胸一拳把她打倒。接着地主婆就用头上的銀釵朝我臉上亂刺。地主的心是多么狠毒啊！

不久，我又惹了第二次禍。一天，我端茶給地主喝，不小心，大拇指蘸着了一点水。地主看見了，臉一沉，将我一把拖到楼梯边，猛的一推，我从楼上滾到楼下。头跌破了，鮮血直冒，頓時昏了过去。后来由小姐妹把我扶到床上。我醒过来，看見小姐妹站在床边，我眼泪直流。我想，这种日子哪一天能了結呀！

过了几天，那个地主就把我轉卖给另一个地主。

这个地主是个大胖子，連自己的脚也抬不起，活象一头死豬。他坐着轎子下乡收租，我跟在轎子后面走。地主一到佃戶家門口，人還沒有在凳上坐定，就要我替他敲背。因为这一年收成不好，佃戶們交不起地租，地主收租不順利，就把我當出氣筒，說我生相不好，不吉利。几个月后又把我轉卖掉了。

这次我被轉卖给一个有大小老婆的地主。这个地主家里有五个丫头，后来轉卖掉三个，一个又被大老婆打

伤，我一个人要服侍地主的大小老婆两个人。大老婆喚我去，小老婆就用手擰我的臉，嘴里罵着：“死鬼！叫你到这里来，就不許你到她那边去。”小老婆喚我去，大老婆又用手擰我的臉，嘴里也罵着：“死鬼！叫你到我这里来，就不許你到她那边去。”我的臉，就这样被她們擰得青一块、紫一块。她們这样折磨我，还不准我哭出声来。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得下去呢？一天晚上，我又准备逃走。但还没有逃出门，就被地主的大小老婆抓住了。她們用燒紅的火鉗燙我的脚底，我痛得喊救命！在那个时候，又有誰能来救我呢？

十一岁那年，我又被轉卖给一家做官的人家。他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十四五岁，一个十六七岁，都要我这个十一岁的丫头服侍她們穿衣、吃饭，哄她們喝牛奶。稍不如意，我就得任她們打罵，当官的还要責怪我服侍得不好，用“断命棍”打我。“断命棍”，是当官的特地做了专门毒打丫头用的木棍，我們一看見这种木棍，汗毛都会竖起来。

第二年，我又被轉卖到南京另一个当官的家里。有一次，我吃力地提着从“老虎灶”泡来的两大壶开水，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运输汽車撞倒了，打翻的开水潑在我臉上，右腿也被汽車的前輪压伤。我当场不省人事。一个看弄堂的老人和汽車司机一起把我送进了医院。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半月，腿伤还没有好就被迫出院了。当

看弄堂的老人把我扶到当官的家里的时候，这个家伙对我說：“哼，你为啥沒有死掉！”

哪里有我路一条

在南京又过了一年，我想念爹娘，想得快瘋了，一天到晚喊着爹娘。当官的討厭死了，就对我說：“你要娘，我給你找个寄娘吧！她在上海，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就被送到了上海。我的“寄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广东人，姓庄。她长得很胖，人家叫她“阿肥”。这胖女人对我說：“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娘。你就叫庄双蓮。”我的“娘”？天啊！这是什么娘啊？“阿肥”在收下我以后，就把我荐到官僚和老板家里去当佣人。我象牛馬一样地一年做到头，掙得的一点工資全給“阿肥”霸占去了，而我用的、穿的，她問也不問。真是：跳出“狼窝”，掉进“虎口”。在当时的社会里，哪里有我路一条！

又熬了四年，我十八岁了。“阿肥”看到我已經长大，怕我逃走，就动了一个坏主意。一天，她裝着关心似地对我說：“双蓮，你年紀大了，娘托人給你做媒……。”邻居知道了，就提醒我說：“双蓮，媒人媒人，两面瞞人，你要向你娘問問清楚。”我就去問“阿肥”。不料，“阿肥”听了勃然大怒：“不要臉，亏你問得出口……”說罢噼啪两个巴掌，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

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我“出嫁”了。丈夫是浦东人，家里住在現在的六里人民公社下西浜生产大队刘家宅。那时他在上海做雕刻工人，家里一貧如洗。他为了娶我，不得不借債，又当掉了可以作典押的东西，才付給“阿肥”一笔巨款。結婚时家里用的桌、凳都是借来的。我的丈夫每月收入不多，維持两个人的生活，已經很吃力了，哪来的錢还債？为了这事，后来他急得生了病。病中他把我叫到床前，对我說：“惠珍，你到我店里去把我的皮夹子拿来。”我到店里把皮夹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当票，再过三天就滿期了。我对着皮夹子直哭，一直哭到家里。

丈夫病了，家里沒有一点吃的。我別无出路，只得噙着泪水去找“阿肥”荐我去当佣人，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今天我过着幸福的生活

又熬了几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了。我和广大人民一样，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当时我們刘家宅也駐了解放軍，他們向我們宣傳党的政策，看到我家生活困难，就送飯來給我們吃。我双手捧着滿碗的白米飯，流出了感激的热泪。乡干部也經常来关心我，帮助我进步。不久我当上了妇女組长。真沒有想到我这个过去被人家踩在脚底下、連做人的权利都沒有的奴隶，能同劳动人民一

起坐江山，当家作主。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以后，我分到了土地。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党号召我們組織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我听党的話，坚决跟着党走，参加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在党的教导下，我的觉悟不断提高，在一九五三年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又当了妇代会主任。

依靠了組織起来的力量，生产发展了，生活也逐步提高了。我和丈夫虽然身体都很弱，农业生产的技术又不高，但由于靠了集体的力量、領導的关心，自己勤儉过日子，十多年来不仅吃饱穿暖，还逐步添置了不少农具、家具和衣服等，一九五六年还新造了一間房子。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生产进一步发展，收入又有了提高。一九六二年除了每个月的工分預支，年終我家还分到二百八十多元。

現在我有四个孩子，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大儿子今年十七岁，讀到初中，現在已經參加社里的农业生产劳动。二儿子、三儿子都在讀书。最小的一个也三岁了。他們現在過的生活，同我的童年生活相比，真是天差地別！

喝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本。我要永远記住剥削阶级种下的仇恨，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还要把自己在旧社会的血泪史讲給我的小輩听，一代一代傳下去，讓他們知道我是怎样过来的，永远不要忘本，永远听毛主席的話，跟共产党走。

李健忠整理

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

上海邮电器材厂机械工程师 蔡金龙

我今年五十四岁了，但我真正的生命，却是从新中国成立那时开始的。

抚今追昔，忆苦思甜，不禁热泪滾滾。我要倒出解放前四十年中在我心头积存的苦水；我要歌唱解放后十四年来党和毛主席給我的恩情。

苦 海

我生在上海浦东乡下。祖祖輩輩都是佃戶，世世代代受地主欺压，家里沒有一个識字的。当我还娘肚里时，父亲就替我取了个响亮的名字——蔡金龙，願我成“龙”成“凤”，摆脱地主对我家世代的压迫和盘剥。到我八岁那年，父亲向地主借了十块銀洋，让我进了一所私塾念书。哪知道，我念了一年私塾，沒有学到什么，家里却愈过愈穷，三天两头揭不开鍋，更还起为我讀书借的“閻王”債。沒办法，父母亲只好让我退学，含着眼泪把我送

到地主家去当放牛娃抵债；我母亲也只得离开家，到上海去帮佣。

这个地主是只“笑面虎”，没开口，先露着焦黄的门牙嘿嘿笑。一天，他把我叫去，脱口喊了我一声，顿时就收住了笑脸，竖起眉毛说：“穷八字，富貴名，啥个‘真龙’‘假龙’？今后不許你叫这个名字。”听了他的話，我肺都气炸了，心想：“穷人连个好听的名字都不能随便取嗎？”接着他又嘿嘿地笑了两声說：“冬天牛吃的草料不够，你白天把牛放出去找草吃，晚上再喂料房里的干草。”說完，他就跑进房内吸大烟去了。

隆冬酷寒，滴水成冰。我裹着一身遮不住羞的烂单衣，出外放牛。北风吹在身上象刀割，光着的双脚生满了冻疮，踩在冰冻的地面上，疼得象乱箭穿心。这样的痛苦生活真难熬啊！

快近年关了，地主整日在家吃鱼吃肉；而我却还在外边喝西北风。我实在熬不住了，一天，偷偷地从牛棚里拿了些干草烤火，暖和一下身子。谁知这事被地主知道了，他象凶神恶煞般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跌倒在地上。狠毒的地主又用鞭子没头没脑地抽我，一面抽，一面罵：“小赤佬，你要死了！老子叫你这条‘金龙’变成一条‘毛虫’！”一顿毒打，把我的脑神经和耳鼓膜打坏了，我昏倒在地上。待我醒来后，地主便一脚把我踢出了黑漆的大门。

我冒着風雪，噙着泪水，跌跌撞撞跑回家，却不料母亲也被人家解雇回來了。她看到我遍体鱗傷，血迹斑斑，把我抱到怀里，伤心地痛哭了一場。半夜里，我渾身象火燒一样，特別是被打坏了的耳鼓膜痛得象針扎，里面嗡嗡直响，痛得我在床上翻来滾去。由于无錢医治，我的伤越来越厉害，整天发高燒，昏迷不醒，差点送了命。后来，命虽保住了，但耳朵却成了“重听”（听力严重减弱）。

地主的心腸真是狠，把我害成殘廢还不甘心，見我活了，又逼我再去替他放牛。我母亲不忍心让我再去受罪，就向地主求情，說我已經殘廢，不能再去放牛了。地主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了两声說：“不回去，也可以；馬上还清欠債，算清飯錢！”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心一橫，把自己起早摸黑开出来的三亩多荒地給地主抵了那笔“閻王”債。地主夺了地，还幸災乐禍地罵我父亲說：“蔡家祖宗缺德，生了个‘現世报’！”

一九二三年，我一家四口都病倒了。不久，小弟弟不幸夭折了；父亲也染上了瘟疫，手臂上又生了一个大毒瘤，鮮血和着膿水直往外涌，痛得日夜喊叫。因为沒有錢医治，就这样病死了。

父亲死去不久，我的病也加剧，几次昏死过去。一次，我昏死过去以后，母亲以为我死了，一边哭着，一边用破席把我卷出去，准备把我埋葬在父亲的坟旁边。这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母亲又把我抱起，一摸，发觉我还有一

絲熱氣，就把我抱了回來。她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把我緊緊地摟在怀里，直到我蘇醒過來。當我醒來的時候，看見破屋中一支殘燭，發出幽幽的微光，照着母親慘白的臉。母親見我蘇醒過來了，惊喜若狂地把我抱得更緊，頓時，我瘦小的臉頰滴滿了她的熱淚。

這次我雖然又死里逃生，但是我的耳朵却聾了，什麼也聽不見；聲帶也壞了，不能說話。我就是這樣被萬惡的舊社會摧殘成了一個又聾又啞的人。

狼 窮

鄉下不能活命，母親就求情送禮把我送到我舅父開的上海金森記五金廠里當學徒。那時，我才十三歲。

天下財主一樣狠。舅父並不因為我是他的亲外甥而“另眼看待”；相反，利用我生理上的缺陷，百般地虐待我。記得我頭一次煮飯，不當心煮壞了，我舅母——老板娘怒氣沖沖地走過來，擰住我的耳朵，伸手就給我兩巴掌。打了不算，還不准我吃飯。我只好餓着肚皮去干活。又有一次，我看見朱阿菊老師傅用銅水鑄模子，就走攏去想學點技術。朱老師心腸好，他作着樣子拿起一杯燒沸了的銅水，慢慢地倒進一只小模子內，一面倒一面吹氣。我也照樣倒，照樣吹氣。我恐怕氣力不夠，就使足了全身力气吹，不料把倒下來的銅水都吹在水門汀上。這件事又被

老板娘发觉了。她用双手使劲地拧着我的耳朵，然后又左右开弓打我。我立脚不稳，一头撞在风箱上，差一点跌倒在烧沸了的铜水中。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虐待，就逃了出来，流浪在街头。但是，我接连逃了三次，被老板抓回去三次，每次都被打得浑身鞭痕累累。逃跑不成，我只得在厂里继续做牛做马。我日夜劳累得不到休息，身体很虚弱。有一天，我从三楼提着一大铜吊（水壶）开水下来，在下楼的时候，突然头昏眼花，两脚一软，跌倒在水门汀地上，右脚背被开水烫得满是血泡。狠心的老板娘不但不给我治疗，反而把我锁在鸽子笼似的小阁楼里受罪。三伏天，闷热的“鸽子笼”里充满了臭气，臭虫、蚊子叮得我全身红肿，我的伤口也烂得出了蛆。幸亏朱阿菊老师傅偷偷地弄了一点豆油给我涂伤口，伤口才慢慢地好了。

我在厂里做了三年学徒，从朱师傅那里学到了一点技术，总想可以满师了。谁知，老板要我拿出四十块银洋办“满师酒”，否则还要做三年学徒。天哪！我身无分文，哪有钱办酒呢？结果，只得继续当学徒。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一直熬到了第九年，那时我已经有一手熟练的技术，老板才让我满师。老板欺我是一个哑巴，给我的工资只有一般工人的三分之一。真是气人哪！我早就想离开这个“狼窟”，但苦于没有机会。后来，这个工厂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了，我才离开了这个“狼窟”。

地 獄

在旧社会，殘廢人到处受欺凌。我离开了金森記五金厂后，又先后到过四家工厂做工，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記得我在一家工厂做了半年工，結果沒拿到半分工錢，氣得我病了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被騙子騙到日本鬼子办的一家軍火工厂做工。在那里，每天都有我們的同胞被日本鬼子无故毒打。我是一个哑巴，遭受的苦难，就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当时，日本鬼子为了防止我們工人反抗，就規定各車間工人不能相互走动。我不懂这个規矩，有一天无意走进了另一个車間，看見一个女工的头发被卷进机輪里去了，我急忙飞步向前，用左手拉机輪，救下了那位女工，但我的左手腕却被削去了一大块肉，当场就昏倒在血泊里。日本鬼子不但不給我治疗，反而誣說我是“密探”，把我抓起来拷問了一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这个工厂。我以为国民党是中国人，总会对中国工人好一些。其实，他們是一丘之貉。他們剛接收工厂不久，厂里一些工賊混水摸魚，大量窃卖厂內器材，肥飽私囊。我当时耳朵听不見，也不知道他們干什么。有一次，我看見別人拿东西，自己也拿了一小卷旧带尺，想做褲腰帶，誰知被大門口卫兵查到了。那些工賊就乘机嫁禍于我，誣賴我是“大盜窃

犯”，把我毒打一頓，硬逼着我这个哑巴招“口供”。我是哑巴，有冤說不出。他們把我打得皮开肉綻以后，又把我关进了阴暗的监牢。我在牢里渾身生滿了疥疮，还得了严重的胃病。后来我从牢里逃出来，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多少个凄風冷雨的夜晚，我随着苦难的人群，蹒跚在黃浦江畔。这时，母亲已病死在乡下，家里仅有的半間草棚也被土匪放火燒掉了。我望着江水，想到我悲苦的身世，什么时候才能結束这苦难的生活呢？

新 生

一九四九年，随着上海的解放，我也得到了新生。我这个在旧社会中受人歧視的哑巴，从此做了国家的主人。

在我工作的单位里（当时在交通部上海电訊局修配所工作，一九五二年調到上海邮电器材厂），领导上对我非常关心，处处照顾我，时时帮助我，使我能順利地克服了因生理缺陷而带来的种种困难。就在一九五〇年，我在厂领导和工人帮助下，改进了电报机内的一个零件的制作方法，提高了工效四十倍。

党的恩情似海深。我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身体很虛弱，党就送我到杭州去休养；党还千方百計为我治疗聲哑，一九五五年，我去北京开会，邮电部負責同志亲自把我送到医院去治疗。虽然医药不能再治好我的殘疾，但

这件事却永远銘記在我的心上！

一九五八年，这是我終生难忘的一年，我光荣地参加了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当組織上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的时候，我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我，一个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和歧視的哑巴，也成了工人阶级先鋒队中的一員，这怎能不叫我激动、高兴啊！

那一年，厂里掀起了技术革新热潮。为了使电傳机能成倍地增产，我們嘗試制造一副复杂的模具。过去，这种模子是經過泥坯翻砂后制成的，工效低、质量差；这次要求造出的一副模具，直接用金属溶液浇铸。这在新中国邮电事业中还是第一次。厂領導經過研究后，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給了我。

在党组织和工人同志的鼓励下，我毅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制造过程中，党给了我无限的力量，使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比如看图纸吧，以前我制造的模具，都是凭几十年积累的經驗，靠打“腹样”而制作的。这次試制模具的图纸有一大堆，而且相当复杂，我都不熟悉。于是，我下苦功，揣摩每一張图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每張都記住了，然后在脑中拼成一个假設制成了的模具。就这样，經過不断的努力，我們終于把这副复杂的模具造成了，生产工效提高了二百八十倍，产品质量也显著提高。

十四年来，我在党的教导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在邮电器材的革新方面，每年都做出了一些成績，还創造了十

四年不出廢品的紀錄；同时，也帮助旁的同志挽救了不少将要报廢的成品。党对我做出的每一点成績，都非常重視，还給我荣誉和奖励：数次評我为先进生产者；让我三次上北京；一九六〇年，党又提拔我当了工程师。这些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一九六一年“五一”节，我和全市二百九十多一位先进生产者，在上海电机厂會見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当时，我真有千言万語要向毛主席傾吐，但我说不出来。我只能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我对毛主席深深的敬意，来表达我内心所要說的話：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解放了我，使我摆脱了旧社会的折磨和摧殘，过着幸福的生活；是您培养了我，使我这个受尽凌辱和欺压的哑巴成为新中国的工程师。这海洋深的恩情，我怎样来报答啊！

我感到党和人民給予我的荣誉和奖励太多了，而我給党和人民所做的事却太小太少。今后，我要在党的領導下，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貢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人殘廢，心不殘廢，一顆紅心永远向着党！”这就是我的誓言。

接：一九六三年五月上旬，蔡金龙同志在《解放日报》上見到了《我这十四年》的征文启事后，又激动，又着急，他心里有很多話要說，可是他既不会說，又不能写，着急了半天，后来找了一度也是个哑人（后来治好了）的王光汇同志来帮助他。他們俩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合写成了这篇文章。

沒有名字的燒鹽工人

——一个工人家庭在解放前的遭遇

李累之光

今年八月，我們訪問了四川自貢鹽場。

我們記下了一個燒鹽工人家庭的遭遇。

一

一九二五年，劉平山十五歲，家住富順農村，爹種王三畏堂的土，媽是殘廢人。一家人，每天灌一頓高粱羹，不小心灑在地上，狗都舐不上嘴。住的半間破草房，晴天屋裏裝太陽，下雨屋頭就象小河漲水。那一年，平山爹累得吐血，還沒有交够租子。地主宰押金，收田土，整得平山爹一倒床就爬不起來。半夜過了，房頂上的雨水還在往下淌。劉大娘双脚跪在牀上，兩手端個破斗笠遮着丈夫上半身；平山的小妹，伏在牀上抱着爹的腿；劉平山兩脚泡在水里，抓住爹的手。他爹睜開眼睛，喘了几口氣，才說：

“大娃哩，我只当冷处該朝热处走，沒諳是雪上又加霜。这陣，爹跋不贏紳糧，唯願你們是菜籽命，高种高生，矮种矮长。……”

話還沒說完，爹爹死了。夜，墨黑。雨水順着土墙不住地流，板子床也象被水抬起来了。

一家三口，担子落在刘平山肩上。他帮地主放牛，每月三个双板銅元(六百錢)，地主還說他沒帶鋪盖，睡老板的谷草，要扣二十个錢。平山气不过，連草带背篼，一齐摔进牛栏，摸黑跑回家里。

回到家里，大娘又把他叫到床前，說道：“磨骨头养腸子都拖不走了，只有把小妹抱給人家。……”妹妹才八岁，就要嫁人！平山嚷着，“不！我不……”捏紧两个拳头，冲到門口。还不懂事的小妹妹呵，正坐在門口阶沿上，拍着小手唱：“月亮光光，芝麻土头燒香。……”那天晚上，小妹出奇的高兴，睡着了，还迷迷糊糊地唱着：“黃絲螞蟻，吹吹打打……吹吹打打。……”她哪里知道，明天她就要嫁給人家作童养媳了。

烏云遮住了月亮，妹妹真睡着了。刘大娘脫下小妹的衣裳，一針針，一縫縫，补疤連縫；又走到塘边，細心地洗，慢慢地搓，她怕把縫好的衣服搓烂了，更怕自己再也洗不到小妹的衣服。她走回屋里，站在床前，痴痴地看了女儿好一陣，又偏偏倒地跨出大門，走出墳子，走过黃桷树，……平山这才明白，媽是朝爹的坟上走呵！他连忙

追上去，一把抓住媽的手臂，估倒把媽媽扶回家里。刘大娘睡在床上，把女儿抱在怀中，眼泪跟倒手臂流。刘平山坐在門坎上，一夜沒有上床。

第二天早晨，大娘給女儿洗了热水臉，又拿起那半截梳子，給她梳头发；扎成一根小毛辮，辮子才搭齐后頸窝。小妹摸摸毛辮，又摆着脑壳搖毛辮，嘻开小嘴对着媽笑。吃早飯了，大娘端起高粱羹羹，半天吞不下，把羹羹倒給女儿。小妹从碗口边抬起一双大眼睛，偏着脑壳看媽媽。“娘，我吃饱了。”她双手把碗端到媽的面前。大娘說：“乖女，你要走路，上坡下坎的……”小妹又吃了一碗。媽想再給她添一碗，鍋巴都沒有了。大娘拉着女儿的小手，哽哽噎噎地說道：“乖女呵，家里沒吃的，你到謝二爸家去吃干飯……你爹走得早，娘对不起你們。”小妹楞着眼看看媽媽，又看看哥哥，突然一头栽到媽的怀里，紧紧抓住媽的衣裳，放声大哭。哭了一陣，她才把头抬起来，用手去揩媽媽臉上的眼泪。才八岁的小妹妹，一下象懂事的大人了，她喊道：“娘呀，哥哥呀，你們不要哭，我去吃干飯……我去給你們拿米回来，拿錢回来，你們好煮干飯吃嘛。”

刘大娘牵着女儿的小手走了。平山双手蒙着臉，咬着牙齿坐在阶沿上。小妹妹走不多远，回过头来，閃着一双大眼睛，喊了一声哥哥，平山突然站起來，一趟追到黃桷树下，抱起妹妹就朝家里跑，嘴里嚷道：“我死也不得

让她去！”媽媽拉住他，哭着說：“大娃哩，放她条生路呵……”又把女儿拖过去背在背上。大娘送女儿回来不久，病了一个多月，沒拖到收谷子，死了。

刘平山安埋了娘，心想在乡里山穷水尽，到盐場也許好点；反正凭气力吃饭，闖一闖金窝銀窩，肯信嘴巴会遭涼拌。他到爹娘坟前磕一个头，跟千百万农村破产逃到城市的农民弟兄一样，背起两双草鞋，走向自貢。

二

刘平山來到自貢，坐在河边歇气，听到店子里的人議論紛紛，說是刘湘伙起各路軍閥打敗了楊森，各路軍閥又一齐接到自貢，来开啥子“善后會議”，街都撓翻了。他闖上大街，只見长不到两里的街上，成了一座兵山，手枪碰着連枪，人都挤得要掉耳朵。他轉进背街一条巷子，又見一大堆人，圍着在看墙上貼的对子，有人在說：“嘿嘿，把善后會議几个字都包进去了，安逸！”有人大声念道：“善者无可如何，会放狗屁；后事不堪設想，議个鸡巴。”就是这次“會議”，軍閥們从盐場搶走了一千零三十二万八千多块銀元。

刘平山走攏大坎堡，只見天上黑烟滾滾，雾气騰騰，硬是黑了半边天，山头都被烟雾遮住了。密密麻麻的高高的井架，也被烟雾纏繞；井架上扯的篾绳，象蜘蛛网一

样从天空罩到地下。每个井架下面，都有黑压压的一片車房，挤在一堆。汲卤的篾绳在天上穿梭，一片轰隆隆的吼声，灌进耳里；卤水的气味，冲得他脑壳发晕。他站着东看西看，慢慢才发现篾绳上的卤水洒下，象牛毛細雨，混杂着煤屑和灰渣，落了一身。他感到这地方馬嘶人喊，简直象打仗一样，不比田坝清静。

他走进場口。两边房檐都要挨攏的小街上，人群拥来挤去。卖瓜子的撩开门帘，屋子里几十盞烟灯旁边，躺着一长排烟客，鴉片烟味从門里冲了出来。沿街摆滿赌摊，一堆一堆的人圍得梆紧；有的臉紅筋脹，把衣裳脫下一卷，当作賭注扎下去；有的冷得打哆嗦，还擲下骰子直呼“六六六哇”。刘平山听得真心煩。

他走到一家牛肉店門口，一群人正在摆談，有个老婆婆說：“遭孽呵，多乖的一个姑娘，走攏場背后，一个燒盐老汉把她藏在背篼头，上面壅起包谷心，連背篼一起卖。买家在灶門口倒包谷心，才看到娃娃，衣襟上还縫得有生庚八字。人当包谷心卖，遭孽呵！”刘平山听得火冒，真觉得比抱妹妹还惨，杂种，咋个这盐場比乡下还要武辣！咬住下嘴皮一想，来都来了，怕啥！最多是睡谷草扣二十个錢。他就連忙打听“通緣井”在哪儿，好找么叔刘炳云。

这个井灶是大資本家大地主王友謙的，因他信佛念經，又称“王善人”，很好打听。来到門口，黑漆的朝門虛

掩，四面是高墙和木头签子。刘平山向看门头说了姓名，半天他才传话进去。隔了不久，走出一个人来，灰黑一张脸上，只看到两个白眼珠在转，上下红嘴皮在动，那个人喊道：“平山！”他才知道是么叔。在家听娘说么叔是烧盐工人，咋个烧盐的一脸煤烟？庄稼汉使犁耙，黄泥巴才敷齐脚杆嘛。

刘炳云把他领进朝门，走不多远，钻进一间低矮的瓦房。刚跨进门，一股热气冲来，平山头上的筋脉直胀，周身冒出毛毛汗，啥也看不清楚。他定了定神，才模模糊糊地看见，几排大铁锅里的卤水滚翻暴跳，亮油壶在雾罩中闪动着惨黄的火焰，近处热气闪过，露出盐工的赤条条的脊梁和手臂，远处白茫茫一片，只听到炭灶里唬唬唬的吼声。半夜，么叔才告诉他：要吃烧盐这碗饭，先得见啥做啥，给资本家帮干忙，等操出手艺，进得了“炎帝宫”，在柜房里挂得上名字，才谈得到工钱、伙食。没上到名字，开伙食你不能动手，等我躲过“坐灶”，再添饭给你。刘平山心想，做工比做庄稼名堂还多，哪有做活路不拿工钱，还吃偷偷饭的道理？这不比地主还凶？哼，我肯信资本家就把人丢在盐锅里煮来吃了，便答应吃到偷偷饭再说，在么叔家里住了下来。

从此，他跟着么叔做些手脚活路。灶房象火烤，周身脱光了，汗水还是满身铺；地上湿漉漉的盐水，泡得钻脚板；灶内的火又熊又旺，滚烫的盐水，简直从锅里跳出来

咬人。在灶房，水火攻心，热得要命；出灶房，冷风一吹，光打寒噤。进进出出，冷冷热热，三趟两转，刘平山就支持不住了。么叔还说这是秋天，日子好过，三伏天烧盐，小心烫脱几层皮。

刘平山在灶房忙了一天，早累坏了，正要坐下歇气，外号“满天飞”的掌柜马玉堂走来，指着他喊道：“那个小伙，快去，快去！”平山还没弄清楚，马玉堂就催着他跟一个老工人走了。老工人叫蔡成林，工友都喊他蔡胡子。走出大门，平山问蔡大伯到哪里去，蔡胡子黑着脸，半天才说几个字：“弄‘退秋’。”“啥叫‘退秋’？”蔡胡子再不答腔，刘平山更加奇怪。走了十多里，天已黑尽了，才在一个么店子落脚。蔡胡子叹了一口气，才对他他说：“小兄弟，难怪你不懂呵。‘王善人’不准杀生，偏偏爱吃退秋鱼。这种鱼出在富顺安溪，要等秋水退了才好弄，退秋一出水面就死，只有赶紧下锅，味道才鲜。这安溪隔大安寨一百七十里，他沿路派人送鱼，十里一站，一站传一站，连夜飞跑，要赶上他的早饭。马玉堂叫我们两个跑这最后一站，我上了点年纪，耽心拖累你。唉，小兄弟，时辰没到，鸡再叫也没用呵！”

他俩在店里歇下，不到二更，倒头就睡了。不知睡了多久，店门打得乒乓乓，有人又喊又叫。蔡胡子把平山拉了起来，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大汉挑着水桶，一个大汉提着马灯，累得话都说不出来。蔡胡子挑起担子就走，平

山連忙接过馬灯追了上去。天又黑，路又窄，蔡胡子走得偏偏倒倒，平山搶过担子挑上。剛走不远，路旁鸡叫狗咬，天色快亮，老汉提着馬灯跑了起來，平山咬牙紧紧跟上。跑攏大坟堡，东方已經发白，还要爬两里陡坡，才攏大安寨，蔡胡子着急地說：“小兄弟，还，还要快点呵！”他接过担子，不換肩地爬上高坡，喊开寨門，領了签子，进了大安寨，来到王友謙家后門，一擋水桶，便倒在石坎上了。两个門丁出来，提起水桶，才罵蔡胡子：“老东西，王一公不准哪个坐他的阶沿！”平山好生火冒，正要扑过去，那家伙砰地一声把門关了。平山扶起蔡胡子，說：“走，蔡大伯，屙屎都不要朝他这一方！”

刘平山一只手撑腰，一只手扶着蔡胡子回来，灶上正在开饭。刘炳云从大甌子里舀了一碗干饭，瞞过“坐灶”，偷偷給他端来，平山双手捧住。这是什么饭呵，又酸又霉又臭，还未进嘴，味道就熏得人难受，刚累倒的人，吃下肚里的饭，直往外呕。他不敢吐，又强迫自己吞下。刘平山悄悄地掺了一瓢冷水，碗里立刻浮滿一层黑脑壳虫。杂种資本家，买的发水米，又放在仓里沤，安心叫虫虫吊吊結成砣砣，等到吃它，装米不用籬筐，使铁钎拗开，跟修屋基用的石条一样，绳子一套就抬走了。把它丢在鍋里，一泡就算饭；若要煮，就成了粉粉。平山又气又恨，用眼泪当菜，咽了大半碗。

刘平山有时給掌柜挑柴、送米，回来错过吃饭机会，

还连这种烂臭的烧仓米也吃不上。无钱就餓，碰到么叔給点零錢，买筒米回来，装进瓦罐，放在盐鍋里“瓢河灯”，煮熟来填填肚子。过后他才明白，自貢的大資本家，头数王、李二姓，連小孩子都曉得：“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难怪“王善人”是这么歹毒！

在灶上混久了，平山常常听到工人們摆談炎帝宮。明說炎帝宮是燒盐工人的帮会，其实是和專閥、資本家、袍哥串通一气来压迫剥削工人的一個反革命衙門。燒盐工人要在炎帝宮交錢挂名，領了“藍本本”，才能在柜房里上名入册，在盐場里混碗飯；查到沒有挂名的，他們就打、抓、押、关，还說什么“严防奸伪捣乱，保障工人利益”。有一天，刘炳云去炎帝宮繳香錢，平山知道了，才把这一向憋住的火气发作出来：“么叔，哪有做活路还兴上稅？不繳香錢，哪个敢把你咬了？”刘炳云只当平山年轻气盛，沒有理睬，揣上錢便走了。平山气悶，在家里坐不住，跟在么叔身后，从大坟堡走到城里。正当过河，刘炳云才发现平山：“你跑来做啥子？”平山說：“我来看炎帝宮有好歪。”炳云急了，只好向他讲：“做庄稼都要上粮嘛。”平山不服气，又頂了两句：“盐巴交过了盐稅。你听说放牛娃要出香錢？”炳云看平山轉不过弯，只好把他带到炎帝宮門口，才說：“你沒有藍本本，就在大門外等我，我繳了香錢馬上出来。”

刘平山留在炎帝宮門外，臉上火爆火辣的，朝里一

望，一坡笔陡的石坎，好象压在自己头上。他不相信炎帝宮有这么大的規矩，就走了进去。正穿过戏楼下面，便被两个大汉拦住，一个伸手要他交藍本本，一个提起四尺多长的烟箇片。刘平山假装不知道，把拦住他的手推开，一直朝正殿走去。“打不死你！”“沒名字的‘黑人’！”平山听见追起罵他，连忙轉身，那个家伙掄起箇片劈面打来，平山赶紧閃开，箇片擦在石坎上，破成几片。那家伙震得虎口流血，痛得叫喚；另一个大汉冲上来扭住平山。平山放开嗓門大喊：“凭啥子打人？打死人抵命！”这一叫，惊动了正殿上繳香錢的工友，刘炳云和十多个燒盐的工友扑下来，又掀又推的拉开了把門狗。拿着破箇片的大汉，指着刘平山的鼻子罵：“‘黑人’，混进来偷藍本本的！”刘平山一見人多，放起胆子頂撞：“放屁！你把嘴巴揩干净点！这是火神廟嘛，老子过路来拜火神菩薩，就該挨烟箇片呀？你們看，他把箇片都打成刷把了。”众人听了，都站在平山一边，把两个把門狗挖苦得还起嘴。刘平山趁勢走出大門，边走边說：“啥子炎帝宮哟，閻王殿！騙錢，打人！”

刘平山沒有心腸等么叔，一个人走回大坟堡。在路上，一想起自己在乡下城里到处受气，他就哭了。这样的生活，足足过了五年，学了一身手艺，他还是一个沒有名字、沒有工价、吃偷偷飯的“黑人”。

三

一九三〇年。有一天，“滿天飞”馬玉堂，急忙坐上四人大轎去大安寨。到了楊柳樹門前，停下轎子，斥退“大班”，才輕輕叩門。王友謙的貼心保鏢從門洞里看清楚了，才開門讓他進去；左弯右拐，到了第二道大門，也是等門洞里的人盯准了才放進去；爬坡上坎，穿林過橋，走到第三道大門，這道門要讓王友謙的小老婆看明白了，才能進去。“滿天飞”見到王友謙，雙手一拱：“東家，道喜，道喜。旺昌井出火了。”王友謙數着佛珠，喃喃念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到夜晚，他帶着保鏢，走出后院，爬到僻靜的寨牆上，遙看大攻堡，只見旺昌井的亮筒，瓦斯火騰空而起，紅了半邊天。他喜得抓耳搔腮，回到家里，賞這個小老婆一百張金叶子，賞那個尼姑一個金菩薩。第二天，叫來馬玉堂，賞他火圈十六口，說是“賜忠”；又命馬玉堂傳令炎帝宮會首，開簿子收燒盐匠。

加入炎帝宮，要先交五个大洋零八百錢。劉平山是兩個肩膀抬張嘴的淨人，哪有錢來交？劉平山說：“就是有錢，我也不拿去把那些家伙喂得象四大天王來整自己！想穿了，就當一輩子‘黑人’，吃一世的偷偷飯。”么叔勸他，他只當耳边風。蔡胡子說：“有了藍本本，才好闖王家，碰李家，鹽老板才肯供你。”苦朋友們又都帮湊他，這

一个一吊，那个两吊，凑了三个銀元交在他手上，刘平山反转作难了。么嬢对他說：“二十岁啦，掙上工价，也好安个家嘛。”說完，她把几年挑煤炭省下的一块七角錢塞給平山。么叔找到放大利的“堆金会”，保上加保，又借了一个大洋。刘平山把錢揣在身上，过了两天，还是沒去炎帝宮。逼得么叔无法，把他撵出灶房，么嬢跟着他，一齐走到炎帝宮，把平山掀进了大门。

么嬢在炎帝宮門口等平山，一个卖草鞋的老大娘死盯住她。沒隔一会，老大娘又向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嘰嘰咕咕地說一陣。姑娘背着背篼，沒有开腔，只是哭。老大娘揩了眼泪，才問么嬢：“大嫂，剛才进去那个大哥，是你的兄弟呀？”“哪里哟，是我侄儿。”“該是燒盐的？”“才去領藍本本哩。”老大娘自言自語地說道：“大嫂，你福气好呵，侄儿媳妇准是个好帮手。”么嬢說：“嘴巴都沒有糊住，不敢結亲哟。”老大娘又知道了么嬢生一个，丢一个，眼前只有平兴和长生两个娃儿，就再也沒有說話了。她把姑娘的背篼里的衣服取出来，一件一件地折好，又放进去。

刘平山算是一个有名字的燒盐工人了。他从炎帝宮出来，么嬢看了藍本本，才放心落实。老大娘提着一双草鞋，走攏他們身边，向平山說道：“大哥，看照我穷婆子，买了这双草鞋吧。”么嬢看見平山光着脚板，就叫他买下。平山把錢递给老大娘，老大娘背过身哭了；他和么嬢走过石桥，那个姑娘也跟着他們走过石桥，平山回头一望炎帝

宮，老大娘还站在那里望着他們。背背簍的姑娘一直跟在平山和么嬸的身后。走过五星店磨子井，么嬸叫歇氣，刘平山說声到茶館喝碗涼水，便走开了。平山一走，那个背背簍的姑娘，就挨着么嬸坐在地上。么嬸問她：“你走入戶呀，到大坎堡？……”話還沒有說完，姑娘就傷伤心心地大哭起来。么嬸細細盤問，才知道她叫楊懷芬，爹是輶工，去年热天从天車上摔下来跌死了，三个小兄弟餓死一个，老大娘是她媽，没有办法，才把她放給平山当老婆，姑娘的紅庚八字，就夾在平山买的草鞋里头。……

四

刘平山和楊懷芬結婚一年后，剛生下牛儿，災難突然落到他的么叔身上。刘炳云累得发暈，右臂陷进了盐鍋。刘平山听说，跑进灶房，只見么叔倒在一个工友的怀里，痛得双眼紧閉，牙齿把嘴唇咬出鮮血。右臂和胸部燙起果子泡，好多处燙烂了皮；手腕只剩一根骨头。……刘平山扶住么叔，痛进心里。有个工友叫喚：“快想办法！”他急得火星子濺，眼泪长流。

正在这时，大掌柜馬玉堂来了。他穿着白綢汗褂，拿着牙骨扇把的团扇，三步当成两步地赶来，吆喝着跟在身边的坐灶管事：“为什么不撈盐？撈盐呀，一鍋盐巴，一称金銀，你赔得起？”刘平山憋不住了，跑到馬玉堂面前，吞

了一口气，才說：“掌柜，招呼柜房請个医生。”馬玉堂用扇把指着昏迷不醒的刘炳云，冷冷地說：“自不小心，惊动四邻。”然后用团扇搊搊背心，拍拍屁股，玩着扇把上的絲繩，斯斯文文地走了。刘平山心一横，搶了一步——不知是誰紧紧把他抱住。

远远的，傳来了他么嬌的哭声。平山照顧着么叔，顧不到么嬌。他么嬌，早就被掌柜擋在朝門外面。馬玉堂罵她：“你进去打翻了灶，冲跑財神，得了？你男人沒有死，右手帶点伤，左手还摸得到你嘛。叫刘平山，快把人抬走！”

第二天，几个工友帮着刘平山，把刘炳云抬到雨台山上的仁濟医院。那个会說中國話的洋人赫維特院长，笑眯眯地說：“欢迎住院，先繳十块銀元，欢迎欢迎。”刘平山要求先收病人，再設法交錢；赫維特只是半閉起眼睛，用喉嚨管說道：“上帝保佑。”在这个基督教办的医院門外，刘炳云整整呻喚了两个小时，平山他們还是只好又把么叔抬回家。抬起走了几步，赫維特才出来，連画了几个十字，口里念着：“上帝可怜不幸的人們。”

过了三天，受伤的地方发炎化膿，都发臭了。刘平山沒法，走进柜房，恰好又碰見“滿天飞”。平山說：“我么叔只有住院才有救了，他是給你們掙銀子受的伤，你高矮敷点湯药錢嘛。”馬玉堂向坐灶問道：“有这个規矩嗎？”接着又說，“不是我舍不得錢，兴坏了規矩，这自流貢井、东西

兩場还成个体統嗎？哼！”刘平山气得两眼直盯着掌柜，敞开嗓子說道：“我跟你借，借一点錢好吧？不看我么叔給你們流了幾大鍋汗水，就是我这身牛筋巴也还抵得到几个錢。”馬玉堂早就恼了，他觉得跟刘平山讲几句話，已經是賞了面子，让他得寸进尺，这还行嗎？不等刘平山再說，他就吼开了：“滾，你滾！你滾出去！”坐灶管事赶紧把刘平山拉到外边，做得很体貼地說道：“你不怕倒瓶子嗎？”平山还要闖进柜房，又被几个工友拉住。他吞不下这口恶气，在街上煩躁地轉来轉去。空起两手回家，怎么对得起么叔？自己要有办法，哪还去找那杂种說話？想来想去，还得自己找路走。一抬头，“高平第”当鋪向他敞开着大門。……

么嬸从枕头下取出长生娃过冬的棉背心，拿在手里呆了一陣，才把它放进包裹。刘平山坐在門口，望着么嬸，指了指自己的房間，么嬸懂得，侄儿是叫她去帮助侄媳清理要当的东西。侄媳結婚才一年，她怎能狠心去收拾她当新娘的穿戴呵！

刘平山急了，站起来朝大腿一拍，向么嬸举着双手，搖晃着齐伸伸的十个手指头，冲出門外。么嬸知道，这十个指头，是十个銀元呵。她用衣袖揩干眼泪，艰难地走到楊怀芬的房门口，一見侄媳在折結婚时做的紅花上衣，她就抱着門枋痛哭失声了。楊怀芬紅着眼圈走出来，把么嬸扶进屋里。么嬸看見床上，几件衣服叠得伸伸展展，赶

紧走到床边，把那件紅花上衣取出。两个人坐在床上，爭来爭去，床上的牛儿，惊得炸啦啦地哭。怀芬抱起牛儿，在房里轉來轉去，口里輕声念着：“紅花花衣裳，是蔡大伯他們給的錢，么嬸做的……”

刘平山挑了一担，么嬸背了一背篼，大步跑到“高平第”。走进当鋪，是一人多高的板壁，板壁上是簽子門，从簽子門望去，才看見歪戴着瓜皮帽的掌柜。平山和么嬸踮起脚尖，把衣服递进簽子門。掌柜把衣服提在簽子門口，前后里外看了一陣，唱小調一样叫着：“藍布長衫一件，吊二。”唱完，把衣服往里一丢。一件一件往里丢，把么嬸的心都掏空了。她从板壁縫里望进去，再也看不見侄媳結婚穿的衣裳和长生的棉背心了，心痛得嘴唇不住顫动：“莫要捆得那么紧呀，我要来取的，要来取的……”

簽子門里遞出十个銀元和两吊錢，又扔出一迭當票。刘平山剛把當票接在手里，兄弟刘平兴滿头大汗地跑来了，他手里拿着媽媽剛做好、還沒有上脚的青布鞋，喊了一声哥，又喊一声娘，把布鞋塞在娘的手里，說：“多當几个錢，好給爹医伤。”么嬸把儿子摟到身边，两行眼泪，不斷綫地掉下。……

刘平山总算把么叔送进了仁济医院。

劉炳云进了医院，一家六口的生活，平山一个人挑了起来。他搶着去做每月三十班，白天夜晚拚命地干，一家人的嘴巴还是敷不圓。他抽空跑到医院去看么叔，十天

不見松，一月不見好，医药費又差一节，他急得心慌意亂，闖進院长室去找赫維特。赫維特睡在躺椅上，两手抱住肚皮，嘰哩哇啦說了一串。劉平山不管他的洋話，着急地說：“你要醫好我么叔，一家人靠他吃飯！”赫維特一下站起來，用手指着房門，嘴里又响了一通。平山心想，雜種，口口聲聲喊上帝，說話不算數；要錢說中國話，罵人就放洋屁。無怪乎有人說：“仁而不仁，濟而不濟，扯謊害人，阿門上帝。”

么嬸看見丈夫傷勢愈來愈重，院里又在逼医药費，平山顧着一家人，拖得來兩個眼睛都落了眠，她坐不住，也不忍心，便向侄兒說：“平山，我想到井上推車子……”劉平山驚了一下，跳起來說：“嬸吶，我就是上刀山，也得讓你……你是有……”一扭頭子，跑進房里去了。平山知道，么嬸懷了孕，手邊還拖着長生娃，井上推車，比坐班房還慘，不是人搞的活路。

么嬸哭了一場，還是瞞過平山去推車子。那陣平興才十四歲，橫順要跟着娘去，他答應不告訴平山哥哥，么嬸才把他帶去了。

五

么嬸去推車的那口海興井，還是“王善人”王友謙的。王家的車房又黑又矮，三方都是土牆，太陽照不进去，里

头阴浸浸的，靠墙丢了些谷草，又烂又潮湿，热天一股臭气熏人，晚上蚊子起堆堆，硬是象座黑班房。

刘么嬢走进車房，几十个人都在上杠子。多半是妇女，有老太婆，小姑娘，还有几个男子汉，一两个瞎子。她解下背带，把长生娃放在谷草上，又连忙把褡背象背背篼一样地挂上肩膀，套住背后的杠子。平兴娃拿根小褡背，跟她站一排，两眼看着娘；刘么嬢給他挂褡背，手摸着他薄菲菲的肩胛骨，鼻子就酸了。

人还没站好，車房管事“熬油灯”甩起馬鞭子就吆，刘么嬢赶紧拉娃娃一把，躬起背背朝前拖。要把五十多挑卤水从两里路深的井底扯起来，光是那根篾绳就知道有好重呵！他們埋起脑壳，頸子伸得多长，两手触地，脚趾把泥巴都挖起来了，車子还是不肯轉动。才轉到两圈，头发尖尖上都在淌汙水。么嬢看平兴娃，眼睛都震瞎了。

刘么嬢偏起脑壳看谷草上的长生娃，头几圈，蚊子叮在他眼皮上，他不曉得吆；过两轉，他餓得抓起背带角角啃；再轉两趟，他哇地一声哭起来。哭得么嬢背心发冷。“熬油灯”听到娃娃哭，提起馬鞭气汹汹地跑过去，平兴吓得喊了一声“娘！”“熬油灯”車轉身来：“你想梭肩膀！”劈脑壳就是一馬鞭。平兴娃一边拖来一边哭，长生娃又在嘶声叫，痛得刘么嬢一口接一口的眼泪，直朝喉嚨里哽。

推着推着，門口进来一乘四人抬的拱杆轎子，轎后跟

着保镖大汉，王友谦从轿里走出来，站在车房外面看推车，“熬油灯”赶忙把椅子端过去。侧边看推车的穷苦人，看到妇女、娃娃推起太遭孽，实在不忍心，有个大哥过来把平兴换下去，跟着又有几个男的下来帮着妇女推。王友谦都看进去了。

放回车，卤筒下井，大家才歇一口气。么嬸赶忙去看平兴娃的伤，他不让看，反把弟弟抱给娘。累坏了的兄弟姊妹，躺在谷草上喘气。瞟眼子女水烟匠，从柜房里走出来，提起根三尺多长的水烟袋，拍拍镜头的肩膀，把烟袋嘴从背后递到他的嘴边。

么嬸看到心烦，抱起长生坐到柜房的窗子下边去喂奶，又听到柜房里几个女人一陣干哈哈，王友谦笑起在罵：“出去出去，老子封你們当車廝管事，不要在柜房头作观音菩薩。”几个当娼的从柜房里慢吞吞走出来，端起长板凳遂进车房。

王友谦又向“熬油灯”說：“你看到沒有？車房头女人一多，男的就来打干膀胱。再叫这些烂家什，去把哨子唱噶些，推车的更展勁，打干膀胱的还要多。”“熬油灯”接着說：“是，是，多推水，少花錢，一公的場合更紅火。”

刘么嬸在窗下听到王友谦的話，周身发麻，心子都紧了。她万想不到“正善人”叫娼妓來給推车的提勁，又叫她们勾引男人来推车。她实在不敢听下去了，抱着长生娃站起来要走，王友谦正跨出門来，吊起眼睛把她盯着。

“熬油灯”說：“一公，她两母子都在井上推車，嘿嘿，还規矩。”王友謙說：“規矩就好。我坡上的那口井要見喜了，过一陣，把她的娃娃喊过去，那边的活路松一点。”么嬌沒有答話，赶紧走开。

王友謙一来，就把“熬油灯”的“油”上滿了。王友謙的轎子還沒抬出朝門，一群保鏢还在車房，他就扯起声气喊：“上車，上車！”提起大馬鞭，把还在谷草上喘气的人吆起来。那几个当娼的，坐在长板凳上，拉着女水烟匠，不歇嘴地噴烟子，“熬油灯”掉头就罵：“嘴巴塞緊了嗎？把哨子放囉点！”她們就嘶声尖叫地喊得钻耳朵。

“熬油灯”是个高杈杈的干烟灰，他岔开两根叫鸡脚杆，立在車子边上，逼着大家放小跑。么嬌跑得眼睛花，看到“熬油灯”的两腿和馬鞭，变成了三支脚。前头根杠子上的王大嫂，是有喜的人，跑着跑着昏倒了，她差点踩到王大嫂的肚皮上。么嬌叫喚一声，“熬油灯”跳过来，抓住王大嫂的头发拖到谷草上。么嬌忍不住喊：“人！”“神，老子也要端他的刀头！”“熬油灯”說着給她一馬鞭。人些放声吵起来，立马把車子推慢了，“熬油灯”干跳了几下，还是招呼不住。大家看着王大嫂双手摟着肚子，痛得臉上黃豆大的汗珠不住冒，哪个还有心干活。“熬油灯”看到大家在顧王大嫂，走过去用馬鞭敲着她的肚皮，喊道：“起来，再推两趟。年紀輕輕的，挺在这里看受湿气；要睡，等会到我床上去睡。”

刘平山回家，听怀荪說么嬌推車子去了，就赶紧跑到車房。平山看見“熬油灯”欺負王大嫂，按进車房，大吼一声：“不是人养的东西！”“熬油灯”轉身甩一馬鞭，平山用勁抓住他的手杆一拖，“熬油灯”一扑爬啃着谷草。他爬起来嚎叫：“你，你姓啥？”“老子沒名字！”刘么嬌一听声音好熟，仔細一看，是他，平山！么嬌心想摔了褡背去顾他，平山向她瞪了一眼，她才明白，认了平山，“熬油灯”要到灶上找他鬧事。刘么嬌正在为难，平山反轉跟沒事的一样，甩脚甩手地走过去，取下王大嫂的褡背，帮她推車子。“熬油灯”气不过，拿着馬鞭在平山头上直晃，推車的几十双眼睛恨着他，他又不敢打下来。狗东西打不出噴嚏，又擋不下臉，聳聳鼻子，自言自語地說：“哼，猫儿聞不得魚腥，还不是想來打干牙祭。”

平山推了几十轉，趁放回車，含着一包眼泪，远远看一看平兴兄弟、长生娃和么嬌，掉头就走，忙着回去上班了。

推車的累得头晕眼花，“熬油灯”还嫌跑得不快，对着几个娼妓厉声叫道：“車盘管事，来个快的，打登儿！”那几个女人，敲着碰鈴，卷起舌头，不斷气地彈出“登儿……”，接着又唱：“心肝奴的哥，細听奴家說……”

大家遭“王善人”一整，都累垮了。

推到擦黑，么嬌和平兴下了車子，抱起长生娃，拖着两条腿，跟着大家正要出朝門，“熬油灯”立在門口，擋住

大家喊着：“王一公吩咐：今天推晚班的，給一公挑东西上大安寨去了，你們頂一班。”妇女們着急起来，有的說家里有病人，有的說娃娃還沒吃飯，“熬油灯”咔嚓一声把門鎖了。

天黑了。“熬油灯”在給“井口土地”燒晚香，刘么嬢看到土地廟內的一堆菩薩，一个土地就有几个土地婆，跟“王善人”娶的老婆一般多。“熬油灯”敬完土地，又来催大家上車。妇女、小娃娃，推了一天車，又只喝了两碗稀飯，哪里还拖得动，簡直是在地上爬。推到下半夜，“熬油灯”去睡了，当娼的也走了，只剩下王大嫂还躺在墙角谷草上，車房里頓時靜得怕人。两盞大鉢子油灯吊在梁上，照出好多怪影子，一陣冷風扑进来，灯光不住打閃，到处的影子都在晃。平兴娃惊叫一声，一把抓住娘，他說看到有人在梁上甩。两个小妹子，吓得悄悄地哭。大家又是伤心又是恨，輕声地唱起挽子歌；登一步，哼一声，唱得好沉悶呵：

天幌子轉喲地幌子圓，
老娘推車呵兒賺錢。
管事來打呵東家來瞞，
老娘推車呵莫奈何。
.....

刘么嬢回到家里，平山上班去了。楊怀芬給她說，平

山留了話：他累死也要救么叔，叫么嬢保住娃娃。平山越體貼，么嬢越過意不去，還是每天去推車。哪曉得隔了一個多月，么嬢推車時肚子絞起的痛，回家就小產了。娃娃剛死，“熬油燈”又給么嬢說，王友謙坡上的井要打穿了，那邊活路松，工錢多，叫平興去打井。娃娃推車太遭孽，醫院又在催繳錢，么嬢只好讓他去了。平興娃回來，做夢都在呻吟；他怕娘傷心，還只說好。誰曉得那是啥子活路呵！

過了十多天，那天正是平興娃的生日。劉么嬢從車房回家，做好飯在門口等他。一等不來，二等也不來，坡上打井的聲音：“當兒——噠兒”“當兒——噠兒”，就像敲在她的心上。天黑，么嬢聽到過路人說，井上有人遭碓尾巴打飛起來摔死了。她門都沒關，就朝坡上跑。

踩碓打井，哪是人做的活路呵！一座木架有房子高，兩排人站在上面，左边的四個踩了碓尾跳過去，右边的四個又踩一下跳過來，跳來跳去，只看到人飛。平興和那七個人，都是光身子，只圍塊汗帕，么嬢站多遠，汗水都洒到她的臉上。么嬢想喊他，又不敢喊，平興娃眨一下眼睛，都要犯險呵！

“熬油燈”提着馬燈站在房檐下，么嬢去問他，話還沒有說，他就吼起來了：“王一公的井，打了五年，就要見功了，早一個时辰出水，就要多進几挑銀子，這下正在火口上！女人家，滾回去，出了事，你一家人卖了都脫不到

爪爪！”

說着說着，王友謙从房里走出来，一大群保鏢跟着他。他向“熬油灯”說：“时辰要緊，改成脚脚紅。”“熬油灯”破起喉嚨就叫：“大家听倒，現在，擋倒寸寸紅，不按打卦的进寸給錢。一公关照大家，动手打脚脚紅：使勁的，按脚數多拿錢；不使勁的，摻烏梢棒。”說完，他就端起錢盤坐在板凳上，手里卡一节銅錢，架子上的碓尾巴踩下来，打响底下的铁片——当儿，他就丢一个銅錢；沒打响，他抓着烏梢棒跳上去打脚杆。这下呵，只看到平兴他們，跳来跳去，碓尾巴敲得“当儿噠兒”“当儿噠兒”不住地响。这才是血盆里抓飯吃，活人落进了老虎嘴。

么嬌走过去，一把扭住“熬油灯”，叫他把平兴换下来。平兴在架上看到，急得喊了一声“娘！”么嬌怕娃娃打恍脚，遭橫禍，只得紧閉嘴巴，哭起朝侧边走，心头象油煎火烤。刘么嬌生了九個娃娃：大儿，病死了；二女，只活了六十天；四儿，拖死了；五、六两个是对双，餓死了；第七个，卖給人家；第八个是长生娃，只会吃奶；第九个，推車子掉了；只有老三平兴娃，要是他，……偏偏那天又是平兴娃的生日呵！

么嬌想看他，又怕看；不看他，又着急。她心里念着：大东家呵，你們吃了我那么多娃娃，莫非还要我这根沒有成人的嫩苗苗！

么嬌象看到她那一群娃娃。

她站起来想跟他們拚了。

她偏偏倒倒朝王友謙走去。

“熬油灯”高舉馬燈，王友謙亲自在給大家讲：“今天是黃道吉日，我要奖励大家，放下脚脚紅，来个节节高。打滿規定的尺寸，多一分，給两分的錢，多两分，給四分的錢！溜軟脚的，我也要算躉賬！”“熬油灯”提起烏梢棒把架上的人盯倒，逼着平兴他們不打頓地跳，只看到人影子晃，連“当儿噠儿”的声音都分不清楚了。

刘么嬢扑过去抓住王友謙：“把刘平兴給我換下来，我的娃娃还年輕呵！”王友謙張开嘴巴笑起来：“年輕人跳起才好耍。”

“你們还要不要人命？”

他一声震得么嬢耳朵聾：

“老子要盐水！他要命，我要錢！老子是拿錢买命！”一掌把刘么嬢掀到坎底下。

刘么嬢昏了好久，她不曉得。平兴把娘扶起，她才回过神来。平兴盘起两条腿，象个殘廢人，橫起磨一步，皺一下眉；么嬢气得昏昏沉沉，走得偏偏倒倒，也不曉得是平兴扶她，还是她扶平兴娃。

才沒走几步，平兴娃喊声：“娘！”就一口鮮血噴出来。

背后井上高叫：“出水了，給东家道喜！”

六

刘平兴得了吐血症，么嬸也倒床不起。楊怀荪照顾着长生娃和牛儿，刘平山上山四处寻草药。刘平山晚上回家，怀荪悄悄告诉他：“么叔死了！你不在家，我又分不了身，蔡大伯他們想方設法才把么叔埋了。么嬸还不曉得……”刘平山半句話未說，跑到灶房找着蔡胡子，陪他去官山坡坡。刘平山跪在坟头，泣不成声：“么叔呀，么叔！我一无香，二无烛，三无半張紙錢燒給你，你慢走一步，等侄儿我給你去算帳！”

第二天中午，刘平山来到柜房。馬玉堂抱着一个妓女正灌酒，平山拉开妓女，指着他的鼻子問：“大掌柜，我么叔燒盐受伤，死在医院，你用两个盐包子就打发了？你們吃人还吐不吐骨头！”“滿天飞”把手上的酒杯摔得稀烂，大声吆喝：“岂有此理！胡鬧！滾出去！”馬玉堂火上加油，刘平山气得双手掀倒面前的一桌酒席，馬玉堂連喊“求人呀！”刘平山大步走出柜房。

馬玉堂不会輕易放过刘平山。第二天上午，差狗來傳平山去衙門，一个灶房就轰开了。蔡胡子和几个工友丢下活路，跟着平山一起走。公堂上，胡分县先問馬玉堂，馬玉堂說道：“回明分县，刘炳云燒盐，自不小心，接进盐鍋，洋人都沒有救活，这与我們掌柜、东家，有何关

系？……”

胡分县点着头說：“是呀，是呀，与你，与你东家无关。”

馬玉堂接着又說：“刘炳云到通緣井，是他苦苦哀求于我。我念他一家衣食无着，才收留灶上。刘炳云出事情，我丢了一鍋鹵水不說，他还来无理取鬧……”

胡分县又点着头說：“是呀，是呀，你是为好不得好，反轉惹煩惱。”

刘平山一听，急得大叫：“有錢該生，无錢就該死？我么叔……”胡分县把桌子一拍，吼道：“休得咆哮！刘炳云自不小心，你要怪誰？你大鬧柜房还有道理？”听到堂口嘈动，他看見一群燒盐工友橫眉瞪眼，才把話头一轉：“刘平山，念你喪事在身，免予重办。你推翻酒席一桌，即作东家撫恤。退堂。”

刘平山怒气冲冲跨出衙門，又回头对着衙門上画的青天白日，喊了两个字：“好污！”

隔了几天，坐灶管事叫刘平山到柜房談話。当时，盐工有句口头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柜房喊談話。一喊談話，十有九成是开除。刘平山听说柜房傳他談話，他心中有数，便把当班草鞋和褲子洗得干干净净，放在炉上炕起，又給灶房头的弟兄一一道了謝。他吃了晚飯，拴好包袱，找根小竹竿穿上，拗在肩头，走进柜房。

馬玉堂說：“庙小神大，你高升发财吧。”刘平山一下

火了：“我們這号人，凭气力吃饭，是千家門上的客，万家
人戶的祖宗牌，这家不供那家供，大的不供小的供，小的
不供吃邻供。高升发財，是你貴人的福分，我么，高攀不
上！”馬玉堂一看来头不妙，眼眨眉毛动，把声音放矮了，
“喚，好來不如好去，这是你的工錢。”

刘平山收了工錢，把拗在肩上的竹竿，摇了两摇：“大
掌柜，你看不看？謹防你看守的东西掉了喲。”馬玉堂哭
笑不得。刘平山拗起衣服走了。

刘平山失业了。吐血症纏上平兴兄弟，刘平兴不願
拖累哥哥，就跑出去自寻生路。

刘平山一个人失业么？这一年，自貢盐場有一万七
千六百八十五个工人，就有三千四百九十八人失业，五股
占了一股。刘平山沒有回家，他从大坟堡的人市坝走到
自貢城里，沒找到活路，在沙灣碼头睡了一夜。第二天上
午，他看見富台山上有一乘拱杆轎子抬了下来，前面四个
大班双手举起轎杆，轎頂平得可以放个水碗；一个洋人，
坐在綠呢玻璃窗的轎內閉目养神。平山心想，莫非是仁济
医院的赫維特么？他等轎子过了釜溪河，抬上碼头，就搶
上前去喊了一声，几个戴大圓盤帽的稅丁，拉出盒子炮，
吼道：“瞎了眼睛，協理来了！”洋人把头伸出窗外，笑了一
笑，就揮手叫轎夫抬到“川南盐務稽核分所”去了。刘平
山向側边人打听，才知道協理叫蒲克礼斯，專門坐鎮自貢
收什么外債，每年要拿走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一百七十个

銀元，伙同他們在重庆海关搶劫的銀子，一起裝上輪船運到上海，再用兵船押返回國。以後劉平山才知道，帝國主義都是強盜。

回头再說灶房，自从劉平山跨出大門，工友們就嘈开了。他們看到劉炳云的下場，劉平山又遭倒飯子，個個說“王善人”不講天理人情。一傳十，十傳百，到處都在罵“王善人”是狼心狗肺。風傳到王友謙耳里，他象喉嚨里哽塊骨头，坐臥不安，生怕工人鬧事，擋走他的財神。王友謙把馬玉堂喊到大安寨，商量了半天，最後咬牙切齒地說：“莫把我招牌打爛了。你把他找回來。”馬玉堂只好捲一個“請”字，把劉平山“請”回灶上。

平興兄弟跑到哪里去了？緊緊地壓在劉平山的心上。么嬌記得，平興娃跑出去的時候，只穿了一條補了疤的短褲，天冷了，不餓死也要凍死呀！一家人懸心吊胆，端起飯碗就想他。

有天晚上，劉平山托人帶信回來，說有人在雙鍋爐烟巷子碰到過兄弟，叫她們趕緊去找。烟巷子是什麼地方呵？么嬌知道，盡是些走投無路的失業工友，在那裡遮風避雨，他們比倒在街頭巷尾的兄弟姊妹更要傷慘。一听说平興娃在烟巷子，她的鼻子就酸了。么嬌和懷芬忙慌慌地上了街，摸黑走进烟巷子。巷子里又窄又臭，脚下又溜又髒，陰溝里的水聲，呻吟得淒淒慘慘，冷風從後面灌來，她們冷得打顫。么嬌和懷芬手牽着手，慢慢摸起上

坡。走到水巷子尽头，来到一条背街，楊懷芬仔細一看，街中間石板路下面，是連着鍋爐和烟囱的巷道，頂上有座天橋从鍋爐房通到柜房，剛好把巷道蓋住。难怪大家叫它烟巷子。烟巷子的石板上面，橫三倒四地擠了一堆人，有的睡着了，有的在呻喚。側邊棧房的燈光，光亮昏昏沉沉，她們沒法把人看清，懷芬輕聲地叫着：“二兄弟，二兄弟……”沒有人答應。棧房里傳來一個賣唱女人飄飄忽忽的聲音：“梨花落，杏花开，臥倒長安十二街。……”

她們在棧房里討了三支香，把它點燃，搖着香火，慢慢地從干柴竹棍般的腿杆中間跨過，一個一個地辨認。么嬌摸着石板，燙手；懷芬摸着一個女人的肚子，冰浸。有個小孩正在說夢話：“媽……我……不去。”說完，又咽咽地哭起來。

“么嬌，你看這個，該是二兄弟！”么嬌趕忙搖晃香火，和懷芬跪在地上用心細看：一個十多歲的娃娃，腦壳躲在背篼里，睡着一块破磚；兩個駕篼，搭在腳上；雙手捂着臉，周身蜷做一團，背脊骨象馬路上的石子，一個一個地頂起，冷得象篩糠。看大小，很象平生。么嬌搖着他的手臂，輕聲地呼喚。

他從夢中驚醒。

么嬌和懷芬臉挨臉地望着他。

香在手里不停地搖晃。

他很快地從背篼里钻出來，還沒有完全睜開眼睛，就

一把拉着怀芬，喊了一声：“姐姐！”

三个人，你瞧我，我瞧你。

抓住怀芬的手，松了。

半天。他才說：“我叫陳紹明。三个姐姐都抱給人家当童养媳了。你們找哪个？”怀芬說：“找兄弟。跟你一样大，姓刘，你見过沒有？”他說：“这个死了，那个又来，今天死一堆，明天又来几个，燒盐的，搗碓的，推車的，还有跟我一样大的。呵，早上还埋了一个。他，他說是死了爹沒得办法……”么嬌赶紧問：“他在哪里？”

陈紹明哭了。他边哭边說：“春生井的掌柜，嫌工人在这里臭，怕冲走灶上的財喜，埋一个，賞一吊錢。关麻子是专埋死人的。今天早晨，关麻子把他拿盐包子一裹，篾索一拴，搭在肩上，挑起去窖了。我听到他还在說：‘关大爷，我还沒有死喲。’关麻子拖起声气說：‘曉得，曉得，你早迟都是要走这条路的。’……”

么嬌和怀芬忍住了眼泪，沒有哭。

香快燃完了。么嬌摸着陈紹明的肩膀，向他說道：“小兄弟，阴沟头的篾片，总有它翻梢的一天！”

七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擦黑时分，刘平山正和几个工友抬盐巴，突然听到喊叫“炎帝宮的来了，来了！”几个工人

拚命乱跑。刘平山掉头一看，只見門口走來幾個大漢，把朝門乒乓一聲上了杠，前頭一個抱着花名冊，後頭五六十個提着烟篾片，連聲囁叫：“站住！”“不准跑！”跟平山一起抬鹽的，是個沒有“藍本本”的年輕人，他丟了杠子，剛跑几步，背後大叫：“沒名字的‘黑人’！”一個大漢追上去，抓住他的衣領往後一拖，掄起四尺長的篾片，向他腦壳摻去，一摻冒一個包，鮮血跟着伤口流。刘平山跳过去，一把抓住篾片，那青年才慌慌張張地朝灶房跑去。炎帝宮的一群袍哥打手，不住吼叫：“拿盤子点人！”“香錢繳了沒有？”“沒名字的，給我打！”“抓起走！”一陣篾片，又是一陣咒罵，鬧了好久，才一窩蜂走了。

刘平山跨进灶房，猛听到灶上一声惊叫：“捞人！”“捞人！”“捞人——”工友們一迭連声呼喊，惊得人汗毛倒立。平山跟弟兄們，涌向一口大鍋旁邊，舉着六七盞亮油壺，拿着几把竹編的灶箕子向鍋里撈；人們大睜着眼睛，汗水鋪臉地滾。那鍋里的鹽水上下翻滾，又跳又嚎，團團熱氣，直往上冲；头几下撈起來幾塊衣裳、草鞋，后几下撈起來的，就只有……骨头，骨头！骨头当中，有一根水煙棒。这正是剛才和平山一起抬鹽的那个青年的呵！誰知道他被打慌了，一跑竟栽进了盐鍋。

工人們提着亮油壺，圍着一堆骨头，好久沒說一句話。火热的灶房也冷得钻心，一个青年工人在低声哭泣。憋不住了，刘平山吼道：“盐，盐，盐，熬的是老子們的血

呵！”接着一片咒罵：“把狗日的卖客拖来打！”“找东家算帳！”蔡胡子叹口气，搖搖头說：“哪年不死几个弟兄，枪炮掌在人家手头，連二杆咋拗得过大腿。”正說着，忽听門口喊声“擋轎”，两盞馬灯引着馬玉堂赶来了。他对直朝出事的盐鍋冲去，边走边嚷：“盐鍋整坏沒有？”沒人开腔。他掉轉身来，隔一丈多远站住，向着圍住骨头的工人吼道：“你們要得安逸，搞髒了盐鍋，还不快点弄干淨！”一个工人說：“这人死了，你……”話才出口，他就打斷：“說話兴个忌諱。王友謙，王一爷，王一公的規矩：摔在盐鍋头搞髒卤水的，照价赔偿。”刘平山站起来，指着一堆骨头，冷冷地說：“馬大掌柜，他在这里。乡下卖光了来的，淨人一个。請过来嘛，他賠你。来！大家閃开点！”工人們閃出一条路，几十双眼睛盯住馬玉堂。馬玉堂楞了，臉上的干筋不住扯动，停了停，才綻起勁仗叫道：“你，你，把活路給我擋倒！”一揮手，跟着馬灯走了。

沒等馬玉堂走出灶房，刘平山就說：“擋倒就擋倒。”他把圍帕解开，搭在肩上，走到自己管的火圈子，一下把瓦斯火关了。跟着有几个工友也解开圍帕，关了开关。蔡胡子走到平山身边，說：“平山，我們湊几吊錢，买副板子把兄弟埋了。”刘平山含着眼泪，捧着骨头，向大家說：“这就是我們的弟兄呵，人都死了，還沒有藍本本，沒有名字！”他用手臂揩了眼泪，又說：“炎帝宮害死人，沒有偿命；‘王善人’不安埋，还叫賠他的卤水。这是什么王法？

这是什么世道？不行！弟兄們，橫順一条命，跟他們拚了！”有个工人边哭边喊：“打官司！”刘平山上过当，连忙摇头，他叫道：“要出头，靠自己，只有拚！”蔡胡子禁不住热泪横流，把圍帕解下，瘡哑地喊一声：“擋活路！”

全灶房的工友，都解下了圍帕。刘平山用自己的圍帕包了骨头，又接过蔡大伯的圍帕，拴住包袱。工友们都把圍帕交给刘平山，他便一根連一根地接上。刘平山用牙齿咬住最末的一块围帕，爬上柱头，翻到灶房的横梁上，把包着骨头的围帕在横梁上吊起。蔡胡子拾起地上的水烟棒和草鞋，用绳子套紧，双手递给平山，平山把它拴在包袱上。一个灶房，火灭了，盐鍋里的卤水不跳了，只有棍竿里流进大桶的卤水声音，大桶里滿出来了的卤水流到地上的声音。

刘平山說：“大家生在一起，死在一路。”工友們圍住平山，一起商量他們将会遇到的艰险。……

第二天一早，坐灶管事跑來說：馬玉堂請他們到柜房談話。刘平山讲：“对不住，喊他到灵堂！”早飯过后，馬玉堂走到柜房門口就罵：“你們要造反？”蔡胡子說：“杀人才要抵命！”随后，任馬玉堂怎样叫罵，大家坐在圍台上都不答話。馬玉堂軟下来問道：“你們要怎样嘛？”刘平山讲：“要談，进灶房來談。”灶房一地都是卤水，馬玉堂无法下脚，急得直喊轎子。蔡胡子說：“大掌柜，哪有把轎子抬进灵堂的規矩？”馬玉堂无法，只好撩起褲脚走进灶房，問道：

“誰叫你們擋的活路？”劉平山理直氣壯地說：“你！”馬玉堂說：“昨天我說的是氣話。”劉平山講：“大掌柜的吩咐，我們哪個敢不聽。”馬玉堂氣得跺腳，濺了一身鹵水，結結巴巴地吼道：“我說錯……錯了！現在点……点火燒……燒鹽。”劉平山指着梁上圍帕里的骨头，很平靜地說：“他不答應。”“你安心要怎麼辦？”劉平山站起來，“大家的意思：黑漆棺木埋死難工友；炎帝宮會首披麻帶孝送喪；不准炎帝宮雜種到灶房抓人。”“你們亂了……”蔡胡子搶着叫道：“推他龜兒下鹽鍋，喊他賠命債！”馬玉堂吓得打抖，抱拳作揖地說：“好商量，好商量，我去找王一公。”

當天下午，坐灶管事領來了八個短工。八個短工一聽灶箕子撈骨头，工友擋了場合，事情未了，哪能上班燒鹽！就有個短工向坐灶管事說：“少做點喪德事。我們肚皮餓起茧巴，也不搶這碗飯。”蔡胡子聽了，走攏去抓緊他的雙手。劉平山送走短工的時候，向他們說：“窮帮窮，富帮富，勞煩眾位弟兄，在人市壠上講明我們的事情。”

王友謙在大安寨上，怒氣沖天，傳來了炎帝宮的會首，請來了鹽官和胡分縣。會首說：“莫非是‘黑人’奸匪搗亂？”馬玉堂講：“查不得‘黑人’了！都有藍本本。”他們盤算了一陣，還是異口同聲地勸王友謙多丟點銀子，燒鹽匠擋活路熬不到幾天，讓他們在灶房吃飯，不發工錢，看他屋頭的婆娘娃兒咋辦。

不到三天，劉平山他們家里真餓飯了。莫說吃飯，燒

盐工人家里連盐巴也吃不起了！楊怀芬从倒了的灶里，撿回一块“鍋巴盐”，哪曉得这是一块鹹巴，一連吃了半个月，小牛儿就开始咳，咳得轉不过气，倒在地上蹶，血从嘴里流出来，停一口气，他就喊：“媽，媽——”

媽媽不在家，天不明就去挑煤炭了。么婆呢，推車去了。长生哥哥，跑上街去了。小牛儿坐在門坎上等媽媽，他昨晚上給媽媽說过的：“媽，我給你守着門，你早点回來呀。”他一直坐在門坎上，赶場的回家了，媽沒有回来；太阳落坡了，媽还是沒有回来。小牛儿越咳越凶，瘦得象鸡娃，两只眼睛昏漠漠，一匹匹肋巴數得清楚。晚上，媽媽回来，把草药熬給他吃了，小牛儿倒在媽的怀里，搭着脑壳，有气无力地說：“媽，陈五娘家，晌午吃的……豇豆飯……有盐……好香呵！”怀芬扶着儿子的头，含着眼泪，伤心地說：“牛儿，明天，媽給你煮豇豆飯，放一調羹……盐巴。”

鸡才叫，楊怀芬又出門挑煤炭了。她只想多掙点錢給牛儿請医生，挑起煤炭两脚不沾地的跑，也不管偏东雨打得睜不开眼睛。还没有跑攏大坎堡，突然一个人追上来喊住她：“刘大嫂，你那牛儿不对头了！”头上象响个炸雷，楊怀芬呆呆立着，雨水跟着头发流。东家的煤炭还没交呵，还有豇豆、豇豆……她硬起心腸，給东家送了煤炭，在街上摃起一把豇豆丢进籮筐，也不曉得給了多少菜錢，嘴里不住念着牛儿……

楊怀芬拖着一身泥水跑进屋，小牛儿歪坐在地上，抱

住板凳脚。她把牛儿抱在怀里，給他擦掉嘴角上的鮮血。小牛儿慢慢睜开眼睛，死死盯住媽。媽抓起一把豇豆，声音直抖：“牛儿呀，牛儿呀，媽給你买的豇豆，豇豆要放盐……”牛儿又睜开眼睛，看看媽，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象是在笑，接着脑壳一偏，眼睛紧紧闭上了。楊怀芬止不住放声高喊：“他爹，你在哪里呀？”

刘平山和工友們忙着在灶房給沒有名字的工人扎灵堂。蔡胡子进来告訴他：“外面有个老师来找你，他說是‘蕭方’的好朋友。”刘平山听说蕭凤阶、方士廷两位烈士的好朋友又来找他，心里就更有胆量了；自从蕭、方烈士牺牲后，平山和別的工友都很焦急，想方設法打听帶路人。这陣，不由平山細想，他連忙走出灶房。从那以后，两个多月来，他脚不停地，从灶房跑到井口墳，从車房又去串連搗碓工人，爭取他們都擋下活路。

有一天，刘平山抽空跑回家中，家里房門大敞开，沒有一個人，除了一張床一口破沙鍋，什么也沒有，連孩子的籬筐窩也不見了。他一个人走到街上，來到茶館門口，看到長生坐在阶沿上，正在啃豌豆壳和胡豆壳。刘平山喊了声：“長生娃。”長生娃把他盯了半天，見他又黑又瘦，光是两个大眼睛、长头发，都认不出大哥来了。平山又說：“長生娃，是我呵！”長生听出声音，哇地一声就扑到大哥怀里。刘平山牵着長生往回走，長生餓得來双脚打顫顫；刘平山心酸，双手把他抱起，輕得象一把谷草。

劉平山問他：“娘呢？”“天不亮就推車子去了。”“嫂嫂呢？”“跟娘一起走的。”“牛兒呢？”“他，他睡了。”

“睡了？”

“嗯。娘說的，睡了。他就睡在牆背後，包谷苗苗都長起來了。”

劉平山什麼都清楚了，他再也不想回家了。他把身上僅有的一个大二百文銅元，請人宰成兩半，自己揣了半邊，把半邊交給長生，說：“弟娃呀，這一百錢你拿去喝碗稀飯，剩下的交給么嬌。我走了。”“你莫走呀，娘和嫂嫂天天念你。”“你大哥要去給兄弟伯叔報仇！”長生娃又說：“娘和嫂嫂都給我說，等你回來就吃干飯。”

劉平山哭了。他不願意弟娃看見他的淚水，車身就走。長生在後面追，一跑一跌，又哭又叫：“大哥呀，我不需要錢，我要跟你去……”劉平山急了，他心疼長生，打了長生一個耳光，把弟娃的小手掰開，將銅元塞到他的手里，厲聲地說：“听话。喝了稀飯就回家。給么嬌說，人是一口氣，就是下油鍋，也要活下去！”

長生娃吓壞了，一邊哭，一邊問：“給嫂，……嫂，說……說啥子？”

給妻子說什麼呢？有什麼好說的？長生娃說得明白嗎？唉，好歹總該留幾句話，平山抱着弟弟：“長生呀長生，我心头痛呀。莫哭莫哭，你看倒我。”長生娃真的不哭了，望着大哥的眼睛，他說：“哥哥，你讲嘛。”平山說：“你

給嫂嫂讲，大哥說的，她要走要飞，我不見怪；要等我回家，她就給么嬌一起掙碗飯。长生娃，你要給嫂嫂讲呀，心要放开些。你記得不？”长生好象很懂事，直点头。

刘平山心一狠，扯开腿就上路，再也不回头。刘平山在路上，一想起么叔和牛儿，二想起拴在梁上还没有掩埋的骨头，心头象一鍋燒开了的盐水，滾翻暴跳，他心里想：人有志，身有胆，癞蛤蟆都吆得上成都，不打倒王友謙、馬玉堂和炎帝宮，死了也不閉眼睛；充其量屋头的人滿盤餓死，他也要斗到底。

沒过好久，东場，西場，这个井，那个灶，到处擗場合，天天在鬧事。……王友謙在大安寨里，象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团团轉；晚上有个蟋蟀叫，他听见都心煩，信倒奶奶、丫头把蟋蟀捉干淨。炎帝宮的會首天天上山稟告：“燒盐匠掘得梆紧，密不漏風，查不出真凭实据。”那几天，梆梆枪、盒子炮护送着四人大轎，牽纜綫地上山下山。事情越鬧越大，逼得胡分县出面轉彎，代表王友謙和炎帝宮，答应了盐場工友的条件。

出喪那天，黑漆棺材上面鋪了紅毡，紅毡上放了一块白布，白布上摆着死难工友的骨头。在棺材后面，是燒盐工人的圍帕扎的一条长龙。长长的队伍，从大坟堡走到炎帝宮，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王善人’！”“打倒炎帝宮！”

第二年春天，馬玉堂又喊刘平山到柜房談話。刘平

山这回笑了，他还是用根小竹竿把包袱穿上，拗在肩头，与工友们一道別。当他喊声蔡大伯，蔡胡子高兴地朝他的胸脯打了一掌，刘平山才晃悠悠地走出灶房。这回倒亂子，馬玉堂加上一个誅諭，說他“忤逆炎帝宮”，便沒收了刘平山的藍本本。

刘平山又是一个沒有名字的燒盐工人，又站在人市壠上。在人市壠上，他不焦不愁，来看他的朋友多，找他的人多，他和失业工友亲亲热热，人家都听他的話。那些掌柜管事来到人市壠招短工，把工价压低杀垮，在工友們头上揮舞着签子。刘平山說：“我們不是那号人，跟着你的签子轉。你那几个臭錢，留着自己刮痧吧。”

这是一个打不倒、压不垮的燒盐工人！

八

我們記完刘平山同志一家在解放前的遭遇，天已經亮了。

今天，我們在盐場走馬觀花，往日打井的碓架，已經放进盐場博物館里；牛推或人推的車房，也成了只被旅客參觀的古董。井場上，紅磚玻璃窗的車間里，年輕的姑娘一按开关，白水嘩啦啦地灌下去，盐水就轰隆隆地流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自流井。

我們訪問的同志，大都是退休工人，他們坐在俱乐部

里，喝着盖碗沱茶，或是摇着蒲扇下棋，或是向年青人摆谈生产经验。一到中午和晚上，扎着小毛辮的孙女便跑来了，扯着爷爷的衣裳喊道：“爷爷，你又忘了吃饭啦，妈妈等你回去……。”

早晨，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四面八方，传来了震动世界的《国际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1963.9.13.

表 的 故 事

北京市电車公司有軌厂司机 陈国霖

两年前，我大女儿高中毕业后在中学里当少先队的輔导員了。我們一家人合計着，想給她买只手表。买表的那天，我亲自到店里仔仔细細挑了只一百多块錢的，还配了条不銹鋼的表帶。

回到家，我手托着这只闪光发亮的新表，真是越看越爱，越爱心里想得越多。我把大女儿叫过来，告訴她說：“孩子，你剛參加工作，家里就能有富裕錢給你买只表了，你要动心細想想，自己享的是什么样福！戴上这只表，你千万别忘了，二十多年前，你爸爸像你现在这么大那陣，可是燒香算計钟点的！”接着，我又讲起那时候半夜上班受的罪来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电車上卖票。那年头的电車工人，不論家住多远，上下班都得凭着两条腿走。我家住西单辟才胡同，电車厂在崇文門外法华寺。清早四点上班，我夜里两点就得往那儿走。这十几里地，紧走快赶也得两个钟头。走着走着，什么时候聞着龙鬚沟的臭味，什么时候

才算到了。摸黑走夜路，你脚底下还得留神，一个不小心，就許让滿街的“倒臥”绊个跟斗。“倒臥”是什么？現在的青年人，大概都沒見過。那多半是些失业要飯的人。一个个身上披块破麻包片子，肚子里多日沒食，实在耗到一丁点热气都沒有了，走着走着，一歪，倒在街上就算完了。解放以前，每到数九寒天，北京城里哪天都得往外拉这种尸首。摸黑走路让它绊个跟斗，真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

夜里走这两个钟头倒还好說，最受罪的是家里沒有钟，不知道准确的时候。

每天晚上，我躺下睡觉，我老爹就得坐在旁边守着。一会儿出去看看星星，一会儿出去听听动静。約摸着时辰差不多了，再把我叫起来。看星星，听动静，哪有准儿呢！碰上阴天下雨，就更难估算了。所以我常常不是起晚了，就是走早了。

要知道，在那种年头，你到厂晚了，就得挨几天餓。你到厂早了吧，又得多受不少罪。

到厂晚了，为什么就得挨几天餓呢？在旧社会，我們这些卖票的和开车的，虽说都有职业，其实全是“在业游民”。按照当时厂里的规矩，你上车干一天，月底才发给你这一天的工钱，要是你今天来晚了几步，派車員喊你沒应声，那今天就算沒有你那五毛四了。这还不說，明天等着瞧吧，門口准貼出来了“紅字点名——一九五”！

“一九五”就是我陈国霖。那时候开車的和卖票的，在电車公司都不配有姓名，一概論多少号。你在車上干多少年，也沒人称呼你的尊姓大名，什么时候都是叫你“一九五”、“一九六”一群号码！

什么叫“紅字点名”呢？那就是停你的班了。往后，每天清早四点，你得照旧赶来点名，在厂门口候着。哪天用着替班的，哪天你才能上車。要是一連老停班，那就离着开除不远了。开除，那又离着“倒臥”不远了。听到“倒臥”这两字，当时的电車工人誰能不胆战心惊！

那么，到厂早了，又怎么多受罪呢？这我先得說說那时候我下班以后还要干什么。每天我卖完十二三个小时票，回到家就是掌灯时分了。連累带餓，人已然乏得像摊泥，一心盼着到家能有口稀粥喝。可是进门一看，一家老少还都沒法儿动烟火呢。唉！只好轉身出去租辆破洋車，豁出命来再干。拉完晚車回来，少說也有十点了。我半夜两点又得往外走，脑袋統共才能跟枕头靠上多大工夫呀！驴馬干完一天活儿，还有个上槽的时候呢！我老爹真恨不能让我多睡会儿，实在舍不得早点叫我起来。

再說，早到厂子，也有早到的苦。

別管刮多大風，下多大雨，你得抱着票兜子在厂门外蹲着。为什么不进屋避一避呢？厂里房子倒有的是，就是不准开車的和卖票的进门。誰把咱們当人看了！

夏天在外蹲着，蚊子咬，臭味熏，还都好忍，一到冬

天可就要命了。有时候，刮風下雪我老爹沒有估摸准时候，老早把我叫了起来。我走到房子門口一打听，才一点多钟，唉！冻着吧。我渾身都穿的什么？上身是我家里的用她一条大褲衩拼湊起来的小棉袄。应名是棉袄，其实短得蓋不着肚子，糟得挂不住补釘。在車上一挤掉一块，風一吹滿街跑棉花团子。下身呢？只有条破单褲，脚底下趿拉两只烂鞋片子。十冬腊月后半夜的“刀子”風，刮得人透心寒，我觉着自己的脑浆子好像都冻成冰块了。一蹲几个钟头，也就是仗着我那陣二十多岁，多少还有点火力，万幸沒倒卧在那儿。

要能知道准钟点，不也省得晚走着急、早走受罪嗎？

我老爹疼儿心切，老琢磨这事，到底让苦日子給挤出一个穷办法来：燒香算計钟点。他买了些大根的香，事先計算好，点多长是一个钟头，用尺子比着，在香上一节节地划上墨笔道。每天晚上我睡下，我老爹就燒起香来，不错眼珠地守着，点完一根赶快再續上一根。点到第几根的哪条墨笔道上，算是到钟点了，再把我叫起来。

其实，看天也罢，燒香也罢，真正夜夜当钟用的，还是我老爹。可怜他老人家，十几年沒睡过一宿整觉。夏天，困得他滴里搭拉像串蒜瓣子，自个赶快站起来活动活动，也不敢闭会儿眼。冬天，屋里沒火，穿的薄，肚里又沒食，冻得他上牙跟下牙打仗，渾身哆嗦成一个团，还得不大工夫就冒着颼颼的夜風，站在外边去看天、听动静。更难为

人的是那份提心吊胆勁兒。叫早了，心疼兒子；叫晚了，一家人又要多挨餓。就是燒着香，他也不敢松心，万一陰天下雨香返潮了呢。

上岁数人，夜夜这么折腾着当钟使唤，我做儿子的看着心里該是什么滋味儿？

說起來現在的年輕人都許不信，就这样天天受懲，年年受罪，我們一家人誰的心里都沒敢轉过这种念头：“买个旧钟吧！”不单我家沒钟，我們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十几家人，哪家都沒钟。

那时候，亨得利钟表店也跟現在一样，在北京开着三家，从早到晚不关门。可是出来进去的，都是些坐自用洋車、小汽車，穿綢裹緞的資本家啦，官太太啦，我就沒見有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往里走过。我拉洋車、蹬三輪那六七年，天天免不了打亨得利門口过，甭說进去买了，都沒打算过隔大玻璃往里瞧一眼。你想想，老的老，小的小，还都空着肚子眼巴巴盼我早点回去呢，我哪儿有那份閑精神！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揪心日子呀！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日子，咱們应当一絲一紋地刻在心坎上头！活到一百岁，享着天大的福，也不該把它磨掉！

我常想：一个人的心坎上，要老刻着这种紋路，就好像心里多了杆金秤，添了面銀鏡子。好些事，就都容易掂量出輕重，分清青紅皂白了。只要你能掂量出輕重，分清青紅皂白，心里明明白白的，吃什么，穿什么，都能得益。

可你要是不明不白的，穿的好，吃的好，倒許得不着益。

还拿我們家头两年买的那只表來說吧！你要是就从眼前浮皮表面这么一看，自个凭本事掙的錢，存起来买只表，那是應該应份的！再說，如今我們那个杂院里，家家都有钟表，我家的小柜上也早摆着两只小闹钟了，有富裕錢多添只表也算不了什么！你要是再站在大街上比比，南来北往的干部呀、工人呀、教师呀，戴表的人多着呢。人家不但戴表，还穿着毛料衣裳、骑着自行車哪。你要这么不明不白地想，今天戴上这只表，明天就許惦着做套毛料衣裳，后天也許又一心打算置辆自行車了。全都置备齐了，你再上街一比，人家有你沒有的东西更多了。得！慢慢的，你那心里就会严絲合縫地塞滿了这些东西，成天为它奔了！

可是你要是心里头有那杆金秤，多一面銀鏡子，同是这只表，分量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只小表，你就能照出自个那小家和咱們整个国家这十几年的天大变化来！照出社会主义的洪福来！

要随时这么动心細想，日後，工作的时候，你准知道該使出什么样的勁头儿来。就是拿着自个的劳动所得，你也准知道該怎么用了，決意不会随手乱揚。哪怕你后来再有富裕錢，多添置些什么东西，它也不会塞住你的心。

样样这么量，事事这么照，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爱社会主义！越来越一心扑在社会主义上！

永远不能忘記的历史

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厂工人 禹德水

我的老家，就在北京西南角四五十里地的王庄。这里一馬平川，除了种植小麦、玉米，还可栽插水稻。真是庄稼人施展本領的好地方。

我爷爷就是这里的庄稼人。因为家里缺吃少穿，爹很早就給地主扛长活。

卖子逃生

那时，給地主打一天活，可以掙两升（合三斤）玉米。我出世的时候，已經有了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七口，每天就靠这两升玉米过活。从我記事的时候起，家里吃的离不开榆树叶。

日子一久，我們几个孩子的臉都肿了起来，顏色黃得发青，沒有一点血色。爹瞧着我們，再也忍不住了，下狠心到地主家借了債。地主定了两个条件：一是冬借一石，春还一石三，还不清，利上加利；一条是轉年必須上他家

干活，工資中先扣除債務。這明明是一條死胡同，爹為了一家大小活命，眼睜睜地钻了进去。

借的兩石玉米，把爹給買下了。成天給地主扛活，掙的玉米还不够抵償利息。借的玉米也吃完了。日子怎么过呵！

一天晚上，爹和媽商量了一下，什么东西也顧不上帶，用籬筐把我們最小的一挑，趁月黑头，拉家帶口，逃离了家乡。走了大半夜，来到了长辛店南面坟地的一个破窑，歇下脚来。这时，我发现爹的眉毛皱着，唉声叹气；媽呢，哭哭泣泣，摟着我們几个。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天亮了，爹說到长辛店去找熟人。过了很大一陣，他和一个陌生人一道来了，領着全家，在饭鋪吃了一頓飯。虽然，很久很久沒有見过白面了，对着桌上的馒头，爹媽都吃不下去，老是叹气，哭泣。

饭后，陌生人仍然跟着我們。我們來到了铁路下面的一个地下过道。过道里真黑呀！一进去，我什么也看不見了。当我钻出来时，爹不見了，媽不見了，哥哥姐姐一个也没有了。我哭呀，喊呀，但是再也不能把他們喊回来了！只有那个陌生人捉住我的两手，硬拖着，到了他的家。

后来我才知道，爹媽没有办法，把我卖了；在卖我的当天，十五岁的姐姐也給人家当了童养媳。爹媽他們上了北京，爹拉起了洋車。

铁蹄下的童年

那个陌生人叫曹中，住在长辛店曹家口，是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狗腿子。

他把我买作家里的小奴隶！八岁的孩子，每天挑水、升火、刷碗、扫地、倒尿盆……主要的家务劳动都挑在我肩上。一事不顺他们的心，不是打就是骂，罚跪变成家常便饭。

到曹家不到一年，日本侵略者来了。我的日子也更难熬了。曹家规定，要拾满一竹筐煤核，才给饭吃。可是，日本兵又不准在铁路上捡。两年多时间，为了捡煤核换饭吃，曾经十来次被抓到警务段，拳打脚踢。有一天清晨，背着竹筐出来，走到铁路边就被捉住了。“小孩，这回你可死了死了的有。”说着，拖进警务段，丢进了一个大水池，一手按头，一手按脚，硬灌我凉水，不多一会，就昏了过去。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水池的边上，嘴里还不断流出来。

可是，曹家并没有免掉我这份差事。一个竹筐仍然每天伴随着我。有一天下午，刚拾好煤核往家走，一个日本兵喝得酩酊大醉，拦住了我，逼我带他找花姑娘。我想，怎么也不能带你去欺侮中国人。他举起柳木棒就打。我乘他不注意，拔腿就跑，可他不放过我，紧紧追了来。

我跑呀跑，跑到了工厂的污水沟边，跳进了沟里。总算，这沟污水救了我的命。

回到曹家，曹中的老婆看見我头上的大疤，一身的污泥，沒有半点同情，反說：“怎么沒打死，你又回来啦！”这时，我真伤心透了。我恨死了日本侵略者，也恨透了曹家；同时，也怪怨起爹媽，怎么扔下我不管。那时，我不懂得这是旧制度吃人，爹媽也沒办法呀！

后来，姐姐知道了我的遭遇，托人写信告訴了爹。爹来到长辛店，偷偷地用洋車把我拉回了北京，我才离开了这个虎口。

哥 哥 的 遭 遇

当时，我家住在朝阳門外鋸碗胡同。大哥、三哥已經到工厂当了学徒。沒有工資，吃不飽飯，劳动時間很长，平常沒有假日，这些都用不着說了。最可恨的是資本家不把他們当人看，想打就打，想罵就罵。有一次，不知为点什么小事，掌柜的順手抄起压毡的木棍，向我大哥背上打去。这一棍打得真狠，肉烂了，骨碎了，身上穿的小褂，粘到了骨头上！打完之后，掌柜的还問：“你还学不学？”大哥恨得钻心，但是轉念一想，学徒不滿期是要賠飯錢的，家里哪有錢貼？他咬了咬牙，回答說：“你打不死我，我还得学！”

三哥在另一家工厂学徒，命运也是一样。有一次，正是元宵节前两天。他好不容易盼到了一年两天的假期，想回家看看爹媽。可就在这时，掌柜的把三哥叫了去，指着三哥織的一块地毯，一边說錯了一条毛紋，一边夺过三哥手上的簪帶，一个勁乱打，直打到新簪帶变成了一根根高粱苗。当然，一年一度的兩天假期也沒有了。

更慘的还是二哥。他起先也是在工厂学徒。突然得了痢疾。資本家不仅不給医治，反而把他交給了日本侵略者。当时北京霍乱流行，鬼子称为“霍痢拉”，一发现就集中起来，不少人还活活地被活埋了。二哥到了鬼子手里，自然也不例外，被送进一所破庙，扔在鋪了厚厚一层石灰的地面上，不給吃，不給喝，几天就慘死了。

家庭毁灭

我在北京干点什么呢？爹已是快五十的人了，拉洋車很吃力，一家人（媽、嫂嫂、小妹和我）的生活压在他身上，真是喘不过气来。我十二岁不到，剛够上洋車后面的橫木，就帮着在后面推！我們一老一小，一前一后，轉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風里来，雨里去。可是，劳累一天并不能使家里人得到溫飽。媽媽、嫂嫂、妹妹就給工厂加工毛線。但是，使足勁干，一人一天成品四五斤，工資不过相当今天的四、五分錢。全家人生活还是沒有办法，就只

有在街上撿白菜疙瘩和菠菜根，填塞飢腸。

就是这样，在吃人的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統治下，也不得安身。有一天，風雪交加，家里沒有一粒糧食。爹咬着牙出車了。我既无棉衣又无破鞋，爹疼我，不让跟車。就在这一天，爹剛租好車往朝阳門東大桥一放，一个伪警察走了过来，吹鬍子瞪眼睛，說車停得不是地方。就因为爹动作稍为慢了一点，这家伙用他的三色棒，唰唰两下，拦腰猛打。爹的腰折了！真是，乡下沒有穷人的活路，城里也一样沒有穷人的活路！

家里丧失了最主要的劳动力，从此，就只能用两頓菜根来打发日子。沒有多久，嫂嫂得了重病，当然沒有錢医，不几天永远閉上了眼睛。又过不久，小妹也結束了短促的生命。从她发綠的臉上，看得出是吃菜根、野树叶中毒死的。

爹看着这样下去，一个个都得死在这里，他下了狠心，对媽和我說：“不是我忍心，活出一个是一个，咱們各自逃命吧！”我們哪里舍得再分手啊！可是总得活命！媽到地主家当了佣人；我和爹流落在街头，当了乞討的花子。

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就在我們分散以后，日本侵略者抓劳工，腰伤的老头也沒有放过，爹被抓了。他被押到石家庄，再也經不住折磨了，就在那里結束了苦难的一生。

天下哪有白烏鵲

我离开了爹媽，到了朝阳門外七圣廟地主張家。十三岁的孩子管一大片菜园。白天黑夜地干，換來的只是吃不飽肚子的几个窝头，沒有拿过一分錢的工資；而且，經常挨打挨罵，真是受尽了欺擰压迫。在这里硬挺了三年。最后，有一天下午，我剛澆完了一块新开的菜地，少东家来了。因为是新开地，水滲得快，硬說我偷懶沒澆，不由分說，撿起地里扒葱的铁弯齿，向我奔来。我想，已經受够气了，今天不能再受欺侮！他举起铁弯齿要打我，我一侧身反手夺了过来，使勁朝他擲去，不偏不歪，正打在他腰上，哇哇叫着跑回屋叫他爹去了。我一想，不逃跑准得沒命，就这样，离开了这里。

我又进了羊圈楊姓地主的大門，管起了一片果林。这家伙心一样狠。当然沒有工資。吃飯呢？一天两頓，每頓只給两个豆皮餃子作的貼餅子。后来还因为让我去树上摘一个蜂窩，我怕蟻不肯，打了我一頓之后，規定每頓飯再減少一个貼餅子。好，你不让我吃，我也有办法。我管果林，就摘果子吃，这倒也給我找到了活路。可是，有一个晚上，他突然要吃鮮果，硬逼着我上山去摘。那是个山区，一出屋就听到了狼叫。我怕狼吃人，回說不去又必定挨揍。心一橫，走，不干了。在这家扛了不到一年活。

我又跨进了芦沟桥地主大貴家。他家有两个狗腿子真叫狠。有一次他們让我作油面吃，怪說面粘是我沒作好，一边打一边还威胁：“下頓再这样，把你塞到井里去！”我一想，这两个家伙是說得出真做得出，还是趁早跑掉吧，这就又回到了北京。

經過这三进三出地主家門，我明白了，沒有一个地主不狠，正像天下沒有白鳥鴉！我寻思，再不給地主打活了！

三双手养不活四張口

这时鬼子投降了，哥哥們也已經出師了。我沿着爹的老路，拉起了洋車。我們寻思，这一下日子好过了，凭着三双手，怎么也能养活四張口了。

可是，幻想立即破灭了，哪有一天好日子过呀！国民党的金元券、銀元券，一天一个数字，哪里吃得上飯啊？我現在还清楚記得，有一次三哥接下了一件大活，讲好的工資，当时可以足足买两石玉米，可是完工后領下的这笔錢，只够买一条小褲衩！为了糊口，我們一样不得不每天在大街上拣菜根、菜头，拿来充饥。

我拉洋車，受那帮国民党的狐群狗党的欺压就更說不尽了。有一次拉一个偵緝队的特务，从东大桥到东壩，足足三十里，肚子里空、路远，真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車停下向他要錢，他从腰間掏出盒子枪，說：“老子这是有

公事，要錢，把这个拿去。”明明是威胁，我只得忍气吞声掉轉了車头。类似这种事，我也記不清碰上了多少次。

不过，我們洋車工人也不是好惹的。等这些家伙晚上喝得熏熏大醉的时候，吆喝几个同行，拉到僻靜去处，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揍完，我們各自东西，等他醒来，早已不見人影了。当然，这也只能泄泄胸中悶气罢了。

最倒霉的事情又发生了。我拉一个客人到白塔寺，剛停下车，警察过来了，硬說我違犯交通規則，把車上的銅把摘走了。交車时，車行老板硬要我賠很多錢，否則不收車，昼夜計算租金。我怎么办呀！回家商量了半天，决定去找“李三姐”借印子錢。我媽明知，这和早年爹在老家向地主借債一样，是一条死胡同，但也只得往里钻了。

提起“李三姐”，鋸碗胡同一带无人不知。她一方面放印子錢，一方面与偵緝队勾結，誰也不敢惹她。按規定，借錢当时，就得先扣掉利息四成，然后一月之內平均償还。借了錢，車行老板那里倒是擋过去了，但是再也擋不住“李三姐”的逼討。因为，无论我們怎样拚命，也沒有錢每天還債。可是一天不还，她就上門提鍋、扒炕，甚至拿偵緝队的铁罐来威胁。没有办法，把家里仅有的几件可以卖錢的东西，包括一床破被，全都变卖了，这才还清了債務。

王双手养不活四張口，还备受欺凌，就这样在国民党統治下生活了三年。如果沒有一九四八年底隆隆的解放炮声，我們全家不知会再落个什么下場！

魚 得 水

解放了，哥哥留在城里，繼續在厂做工，我和媽回到了离別十多年不敢向往的老家。

轰轰烈烈的土改开始了，我担任了村里的民兵小队长。枪杆子第一次握在农民手上，地主老爷再不能横行霸道了。这一次，不是地主向我們逼債，是我們向地主討債，討回了农民世世代代的血債！土改中，北京还来信把我叫去，斗争了七圣庙張家地主，最后政府按照我們的意見，把这个汉奸和恶霸逮了起来。土改后，我和媽在王庄分得了七亩好地，自己新盖了一間房。

与此同时，城里也相继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哥哥斗争了他們那为非作歹的掌柜，再也不允许他任意打罵剥削工人了。

从此，我們全家都翻身作了主人。不愁吃不愁穿，也真正享受到了自由的幸福。事情就怕对比。过着新社会自由幸福的日子，想起旧社会苦难的遭遇，我就想，今天的生活来得真不易啊！劳动人民的江山一定要坐稳，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建設好。而每一次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就十分激动：今天我是主人，就得像个主人样子，坚决听党的話，坚决跟着党走！

一九五一年国家逐渐开始建設，需要大批工人，我踊

跃地参加了基本建設队伍。北京展览館、北京修造厂等处的漂亮楼房，也包括了我的劳动汗水；官厅、唐山陡河水庫几千人的庆功大会上，我得到了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的奖状！

一九五七年我剛結婚，丰台青龙头水庫开工了。当家作主的喜悦，我把媳妇也带上工地，一齐参加了劳动。新婚夫妇搞水利的事，一时被傳为美談，有的人把它画成了漫画，还有的人把我們的事編成了快板。不过，我觉得，这本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我被調来长辛店机車車輛工厂，当了建筑車間的架子工。这时，在我記憶里的“伤心店”，已經不存在了，八岁失去父母的黑洞，已堵塞起来。說也巧，現在我家又住曹家口，可是如今收工回家，飯熟菜香，早已等着我；与二十多年以前，提心吊胆地背着煤核到曹家換飯吃的情景，真是天上地下！

今天，再也不是“三双手养不活四張口”的时代了！我的大哥在天津地毯厂当工人，三哥是老家公社社員，我們各自的家里都有了四五口人，幸福地生活着。

禹德水呀，禹德水！只有共产党来了之后，我这久遭大旱的魚儿，才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幸福恩水！我常想，甜时不忘往日苦。想想自己过去的遭遇，該爱什么，該恨什么，心眼就更加明亮了。

謝大鈞整理

紡織女工話今昔

王緒生

“亲爱的潘媽媽，在這愉快的國慶節，我們很高興地把自己的成績告訴你……”

“亲爱的潘年芳同志，你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使我更加懂得了今天幸福生活的可貴……”

“亲爱的潘年芳同志，你的報告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育，我們一定要握緊手中的槍，百倍警惕地保衛祖國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

一封封熱情洋溢的信，從四面八方飛到上海國棉十二廠細紗擋車工潘年芳的手裏。寫信的人，有紅領巾，有青年工人，有解放軍戰士……。他們在听了潘年芳的報告以後，都滿懷激情地向她訴說自己的感想，汇报自己的學習和工作。

二十八年前，潘年芳是個被黑暗勢力踐踏在腳底下的包身工，在漫長的歲月里，在舊社會的最底層，她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一九四九年，潘年芳獲得了新生，成了新社會的主人。從去年開始，她擔任了上海老工人講師團的講師。近兩年中，她到過不少工廠、農村、部隊、商店

和学校，作了近百次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年轻的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

潘年芳生长在苏北泰州乡下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全家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只种着两亩祖坟地和向地主租来的三亩薄地。爸爸白天给地主家推车、挑担，夜里就披星戴月下地干活，可是到头来，交了地主的租，就所剩无几了。八口子住在两间破草屋里，墙是草泥糊的，门是蒲叶编的，四处透风。一年到头，穿的象蓑衣，喝的是稀粥。为了活命，潘年芳刚满八岁就到地主家放牛。在放牛的时候，年芳还带着镰刀和篮子割草，割满十五斤就卖给地主，换到一个铜板。对穷人来说，一个铜板也是难得的啊！年芳的妈妈常常候在路边，从她的小手里接过这用力气换来的一个铜板。

一九三四年夏天，大水淹没了泰州农村。潘年芳全家爬在树上、坐在木盆里，度过了难熬的七天。那会儿，妈妈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因为受不住这样的折磨而去世了。

天灾加入祸，逼得人们走投无路。就在这时候，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魔掌伸进了苦难的农村。

一天，村里来了个头戴铜盆帽、身穿绸长袍的陌生

人，自称是上海日本紗厂的带工老板，特地到农村来招工。他张开油嘴对老乡们说：“嘿，到上海做工可好啦，进大工厂，住洋房、吃白米饭……三年以后，工钱全归你们自己！”

淳朴的农民疑疑惑惑地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

“跟你去有啥规矩？”有人问他。

“有，规矩是：吃包饭，听老板的话。”陌生人说。

“几个钱一年？”

“一年不包，要包得包几年的。”

“几年呀？”

“三年。一年十元，先付定洋五元，怎么样？”

年芳的爸爸看看塌落的草房，看看还是一片水汪的薄地，看看站在一旁的全家老少，动心了。他对带工老板说道：“五元定洋太少，多一些吧！有錢人拿出五元錢不在乎，穷人多了五元，可能救人命哪！”

“那不行，說五元就是五元，规矩不能破……”带工老板铁青着脸，冷冷地回答。

“爸，五元就五元，让我去吧，活命要紧呀！……”十二岁的年芳噙着眼泪，央求着爸爸。爸爸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年芳的头，什么也没说，几滴热泪落到了孩子的头上。

看看事情已经入港，带工老板就拿出一张包身契。契上面写着：“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五元，人銀二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是实。”带工老板要潘年芳的父

亲接上手印，随后掏出五元錢，詭詐地說，“現在小姑娘卖給我啦，錢收下吧。”

当天晚上，潘年芳和前村后村的小姑娘，一共十个人，乘上船，由帶工老板带到上海。

二

一旦跨进这“冒险家的乐园”，潘年芳就堕入了一个新的苦难的深渊。

清晨五点钟，日本裕丰紗厂（現在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紅圍牆的旁边，站着一百多个拖着一条长辮子的农村姑娘，她們都是跟潘年芳一样，被帶工老板买来的。九点多钟，厂門开了，开始写“号头”（即登記做工）了。一个日本人拿着竹竿，象撥弄一捆捆棉紗似的，把这些小姑娘挑来拣去。身材高大一些的被写上了号头，生得比較矮小的潘年芳却被剔了出来。

当她們回到老板那里的时候，老板娘坐在門口，見一个問一个：“号头写上沒有？”写上号头的通过了这个关口，輪到潘年芳时，她胆怯地搖了搖头。老板娘順手抓起一只板凳，砰的一下，往潘年芳头上擲过去。板凳角砸破了年芳的頭頂，頓時鮮血直淋。但是，老板和老板娘是决不会让一个五元錢买来的“活工具”白白吃閑飯的。他們叫她燒飯、洗衣服、拖地板……，稍不如意，就拳打脚

踢。年芳头上的伤疤，刚结痂又被打破，怎么也长不好。

后来，潘年芳哭肿着眼睛，又一次等在日本紗厂的墙脚边。有人告诉她：踮起脚尖，看起来可以高一些。可怜小小的年芳踮着脚尖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算写上号头。就这样，潘年芳当上了包身工。

包身工的生活，把潘年芳打进了人间地狱。三十多个人，睡在一間七尺宽、十二尺长的搁楼上。寒冬腊月，四个人合一条被子。早上四点半，天色还灰蒙蒙的时候，就响起了头道铃声，夹杂着“起来啊！起来啊！”的吆喝声。搁楼上立即一陣騷动，包身工們一个挨一个地在木桶里小便，穿鞋子，用狗齿般的梳子梳辫子，把破被头堆起来……一会儿，二道铃又响了，一个小姑娘拎出一桶碎米薄粥，一只放着几片臭咸菜的粗碗。这就是早饭。于是又是一陣騷动：当当的碗筷的撞击声，唏嘘的喝粥声……。潘年芳剛喝完一碗，伸手拿起勺子时，勺子已碰到桶底了。即使喝得快的，侥幸喝上两碗，也还是填不饱肚皮。

十三四岁的、十五六岁的姑娘，已經长大成人了。可是她們穿的是露着肩膀、沒有衣边沒有袖底的破衣服，蓬头赤脚，无夏无冬。潘年芳做包身工已經两年了，身上穿的仍然是过去媽媽在世时亲手做的两套衣服，脚上穿的也是媽媽亲手做的两双鞋子。衣服已破成条条块块，鞋子也磨光了后跟，但她还是当寶貝一样保存着；她知道，不可能有比这再多一点的东西了。在夏天的晚上，这些

擋樓上常常發出“喔！痛呀……”的哀號聲，這是包身工們在相互幫助脫衣服，因為蚊子、臭蟲在她們身上咬了許多紅斑，抓破了就發炎，衣服都粘在爛瘡上了。爛瘡給潘年芳身上留下了斑斑疤痕，成為她永遠忘不了的苦難的标记。

作為“會說話的工具”，潘年芳和小姐妹們是沒有一點人身自由的。每天，她們被帶工老板或者老板手下的流氓押着上班下班，不准與外人講話，不准與亲人見面，不准寫信。……在工廠里，吃飯也是違法的。廠里規定吃飯不關車，她們只好站在車旁，一邊工作，一邊乘那些統治者去吃飯的間隙，用手抓着冷飯，往嘴里塞。吃飯如此，大小便同樣地被控制得嚴嚴的。兩個車間的幾百個人合用兩塊牌子，凭牌進廁所，沒有牌子不准去。有時半天也拿不到牌子，小便在身上的人不是個別的。她們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車間里絮塵飛揚、蒸汽如霧，惡浊的空氣令人窒息。這還不算，那些穿着大皮靴的日本領班，穿着木屐的東洋婆（日本女人），穿着圓口皮底鞋的“拿摩溫”（工頭），象餓狼一般整天在車間里踱步尋事，侮辱工人。哪裏斷了頭沒有接好，哪裏錠壳輒壞了，或者皮輶擺錯了方向，只要被他們挑到一點差錯，就會招來一頓打罵。包身工，更是他們壓迫欺凌的對象，他們愛怎樣擺布就怎樣擺布！日本領班動輒用大皮靴踢她們的下身；東洋婆常常扭住包身工往“車弄堂”里摔，摔倒了再踏上几木屐；拿

摩溫呢，拉住包身工辮子拿銅管、木管劈头劈腦地亂敲。碰到這種情形，她們只好流泪哀求，哭聲大一些，就要受到更惡毒的毒打。

做包身工后的第二年夏天，潘年芳的脚底心里生了一个疮，沒錢医治，还要拖着半截鞋在細紗車弄堂里不停的跑。伤口扩大了，紅凸凸的，象只小人拳头。有一次，潘年芳搭脚在車梗上伸手拿細紗，不料铁梗碰到烂疮，一陣钻心的剧痛，使她連連“啊唷”了几声。她弯下腰剛要看看伤口，日本領班来了。

“揩油！坏东西！”日本領班过来，恶狠狠地朝着潘年芳連踢了三脚。

潘年芳惊惶失措地逃向厕所，拿摩溫觉得这正是自己討好日本人的机会，立即追上去拉着她的辮子，边打边拖到日本領班的写字間里去。

“揩油坏东西，开除，开除喲！”日本領班翹起腿坐着，嘴角边叼着一枝香烟，露出了一副吃人的凶相。

开除！可以离开这活地獄，这不是潘年芳日夜盼望着的嗎？可是，能行嗎？帶工老板的皮鞭和獰獰的面孔浮現在她面前，毒打和死亡的阴影籠罩着她的全身。她顫抖地哀求着：“求求老板，不要开除我，我是吃包飯的啊！”

“哼！”日本領班冷笑一声，就叫拿摩溫把一只方凳四脚朝天放倒，要潘年芳的两只手和两个膝盖抵在四只凳

脚上，臉朝地的趴着。就这样，潘年芳“趴”了足足三个小时，才保住了飯碗。

三

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被踐踏，很多人被折磨得瘦弱不堪，有的患脑膜炎等急病死了，有的害疟疾死了，也有泻肚子泻死的，倔强一些的姑娘，那就被活活打死。跟潘年芳同船出来的十个小姑娘，只剩下了五个。她的同村姊妹陈桂英，是在她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是潘年芳永远也不会忘却的事。

陈桂英是潘年芳的邻居。她俩在一起背着籃子割草，一起玩耍。来到这吃人的地方，她们又同睡一个被窝。第二年，桂英得了黄疸病，渾身沒有力氣，連路也走不动了。她喘着气哀求老板說，“今天实在做不动了。”可是，“請假”的例子是不能隨便开的，老板隨手啪啪地往桂英头上打去。桂英一个踉蹌，倒在地上，一时的惊慌和气愤，使她禁不住大哭起来。在这个地方，大声地哭，就是一种反抗的行为。“呀！賤骨头，你敢哭，看誰有本事！”老板抖动滿臉橫肉，吼叫起来。他丢了一个眼色，狗腿子就把桂英反繩着手吊在梁上，又扎紧了她的褲脚管，灭絕人性地把一只黃猫塞进桂英的褲裆，接着又用皮鞭抽打，鞭子一抽，黃猫就在里面乱跳乱抓，尖利的貓脚爪把桂英的

下身和两腿抓得鲜血淋淋。为了“杀一儆百”，老板又逼着其他包身工在旁边看着，就这样，一直折磨了三刻钟。

桂英被姊妹們搬到閣楼上时，已渾身是血，不省人事。从那以后，几天来，她一直閉着眼睛，不哼一声，也不願喝一口水，只是紧紧握着两只冒着冷汗的拳头。

“桂英姐，喝一口粥湯吧……”潘年芳下工回来偷偷地盛了半碗薄粥，噙着泪水扑在桂英身上。

桂英的嘴唇牵动了一下，想說些什么，但，声音沒发出，泪水却涌了出来。她掙扎着，睁开失神的眼睛，猛的捏着年芳的手，哆嗦着說：“兰英（潘年芳的小名），你要替我出这口气啊！你对我爸爸說，要算这笔賬……”倔强的桂英，終於离开了人間。

包身工里也有烈性子的姑娘，想到过“逃走”这条路。但是，在流氓的严密控制下，沒有一个能逃出他們的魔掌。有一个姓蔡的十一岁的小姑娘，暗地里認識了一个好心人，張罗了几个錢，在一个阴暗的清晨，在上工路上逃了出来，搭上了回家的小輪船。就在这时候，流氓趕到了，連忙把她拖回去。在一間空房子里，流氓用布头塞住姑娘的嘴，渾身毒打。第二天，有人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潘年芳受尽剝削和痛苦，熬过了四年（三年后，带工老板想出种种借口，要她多做一年），才算脱离了包工老板的魔掌。

可是，在旧社会里，对于一个工人來說，脱开这个带工老板的魔掌，却跳不出那个老板的魔掌。重重叠叠的黑暗勢力压在头上，使潘年芳始終喘不过气来。抗战胜利后，潘年芳从裕丰紗厂轉到大康紗厂（国棉十二厂前身），但国民党反动派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差不多，世道仍旧是一样，騎在人民头上的仍是那些压迫者和剥削者，被踩在脚底下的还是工人。由于长期的折磨和劳累，解放前夕，不到三十岁的潘年芳，已經渾身是病：严重的妇女病；拖了十多年的痔疮，整天流着血和膿，走起路来不能跨大步；胸口生了个大血块；还害了血吸虫病，像个怀胎十月的孕妇。白天，她拖着碎步上工；晚上，由丈夫背到家里。在潘年芳看来，她这一生除了受苦难以外，再沒有什么希望了。她甚至念佛吃长素，想修个好来生。

四

然而，黑夜总有尽头。包身工終于見到了太阳，共产党和毛主席給受苦人带来了希望。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工人翻身了。厂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包身制取消了，拆除了專門給工人走的木栅栏。潘年芳从十二岁做工到現在，第一次揚眉吐气地从大门走进走出；滿臉橫肉的工头恶霸，都被斗倒了。……

在旧社会里受尽折磨、被病魔拖得半死的潘年芳，在

党的关怀下，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治疗。解放第一年，她在工会的帮助下，把拖了十多年的痔疮割治了；同年下半年，她又进医院治好了血吸虫病；第二年，她开刀割治了子宫瘤，第三年，为了根治她的脾臟毛病，厂的领导和院方經過仔細研究，为她动了大手术，在胸部左下面开了个六寸长的刀口，从胸腔里取出了十斤重的大血块。潘年芳的生活也越过越好了。她的丈夫在旧社会里长期失业，現在才有了固定的职业。老夫妻身边有个十三岁的小女儿，儿子和媳妇在北京工作，孙子孙女也有了。

最近，在国棉十二厂的工房里，我訪問了潘年芳同志。她住的房子不算大，但收拾得十分齐整。当我打量着房間的布置时，她就忙着为我指点說：“你看，我做包身工时根本沒想过要桌子，以后做工結婚时用的是四脚搖擺的破板桌子，現在是四平八穩的紅木台子；过去当包身工睡的是地鋪，以后結婚是用两条竹凳子擋上四分厚的鋪板，現在睡的是新床。”她又指着房間里的箱、柜說：“这些都是解放后买的。……”

在她房間的墙上，挂着几个玻璃鏡架，里边嵌着很多照片，很多是她在杭州工人疗养所休养时拍的。有一个鏡框里放着工人文化宮聘請她担任讲师团讲师的聘請书，她指着它激动地說：“党不仅夺回了我的健康，給了我幸福生活，还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我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入了党，去年又被聘为老工人讲师团讲师。我要把自

已亲身經歷的千辛萬苦告訴青年人，要他們珍惜新社會的美好生活，永遠不要忘記過去。”

那天，她興致很高，陪我到她當包身工時住的地方去看看。我們從她的家里出來沿着海州路、貴陽路走向她二十八年前住過的裕丰工房——現在是國棉十七廠定海路四百四十九弄工房。如今，這裡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工房的大門口高掛着毛主席像和大紅星，潘年芳拉着我的手氣憤地說：“過去，這裡進出的是兩種人：一種是叉着腰、呼幺喝六的老板、老板娘和流氓；另一種就是叫化子一樣的包身工。她領我走到右边最末第二幢房子前站住，紅着眼圈說：“這就是從前我們住的地方，桂英姐就是死在這擋樓上的。”而現在，一切都變了，這裡住着幸福的工人家庭，房子已修理一新，暖和和的陽光透過玻璃照射進去，更加顯得舒適和寧靜。

工房後面有兩扇掩着的淡藍色的門，門上寫着“兒童樂園”四個字。潘年芳已多時沒有來過這裡了，她快樂地叫了起來，“你看，這有多好啊！二十八年前，這裡是一片荒草哪！”我們推門進去，只見兩排房子，粉刷得雪白，衬着淡藍色的玻璃窗框，分外耀眼。房子里邊整整齐齊地排着小紫紅凳子，在房子後面還有個小花園。一群四五歲的孩子在歡樂地玩着。

我們又沿着潘年芳過去每天拎着破飯籃上工的定海路走向國棉十七廠，她指着兩旁的商店和厂房說：“那時，

这里全是长得人把高的荒草地，我們多少个好姊妹被虐待死去以后，尸体用芦席一卷，就丢在这荒地上。……”

一陣欢乐的笑声打斷了潘年芳的談話。迎着我們走來的是一群放工回家的女工。她們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凡是冬天出門所需要的都有了。她們的手里都拎着一只小提包，手提包里有的放着正在編織的毛綫衣物，有的裝着順便在街上买的一些日用品。有孩子的女工，抱着寄托在工厂托儿所的孩子，这些小孩都被耀眼的花布棉袄或鑲着白色毛毛邊的紅綢子斗篷緊緊裹着；有的還戴着小口罩，只留两只烏油油的小眼睛望着媽媽。有的女工還同推着自行車的愛人并肩走着，他們大都是在一个厂工作的；有些女工的丈夫在邻近工厂工作，順便等在厂門口同道回家的。另一群嘻嘻哈哈打鬧着的十八九岁的姑娘，是年輕一代的紡織女工。她們穿着鮮艳的短棉袄，卡其布褲子。潘年芳指着她們說：“你看！她們是培訓工，国家除了供給她們吃住以外，每月还有七八元的零用錢，每天工作八小時，有老工人包教技术；下班后，工会还組織她們开展文娱活动，唱歌、跳舞、看电影。……比比我們的过去，真是天上地下。……”

是啊，天上地下，換了人間。从这个包身工的今昔对比，从两代紡織女工的巨大变化，我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党是永远不落的太阳，她給我們光明，給我們溫暖，給我們幸福，給我們力量！

我的学徒生活

上海汽輪机厂鑄鋼車間工段長 应德全

一九三〇年三月，我剛滿十二岁。一天，母亲給我換上一套半新的夹衣，叫我跟嬸嬸到上海來学生意。到了上海，嬸嬸备了一副香烛，在一个阴沉沉的上午，把我送进当时的項興昌翻砂厂。从此我就象进了监狱一样。

項興昌翻砂厂在当时还算是个比較大的工厂，有四十多个老师傅和二十多个学徒。老师傅們晚上回家，我們二十多个学徒就睡在一間小擗樓上。在这个小擗樓上，老板用毛竹搭成三层床鋪，就象是“鴿子籠”一样。每天清晨，我們从“鴿子籠”里钻出来，走进黑洞洞的又矮又小的工場間，点起幽幽的灯火，开始篩砂泥、拌砂泥、糊炭灰，把当天造型用的砂箱一只只扛到老师傅做生活的地方去。这铁制的砂箱，輕的一个人可以搬得动，重的則有五百斤到一千斤，又沒有行車等起重設備，大家只好用杠棒抬，五六人或七八人挤在一起，象螞蟻搬骨头一样把砂箱一个个地搬到指定的地方。这些重活不做完，老板是不准我們吃早飯的。我們常常要做到八九点钟，才能吃

早飯。早飯沒有菜，每人每天只发一个銅板。当时买一根油条要三个銅板，我們只得三个人合起来买一根油条，大家分着吃，有时弄一匙酱油往粥里一拌——吃“紅粥”。这样半饥半饱地吃一頓早飯，熬到中午，又是什么呢？老板是个吃素的，規定葷菜不准进门，全厂老师傅和学徒只得陪着他吃素，天天吃的是臭咸菜、煮青菜。其实，他吃素是名，“刮皮”是实。我从十二岁学生意到二十二岁，吃了整整十年的素。下午，化铁炉生起火来，工場間烟雾弥漫，一直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开炉出铁水澆鑄。老板規定，一定要在出完铁水、澆好全部鑄件以后，才能吃晚飯。等到澆好鑄件，这时差不多已是晚上十时左右了。老师傅們吃了晚飯，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去了，而我們学徒还要整理工場，經常干到深夜一二点钟才能休息。有时老板还要逼我們加夜班。我們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就睡着了。后来，我們就索性睡在工場里。夏天，我們常常弄一块木板，把两头擋在砂箱上，就算作床鋪。冬天，有热气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最好的睡觉場所。我們学徒經常是五六个人背靠背地挤在出铁坑里，靠出铁坑里的余热暖和身子，直到铁坑漸漸冷下来，我們才被冻醒。

工場間整天飞揚着灰尘，空气十分混浊。我們根本沒有錢、也沒有时间去洗澡，一年到头，渾身都是黑的。有一次，我母亲从乡下来看我。我三步并二步地跑到母亲面前，母亲却呆住了。她睁着两只眼睛瞅着我，左看右看，

好象不认得我似的。原来这时的我，除了两只眼睛会动，一排牙齿是白的以外，脸上身上一片墨黑，真象从炭窑里掏出来的一样。等我喊了一声“媽！”她才惊醒过来，一把将我抱住，嗚嗚地哭了起来。我离家时，母亲为我做了一件半新半旧的夹衣，进厂沒有多久，就被我穿得象理发店里的磨刀布一样。那时，我們一年只有八天假期，可是每到节日，老板又要我們学徒把全工場的全部砂泥篩一遍，然后才能休息。这样一来，我們只好在节日前夜再加一个通宵班，把砂篩好，在第二天上午睡一觉，下午才可以休息半天。这时候，我們才能够稍稍透一口气。

那时做学徒，是很难学到技术的。老师傅們忙着做自己的生活，哪有心思来教我們呢！老板也巴不得我們学不到技术，这样，我們即使滿了师，由于沒有手艺，人家不要，就只好繼續在厂里为老板卖命。我在項兴昌翻砂厂做了两年杂活，才被派做小泥心。当时，我心里很高兴，以为可以学到技术了，哪曉得却被調去受活罪。当时全場四十多个老师傅用的小泥心全部都叫我一个人做，我技术又不熟练，哪能来得及？但老板是要靠燒好的鑄件去賺錢的，一碰上泥心来不及供应，就叫領班的工头拿着铁棍来打。铁棍常常又是剛从铁水里抽出来的，燒得火紅火紅，一棍打到身上，就在我身上留下一串紫紅色的血泡。我实在被打怕了，大热天，有时也穿着一件破棉袄坐在工場里打泥心。这样即使挨打，也不致把皮肉

燙坏。翻砂工場的溫度本来就很高，再加上穿件棉袄做生活，真象坐在火坑里一样，难受极了。但是这比火紅的铁棍打在皮肉上总要好受得多。

那时，我也下过几次决心，要跳出火坑。我曾逃跑过好几次，但都被送了回来。一次，我被領班打了一頓后，逃到一个师傅家里。师傅虽然很同情我，但連他自己也吃不飽，又怎能收留我呢？这样我又被送回到厂里。第二次，我做坏了一只“生活”，为了怕挨打，就逃到我叔父家里。叔父也养不起我，只好再把我送回厂里。叔父一走，老板就恶狠狠地拿起藤条鞭子把我毒打了一頓。第三次，我又做坏了一只“生活”。我怕老板再用藤条鞭子打，又逃跑了。这次，我混在人群中，挤上了船，回到宁波乡下。当时，我还天真地想：这次我逃出了上海，老板总归拿我沒办法了。可是回到家里以后，我又冷了半截。我家实在太穷，回家后媽媽不但不能养活我，而且老板还要她赔三年飯錢，我家又怎能赔得起呢？媽媽抱着我痛哭。我想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仍旧回到項兴昌翻砂厂去做牛馬。

一九三五年，也是我的学徒生活的最后一年，虹口地区的翻砂工人，为了反抗資本家的残酷剥削、爭取把每天的劳动時間减少到九小时而举行罢工。当时有些老师傅告訴我，我們工人要翻身，就要團結起来和資本家斗争。我高兴极了，就跟老师傅們一道行动起来。一次，我去通

知隔壁一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哪晓得被老板发现了。老板打了电话到巡捕房（警察局），巡捕房开来一车子全副武装的巡捕，动手抓人。我厂老板指着我对巡捕说：“这个小赤佬是个坏东西，把他带去。”就这样，我与其他五位老师傅被关进红车子，押到当时嘉兴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当天，虹口的翻砂工人大多到巡捕房门前去示威，要求释放我们。在工人弟兄的压力下，他们才把我们放了出来。但是，我们六个人还是被老板借口参加工会开除了。老板还在报上登了声明，使我们长期找不到职业。我为了生活，不得不东奔西走，经常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上海解放后，我进了通用机器厂（上海汽轮机厂的前身）做工，生活才安定下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工长。一九五八年，我的儿子在初中毕业后进了我们的工厂，被分配在我们工段里做造型工。年轻的一代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想想我们当年的学徒生活，我真为他们感到幸福。党为他们开辟了多么美好的天地啊！

薛润德整理

在一場民族糾紛的圈套下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塔上公社 塔上大队副大队长 刘廷贵

最毒不过地主心。在旧社会，万恶的地主阶级，在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着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还常常互相勾结，打着“民族”的旗号，制造纠纷，从中取利。俺家就是在地主制造的一场纠纷中倾家荡产的一户。

俺家是回族。土改时尽管连个贫农都算不上，但是在四十五年前，俺家还耕种着祖传下来的十亩好地和十七亩碱洼地。那时，再加上父亲卖点酱油、醋，一家七口人，生活虽说不上好，但也过得下去。哪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祸事突然临头了。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农历正月初三。俺父亲刘步峰，一向勤快、老实，又逢刚过春节，所以一清早就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一打扫不要紧，邻村黄龙潭汉族地主黄金榜和张介臣，硬说俺家偷了他们的干草，带领着十几个狗腿子，堵住门口要搜。不管俺父亲怎样解释，他们都一口咬定是俺家偷的。

这时，一个叫张顿的汉族弟兄站了出来。他是黄龙

潭村的，在俺塔上給回族地主劉獻曾打短工，對俺家比較了解，就勸解說：“劉步峰一家是安份守己的，不會干偷偷摸摸的事，是不是誤會了？還是再訪查訪查吧。”

這兩個地主一看穿的破破爛爛的張頓竟敢幫回民說話，立時把狗眼睛一瞪，說：“你不在家跑到這裡干嘛，一定和賊回子有勾結，先把他綁起來！”不容分說，狗腿子就把張頓綁了个結實。接着就硬往俺屋里關。

站在一旁的回族老乡劉蔭池，見地主欺人太甚，氣不平地說：“你們要搜也可以，可是搜不出來怎麼辦？”

“怎麼辦？——你也是他們的同黨！”地主一声吆喝，狗腿子上去兩巴掌，打得劉蔭池鼻口出血……

就这么着，俺家象犯了抄家罪似的，屋裏屋外，被翻了个底朝天。干草，當然沒有搜出來。可是，在當時那個天日下，哪處去說理呀！他們又說俺家把干草藏到別處去了，把俺父親打了一頓，又綁起來，要送往縣衙門。俺看捆上父親就急了，過去拉住說：“搜沒搜出來，怎麼還綁人！”黃金榜過來就是一脚，把我踹了个趔趄，疼得半天喘不過氣來。俺父親被帶走了，家里哭哭叫叫地半宿也沒睡覺。

第二天，俺母親叫俺到城里給父親去送飯，順便打听打听案子怎么样。俺送完了飯，就住在西關馬家店听信。天晌午的時候，正趕上在縣衙門里做飯的一個漢族老乡來了，他告訴俺說，俺家的案子不十分要緊。因為地主沒

搜出干草，就在路上拉攏張頓，叫他證明俺家偷了干草，事后給他一些好处。地主以為有錢能使鬼推磨，万沒想到張頓人穷志不倒，到了堂上，實話實說，把地主氣得干瞪眼睛。他勸俺不要着急，過兩天打個保，就會放出來的。過了兩天，果然俺父親取保釋放了。一個老實人家，雖然無緣無故地挨了頓打，坐了兩天班房，可是人回來就歡喜啦，哪敢再去分什么理呢。

但是，俺村回族地主劉獻曾知道後，却大罵俺家孬種，給回民丟了臉，并說：“你完了，我可不完，這官司我替你打！”俺父親說：“三爺，這個事是受了屈。可是要打官司，俺耽誤不起功夫，又拿不出錢，還是算了吧。”劉獻曾把胸膛一拍說：“一切有我呢，你就整好吧！”

當時，俺和俺父親雖然學到了漢族地主的毒辣，但是對本民族的地主缺乏認識，還覺得人家腰杆硬，能替自己出口氣也不錯，便沒有再說什么。

從此，劉獻曾經常坐着兩個驃子拉的大轎車往縣城裏跑。可是官司打得怎樣，他不說，俺家也沒敢問。一天，俺進城去趕集，碰巧看見劉獻曾和黃龍潭的黃金榜、張介臣一块从縣衙門里出來。他們一路走，一路說笑，好象老朋友似的，最後還一块到飯館去喝酒、吃飯。俺心里捉摸：兩家打官司，是冤家對頭，干嘛他們這樣亲近呢？莫不是有什么圈套？我回家告訴了父親。父親听了之後，沉吟了半天，才叹了口气說：“看來咱這點地要保不住了。”

我問：“为什么？”父亲只搖了搖頭，說了句：“这年头什么事都有呵！”

过了几天，俺父亲去問劉獻曾。这个狡猾的地主一見俺父亲就哭喪着臉說：“黃金榜他們已經托了門子，看來官司不大好打！”俺父亲立時轉舵說：“三爺，不好打，就算啦，反正俺家也打不起！”劉獻曾嘿嘿冷笑了兩聲，陰險地說：“到了這一步你想撤腿也不行啦，我不能跟着你丟臉！官司，我一定要打下去，他們能托門子，我也能走動走動，走着瞧吧！”

地主的心，都是又毒又狠的。俺家打不起官司，他硬壓着头皮讓俺打，他圖個嘛？还不是看着俺家那十亩好地。俺父亲這時已經看透了地主的陰謀，愁得整天連飯也吃不下去。可是俺愁地主却樂呢。他更加緊往縣城里跑，那大轎車叮叮當當的鈴聲，真象催命似的叫人難受！

當地里的高粱長到一尺多高的時候，一天，劉獻曾高興地通知俺父親說：“我总算沒白出力，官司打贏了！過幾天就給你唱戲、賠禮，這回你的面子可不小呵！”俺父親雖然心里愁得厉害，但是表面上還不得不說“托三爺的福”、“感謝三爺的幫忙”。過了幾天，果然黃龍潭村來人在劉獻曾的房後，搭起了戲台，敲起了鑼鼓。俺父親擔心這筆賬無法算，連戲台邊也沒敢傍，只是悶在家里唉聲叹氣。我年輕不大懂事，就跑去轉了轉，見劉獻曾戴着眼鏡，榮耀地坐在看台中間，象立了什么大功似的，一会儿和这

个夸，一会儿又和那个讲，根本没有俺家的事。俺跑回家生气地告诉父亲：“不是给咱唱戏赔礼嘛，干嘛一点也不提咱家的事，这戏到底给谁唱的？”俺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眉头上的疙瘩越结越大了。

可是，戏台拆了之后，俺父亲却被刘献曾叫了去：

“戏给你唱了，你的脸也有了，我这两条腿跑得也累了。”刘献曾打了个饱嗝，接着说：“累点嘛，为了咱回民，倒没有嘛，可是托门子花钱着实不少啊。我也知道你家不太宽裕，我既管了这档子事，也就参加一份，你少拿点，就掏三百三十块吧！”

“三百三十块！”在那年头可以置七八亩顶好的地。俺家每天都过着“鸡街食”的日子，哪出得起！俺父亲脸都吓白了，哆哆嗦嗦地说：“这么多钱，俺……俺家……怎么……拿得出！俺原先就不愿打官司，三爷说一切由你担着，如今又叫俺出三百三十块大洋，这……这……”

“你这哑巴（当地骂人的话）真不知香臭！你牵了牛叫我替你去拔橛子，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刘献曾声色俱厉地说完，又马上转了个弯儿，假惺惺地说，“什么事得讲心呵！为了你家的官司，我又跑腿、又出钱，你说，我图嘛，我的地也不是白拾来的！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咱塔上的回民。”

“可三爷，俺家实在没有呵！”

“没有？——不是有地嘛！”

俺父亲这几个月担心的，就是地。現在一切摆清楚了，地主設的圈套也正是为了俺家的地。可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呀，怎么能輕易出手呢！俺父亲連忙哀告說：“地卖了，让俺一家老少吃嘛，三爷……”

“卖了，可以再置嘛。”刘献曾一瞪眼睛，坐在太师椅子上，翹起了二郎腿。

不假，他家年年都置地，当时村上的好地差不多都成了他的。可是咱們回汉劳动哥儿們，却越趨越穷，誰还能买地！俺家要沒了那十亩好地，一家的生活都成了問題，哪还有力量再置！俺父亲苦苦哀求他，他却一口咬定：“一个銅板也不能少！”最后，俺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咽，卖了七亩半带青苗的好地，才算把这个窟窿堵上了。从此，俺父亲忧愁成病，再加上以后的日子不好过，沒过多久就死了。

鬧糾紛的这一年，由于卖了一家活命的好地，其余的孬地又沒有收嘛，第二年一过年，粮食就不够吃了。一家老小只好弄点稗谷子，蒸点窝窝两手捧着吃。吃得連屎都拉不下来。后来，实在熬不下去了，就硬着头皮向刘献曾借粮食。向地主借粮，是填不满的无底洞，不久俺就被地主拉去当短工，頂債。那时，俺虽然十八岁了，可是身子骨长的差，不管鋤地还是收割，即使拼命地干，还常常落在后面。有时在地上想直直腰，喘口气，让地主看見了，非打即罵，遭的那份罪簡直別提了！晚上，人家吃飯

去了，我还得給他家挑水，一挑就是十几担，肩头都压肿了。就这么着，从早忙到黑，累得夜里連炕都爬不上去，一家人的生活还过不了，只得再陸續卖地。到解放前，俺家只剩下了几亩人家都不要的碱洼地，还没有还清刘献曾的閻王債！你看，在旧社会，还有咱們老实庄稼人的活路不？

更可恶的是，地主阶级通过这次纠纷，不仅害得俺家倾家荡产，并且进一步挑撥塔上和黃龍潭两村回汉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榨取人民的血汗。俺村的人到黃龍潭那边拾柴，黃金榜就挑撥汉族群众抓住打，打完了再打官司，他向大家斂錢；黃龍潭的人到俺们这边割草，刘献曾就慫恿回民群众动手，打后再經官，錢当然由塔上回民掏腰包。就这么着，一来二去，日久天长，两村的回汉劳动人民越来越穷了；而肥了的却是两村的回汉地主！

解放后，两村的劳动人民斗倒了地主，翻了身。但是，有些人对过去两村回汉民不团结的原因还搞不太清楚，因此，有的时候还互相鬧意見，吵架。一九五五年，孟村回族自治县成立后，两个村的代表在一起开了个会。在这次会上，大家通过揭发回汉地主的罪恶，才彻底弄清了过去的不团结是地主阶级挑撥造成的。俺对这件事情自然体会得更深。有人說：“天下穷人是一家，世上地主一个媽。”这句话說得对，說得好。俺家在被誣为偷干草的时候，是黃龍潭汉族老乡張頓不受汉族地主的利誘說了公

正話；俺在县城里听父亲案子的消息，也是汉族老乡帮了俺的忙。可是这场官司呢？是回族地主刘献曾“替”俺家打起来的；打官司中间，刘献曾和黃金榜是互相勾結的。結果也很明白，俺弄了个倾家荡产，全村群众也跟着花了很多錢，听说黃龙潭的群众也是这样；而两村的地主却一文也没有拿，当年刘献曾还买了二十八亩好地！地主的手段多毒，地主的心多狠！

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不团结的根子就挖掉了，咱们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关系。因此，现在咱们两村回汉民特别团结，有事互相帮助，往来也很密切。至于俺家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也一天比一天好。去年，俺家五口人分了两千四百斤粮食；今年，俺儿子又结了婚，一家人欢欢喜喜，过着幸福的日子。这些，当然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带来的。但是当咱们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可不要忘了过去的苦，更不要忘了阶级斗争，因为这些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可能在“民族”招牌下玩弄什么新花样。咱们要翻身不忘过去苦，永远跟党向前走！

吳 章記錄整理

他沒有等到这一天

——小涼山彝族奴隶家史

李 乔

我的汉子布火是云南大理县人。他才有一張桌子高时，不知怎么被奴隶主搶來小涼山，当了賈巴家的娃子。

我原是四川大涼山莫西馬都家的娃子，四十年前，奴隶主把我一家人綑来云南，卖給小涼山的賈巴家。我长大了，賈巴家便把我配給布火，讓我們替他生小奴隶，他好出卖。

布火同我很合心，沒有几年就生下三四个孩子。眼看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奴隶主不知什么时候会来拉去拍卖，布火和我很担心。我們舍不得吃，把奴隶主給我們吃的火草巴巴給孩子吃。只是孩子們沒有穿的，他們一年到头，不管下雨下雪，都是赤条条的光着身子，我和布火非常心疼。

布火心思很灵，他替奴隶主干活完了的时候，便到松树林里去挖茯苓。他一看那棵松树，就知道它們根下有沒有茯苓；他靠着这本事挖得了許多茯苓，然后背到一两

百里外的汉族地区去出卖。

一天，他高高兴兴的回来了，流着汗水的脸上带着微笑。我一見他那样子，猜到他一定換得我們需要的东西了，心里也乐哈哈的，赶忙燒火做飯給他吃。孩子們几天不見他，喜欢的跑来他的身边，一个拉住他的手，一个拉住他的褲脚，亲热的向他叫：“阿达！”布火忙得来不及揩一揩脸上的汗水，就抱起孩子來向他們逗乐。

“衣海，你要不要新衣裳？”

“阿达，要。”

“补海，你呢？”

“我也要！阿达，人家笑我露着光屁股！”

“好，阿达縫給你們，讓你們第一次穿一穿新衣裳。還有你媽也要縫一件，她活到这个年紀，還沒有穿过新衣裳哩！”

我听着布火的話，心头甜蜜蜜的。实在，我活到这个年紀還沒有穿过新衣裳，天天穿的都是奴隶主婆娘穿烂了不要的破衣裳。我多么希望穿到一件新衣裳呵！

我們那間破板房內平常很阴冷，今天却怪溫暖的。布火同孩子們正在逗玩，忽然，那扇篾笆門被推开了，一个披着黑披毡的大汉弯着腰走了进来；孩子們一見他，生仿小鸡見到餓老鷹，吓得变了臉色，跑到我背后来躲着，不停的在发抖。布火見了他，剛才一臉的笑容不知哪里去了，忙从火塘边站了起来，恭恭敬敬的向他招呼：

“色坡，請坐。”

奴隶主賈巴烏可高傲的站在屋里，臉孔拉得很长，那烟容象滿天烏云，两只眼睛里噴出两道怒火对着我汉子，好象要把他一口吞去。我一見他，心里就发抖，知道今天他进来不会有好事。果然，他站了一会，悶声悶气的向我汉子开口問道：

“这几天，你到哪里去？”

“我一处沒有去。”布火从来不說假話，今天見了奴隶主那样子，心里有些怕，不得不撒謊。

“你一处沒有去？你媽的，你还哄我！”賈巴烏可放下臉，一陣暴風雨发作了。他走到布火的身边，从布火背来的那只簍籮里用力一拉，拉出了一匹用羊皮包着的土藍布。

“这是啥子？你一处沒有去，哪里来的？”

布火沉着臉，一句話也不說；肚子里装滿了气憤，胸脯一起一伏的。

“我問你：这是哪里来的？你是不是偷来的？”

布火的胸膛要气炸了，只得老实的回答道：

“我挖茯苓換來的。”

“你还換得了什么？”

“別的沒有了。”

賈巴烏可不相信，在簍籮里搜了一会，搜不出什么东西，他又来搜布火的身上。这一搜，把布火藏在身上的一

个銀子搜到了，他啪的順手打了布火一个耳光。

“你說沒有，這是啥子？入你媽的，你這個死娃子心大了，你不要主子了！”

我知道这只吃人的豹子眼睛一紅，不会有好事，忙向他乞求道：

“色坡，他咋个敢这样，請你……”

賈巴烏可不做声，拿起那匹土藍布和那个銀子，气冲冲的轉身走出去。布火辛辛苦苦的挖了几天茯苓，又辛辛苦苦的背去卖了几天，想不到所得到的結果是这样，气得抱住两手在发抖。我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气愤，对布火說道：

“唉，你想弄点錢，哪里想到討了大禍啦，咋个办？”

布火綑着臉，站在屋子里：

“他要咋个，隨他！”

我料到賈巴烏可拿了銀子和布匹去，不会就了事，他回头就会来泡炙布火。忙走过去推着布火：

“他是一只吃人的豹子，布火，你赶快跑！”

布火望着那几个孩子，孩子們也呆呆的盯住他。

“我咋个忍心丟下你們？我死也要同你們死在一起……”

布火的話沒說完，賈巴烏可領着两个狗腿子冲进来，拉着布火的衣領就走。我撇开腿，跟在后面求饒道：

“色坡，請你饒他！……”

賈巴烏可一臉的怒容，两只大褲脚蓬噏蓬噏的在发响，一会，轉过头来瞪了我一眼，

“饒他？媽的，他的心比老虎的还大，不曉得主子了，老子非治他一下不可！”

我当时苦苦向他求情，他也不答应。布火一句話也不說，被他們拉进牛圈里，綁住两只脚倒吊起来。他不住的掙扎，汗水象雨滴一般的落下。……

“色坡，他不敢了，請你饒饒他。”我望着布火，心里疼得要命，眼泪不觉也滾出来了。我恨不得一口咬死賈巴烏可；可是，娃子咋个能碰一下黑彝？我只得着急的向他哀求。

这个一点心肝也沒有的奴隶主，哪里管我的哀求，他被我纏得有些討厭，便把我拉出牛圈，关起門来。我靠在牛圈墙上，只听到牛圈里响起一陣嗚嗚的皮鞭声，和布火痛苦的掙扎声，我不觉打了一个冷噤，两脚站也站不稳，一跤栽倒在地上。

那可怕的皮鞭不知抽去了布火身上的多少血肉；皮鞭声响一下，我的心跳一下。我的泪水已把衣裳淋湿了，硬骨头的布火却不向奴隶主討饒。奴隶主看他这样强硬，把他的衣服剥去，抬进一簍松香来，用明子将松香燒化，松香象滾油一般滴在他的背上。哎哟，他的背脊一下紅肿起来，象一个烤熟的巴巴一般；皮肤也燙烂了，露出一层鮮紅的肉，松香仍然不停的滴下去。硬骨头的布火咬住

牙根，还是不向奴隶主討饒。

“你曉得主子，曉不得主子？”

布火一句回答也沒有，他快要气炸了，我只听到他的喘气声，掙扎声。这时，我想：你是什么主子？你不过是一只吃人的豹子，你吃了多少娃子，連骨头也不剩一根，你还要再吃我的布火。我生气的站了起来，想冲进牛圈里去，刚刚站起，眼睛一黑，便昏了过去。……

布火被吊了两天，只差一口气就要死了，奴隶主不願意让他白白死去，把他放了出来。我的天，才不过两天，布火已經被折磨得不象个人了——他的两只眼睛凹了下去，两个顴骨凸得很高，臉皮黃得象蜡一般；身上尽是一条条的鞭痕，一个背脊烂得叫人不忍心看。孩子們一見非常害怕，赶忙縮着头躲一边。

“我叫你跑，你为甚么不跑？你看看，还象个人？”我哭着对他抱怨。

“我舍不得孩子，舍不得你……”布火躺在地上有气无力的說。

布火的心，我知道。他实在舍不得孩子和我。但奴隶主这样毒辣，怎么生活下去？

布火的伤慢慢的好了后，他跟我悄悄的商量逃走。我說，这几个小孩怎么带走？他想不出主意来，便下决心带着大儿子衣海先走，并答应以后想办法来接我們。我舍不得他父子二人走，但想到他們逃出去才是一条生路，便忍

着挖心割肝般的难过，讓他們赶紧走。

那天晚上，我睡也睡不着；布火同衣海睡在一起，也在翻来复去。村子里的狗一会在叫，一会又静了下去。布火怕奴隶主沒有睡，不敢起去。直挨到鸡叫，才背着衣海轻轻的开脱门，闪了出去。我明白他走了，也許从此一去不来了，我对他不敢說一句話，眼泪只是不停的淌。……

布火背着衣海走了后，賈巴烏可知道了，派人到处去找。我为他們父子二人担心得饭也吃不下去，水也不想喝，一天心惊胆战的。要是被找回来，他們父子二人一定是沒有活下去的指望了！幸得天菩薩保佑，賈巴烏可沒有把他們找到。可是，从此他对我们一家人管得很严，我們走远一步，他也不准。

日子慢騰騰的过了一年，我多少次在梦里見到布火和衣海呵！仿佛他們还在家里烤火，有时在山上砍柴，有时在山地上为奴隶主干活，一切就象过去一般。我睁开眼睛，不見他們，心里又难过得很！他們到底跑到哪里去？日子过得好不好？

一天，我正在焦急，忽然，村子里的人跑来对我說：布火和衣海被馬海家抓到了！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布火領着衣海跑到永胜县的金官鎮（一个汉族聚居区）住了一年多，当帮工过日子，还可以馬馬虎虎的混下去。想到我們在这里受苦，父

子二人又跑了回来，躲在村子对面的那些老林里，天天在望我們，想把我們接到金官鎮去。誰知馬海家这家奴隶主到老林里去打兔子，布火和衣海就被他家看到了，他家搜去了他們身上的東西，還把他們捆起拉回去，然後帶信給賈巴烏可，叫賈巴烏可拿銀子去贖。賈巴烏可回信說：“我家的娃子象麻雀一般飛出去，你家拿住，儘管打死好了，我不怪你們！”我听了這些消息，站也站不穩，身子一晃，差点就昏死過去。唉，布火呵，布火，你跑出去了為甚麼又回來找死？涼山到處都有吃人的奴隶主，你提防了賈巴家，為甚麼不提防馬海家？這次不單你遭殃，連年輕輕的衣海也沒好結果了！

我的眼泪不停的只是往下流。突然，馬海家帶信來給我：他家不願意打死布火和衣海，叫我拿銀子去贖。我絕望的心里又有一線希望，只要可以贖，我不管死活一定要去贖他們父子二人。我連忙到亲戚朋友家里去張羅銀子、牲口。跑了几天，算是湊合得了六個銀子，十七只羊，一口豬。馬海家已答應讓我去贖。這時，我想到那只吃人的豹子——賈巴烏可，我把人贖回來，他是不是會將他們打死？我不得不去問問他。

“阿葛，你贖回來，我不打他們，仍然讓他們替我干活，你放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賈巴烏可今天表現得很仁慈，一點也沒有平常的那凶惡樣子。

我不放心，對他請求道：

“色坡，你說，你不打他們，你可不可以打一只鸡，賭个咒？”

“有啥子不可？你拿鸡来！”他說着，伸出一只大手向我要鸡。

我即回家捉了一只鸡給他，他拿出菜刀用刀背在鸡脑壳上狠狠的砍了一下，那只鸡猛然掙了一掙，便垂下脑壳。

“天菩薩，地菩薩，我不打我的娃子布火和衣海，如果我打着，給我就象这只鸡一样的死……”

他的咒賭完，我放心了。就帶着銀子，趕着羊和豬到馬海家去贖布火和衣海。

馬海家沒有刁難，解开了緊緊的勒在布火和衣海身上的繩子，讓他們同我轉回家。他們走路也不会走，由我扶着走。幾個孩子見了他們的阿達和哥哥，喜歡得眼淚也流出來了。誰料這時賈巴烏可起了黑心，不管他賭過的咒，領着兩個狗腿子，一脚踢開我家的門，拉起他父子二人走出去。

“色坡，你不是答應過不打他們，怎麼又？——”我惶惶的質問他。

他板着臉，一声不吭，將布火和衣海拉到曠地上，抱起一個個石頭來砸他們，那樣子好象瘋了一般。那兩個狗腿子也動手幫着打，一眨眼，布火和衣海父子二人被打得頭破血流，身上穿的那套破衣服也被血染紅了。我趕

忙跑过去救他們，我的身上也挨了几个石头。我不顾一切扑在布火的身上，那两个狗腿子把我拉开，无情的石头仍象雨一般的向他們父子二人的身上砸下去。

这时，村子里有不少的百姓和娃子跑来看，有的人看了直叹气，有的人看了在淌眼泪。但誰敢劝一劝賈巴烏可？天哪，奴隶主要打死人就打死人，世間还有什么王法？天菩薩，地菩薩，你們为什么不让賈巴烏死？看来你們也护着奴隶主了。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坐在地上只是哭。

奴隶主打了一陣，大概打乏了，他們回去休息了。我走过去一看，只見布火滿身是血，閉了眼睛，直挺挺的躺着。衣海睡在地上手脚还在动。我赶紧把衣海背回去，然后走出来坐在布火的身边，我想他昏过去了，不忍心叫他，免得他醒来身上的那些伤太疼痛。不想，一个邻人走来摸了摸他的手脚，对我說道：

“大嫂，他已經死了，你还守着他干什么？赶快抬开燒了吧！”

“不，他还会活轉来的，他身上的伤太疼了，让他靜靜的睡一睡。”

“他的手脚已冷了，嘴里一点气也沒有，怎么还会活？大嫂，不会有希望头了！你沒有人帮忙，我帮你把他抬出村子去！”

我摸一摸布火的手脚，真的已冰冷了。我忍不住放

声哭了起来。两个邻人把他抬到村子外边，准备第二天背柴去燒。到了第二天，誰知布火又活轉来了。賈巴烏可还不饒他，派狗腿子又来将布火拉进牛圈里。

他們怎么泡炙他，我不知道。过了一天，他們把他从牛圈里拉出来，只見他只有出的气沒有进的气了，他睜开眼睛望了望那几个孩子，吃力的喘着气說道：

“我……不……行……了！你們……为我……报仇！”

說完，他就閉起眼睛，一动也不动了。尽孩子們哭喊，他也不再睜开眼睛，他帶着滿腔憤怒，帶着一身痛苦，离开那个可怕的世界，离开那些吃人的奴隶主了！

一九五六年，小涼山解放娃子时，那些吃人的奴隶主不願意娃子解放，反对改革，去当土匪。我的大儿子就去当民兵，后来又当解放军，天天爬高山，钻老林，打土匪，立了三等功，升为副排长。土匪消灭后，我的二儿子补海到丽江民族干訓班学习，毕业回来当了大瓜坪农場場長。他的媳妇是他的同学（两人自由对象結婚），当了农場的畜牧員。三儿子克海，在解放军里当副班长。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二媳妇是青年团员，現在我們一家人靠着共产党毛主席，过上好日子了，只是我的布火，他沒有等到这一天……

永远跟着党

傈僳族 克 坡

我是穷苦人家的娃娃，七岁多就死了阿媽、阿爹。我做过領主家的长工，受的苦九天九夜也訴不完。現在，先嚙嚙被头人飄者赶到荒山老林的那一段生活。

那是二十七、八年以前的事了。六月間，南糯山到处闊粮荒，两块半开（解放前云南省自制的一种銀币，两个“半开”相当于一块大洋），还买不到一斤谷子。沒有飯吃的人太多了，房子周圍和寨子附近的多衣果、芭蕉根、苦竹笋等就摘光了！娃娃他爹砍了一挑柴，好容易到車里街換到了几包包谷，整天哭着要吃飯的三个娃娃喜欢得象小鹿子儿一样，一个搶了一包就跑到火塘边燒着吃。

正当一家人吃着包谷的时候，头人飄者来了。

“这个月你們家的門戶錢是三块，和上个月的加在一起是六块，快送来！”

我小声地哀求他：“实在沒有办法呀。再緩几天吧！”飄者朝天看了一眼，接着对娃娃他爹說：“好吧，我先替你們垫出来，两个月后还我！”說完，就走了。

怪啦，飄者的良心为什么变好起来呢？我們的心象棉竹的根根，任撬也撬不通。我着急地对娃娃他爹說：“盐巴也不用吃啦！快把这几块錢还了，省得惹出禍来。”

“你說得对，”娃娃他爹也很願意这样做，“豹子对小鸡是不会怜憫的，應該还清。”可是那时候，积一块半开比摘一颗星星还难，两个月过去了，我們也找不到一块半开。

到了日期，飄者一搖一摆地来了，他气汹汹地說：“你們欠我的債今天合五十元，快还！还不清就給我帮工去！”他又到房后抱了我們的一口猪就象黑云一样飘走了！

“从今再也不养猪啦，养了几个都着豹子吃掉！”我气愤极了，几下就把猪厩推倒。

娃娃他爹是个老老实实的茶奴，他不吭气，把还没吃完的一包包谷放在門板上，就低着头往外走。

“你要去哪里？”

他气鼓鼓地回答說：“剛才飄者的臉色你沒有看見嗎？不去帮他們做工，那还得了！”

从这一天起，娃娃他爹就成了飄者家的长工，整天苦到晚，身体象干树枝一样瘦。一連帮了三年，才算把这冤枉債还清。

这个时期，我們的孩子已經有好大了，但个个都光着屁股，在火塘边滾来滾去。最小的那个，还不滿一岁，还吃着奶，只得放在籬筐里背着上山去做活。今天雨淋，明天日晒，生病了，一天只是哭，奶也不吃，水也不喝。当时

哪里請得起医生，娃娃就这样病死了！剛把这个娃娃安葬好，他姐姐又抖得象一只小猫。脑門头比露水还冷，嘴皮也变成了紫瓜皮。我連忙喊她爹：“娃娃又生病啦！”他爹两天沒有睡觉，已經一点精力也沒有了。他是很爱这个娃娃的，但他沒办法，只是呆呆坐着。我急了，对他說：“坐着做哪样，快去請师娘来！”他去請来了，送了鬼，娃娃的病仍然不好，愈来愈重，喘气都有些困难。我急昏了，抱起娃娃喊天喊地：“大爹啊，救救我的娃娃！大媽啊，救救我的娃娃！”象在荒山野林一样，叫死叫活也沒人答应，当天晚上，这个娃娃又死了！

我一連死了两个娃娃，眼睛哭肿了。寨里的人都怕碰着鬼，不敢跟我們說話。我們认为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总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从来不敢得罪人。

我們想躲开灾难，灾难却硬要来找我們。到年底，飄者又来要款了，他說車里土司来人啦，要收錢收粮，你家摊着十二块花錢，十挑谷子。这多的錢哪来呢，就是把我們全家的东西卖完了也不够。我只得又象以前一样哀求他：“緩几个月吧！我家剛抱了一窝小鸡，等长大了拿到街上卖了就給。”他說：“誰等得你的小鸡长大！先拿母鸡去！”我再求也沒用，他闖过房去捉鸡，把小鸡打得四处乱飞。这时娃娃他爹剛巧从地里回来，他不知道捉鸡的是头人飊者，很生气地喊：“咋个把小鸡打得滿屋乱飞！”飊者听见有人喊，走出門来，冷冷地說：“叫什么！一只鸡值

几块錢？”把鸡往房里一丢，走了。

第二天，飄者領着各寨的头人，提着刀，拿着绳子，把我們家圍住，硬說我們反抗土司，把我們的破鍋土碗、背水竹筒和其他家具打得七零八碎的，房子也拆毀了，捏着刀枪把我們趕出了寨子。

我背着娃娃，娃娃他爹挑着破烂的家具，就这样离开了半坡寨；娃娃又哭，烏鵲又叫，路上真是慘透了！我們走到挨近車里的大山上，搭了一間棚子住下來。沒有吃的，也沒有穿的和蓋的；白天我們去找野菜，晚上就圍着火塘邊叹氣。后来，我們開了一塊山地，又割了些茅草重新修了棚子，长期在山上安家。我丈夫常常到車里去帮工，換几件人家穿破的旧衣服回來。

一家人孤孤单单地在山上住是不好受的，太阳一落，除了虫叫，靜得怕人。天還沒黑，老虎、豹子就在四周嚎叫，吓得娃娃縮成一团。我們又沒有火枪，无法赶走这些野兽，只有整夜燒着火，用火來防老虎。要是沒有火啊，我們一家人早就被老虎吃掉了！到了雨水天，風又大，雨又多，生活更加困难。有一次一連刮了几天大風，把我們棚子上的茅草吹走了，又是下大雨，大人小娃淋得象落水的鸡，蹲在火塘邊還冷得發抖。娃娃緊緊抱着我說：“阿媽，回寨子去吧，這裡又黑又冷，多害怕啊！”我也跟娃娃一樣，常常想到回寨子，但只要想到头人來催款，我又寧願在山上淋雨了。我對娃娃說：“我們沒有錢給头人，不

能回寨子啊，明年叫阿爹去捉个野鸡来，你就有伴了。”

就这样，我們在山上住了五年。我又生了一个孩子，这当然又增加了很大困难，娃娃他爹在瓢者家当长工时，就患了心口疼的病，这几年在山上淋雨、踏露水，病越发加重了。我常常对他說：“少做些活啦，找些野菜吃些日子，身体好些再做。”他哪里忍心让孩子挨餓，隔不上几天就去車里帮工，換几斤米来煮稀飯。这样，他的病更重了。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一連去了四天，背回两斤糯米，一到家就躺在地上，身子热得象一团火。我把他带回来的米煮了一点稀飯去喂他，他一口也吃不下，第二天就死去了。

他死了，我哭得昏死过去，哪有力气安葬啊！幸得对門山上也有一家被地主赶出来的僂伲族，他們聽見我整天整夜地痛哭，連忙赶来看，才帮我把尸首埋到山后去。

沒有男人，单我們母子三个住在山上是沒法过日子的，不是冷死也要餓死，于是我又領着娃娃回到半坡寨。五年的大風大雨，又死了娃娃和丈夫，这些灾难把我折磨得不象人样了。可是，一回到寨子，头人又來要款了，他們把我的破鍋烂碗打得粉碎，我沒有办法，任他們打，我也在寨邊蓋了一間小棚子住下来。沒有鍋了，只能用竹筒煮野菜吃。

过了几个月，我七岁的那个小男孩又病了，我跑了几个寨子都借不来一碗米，孩子病的很瘦，臉象干菜一样黃，整天都在小声叫喊：“阿媽，我想吃飯！”他叫一声，我的心

就象給針刺了一下。实在沒有办法了，有一天，我向最小那个孩子說：“好好看着阿哥，別出去乱走，阿媽去一下就回来。”娃娃很听話，靜靜地坐着。我离开寨，一口气跑到車里，恰巧那里的傣族正在栽秧，我給他們栽了半天，他們給我一斤米。我高兴极了，回家时，一路上心想：“吃了这点飯，孩子一定会好起来啦！”我飞一样走着，在离寨子只有几百步的时候，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哭得很悲惨；我站住仔細一听，有点象我娃娃的声音，慌忙向家里跑去。进家时，天呀，我的孩子已經死了，他妹妹在旁边哭着。

我把儿子安葬后，本想去寻死，但我沒有死。我决心要把剩下的一个女儿养大，看看穷人的痛苦有沒有尽头。

等啊，等啊，从早上盼到黃昏，从黃昏又盼到天亮，終于盼来了共产党和毛主席。从此，穷人的痛苦結束了！毛主席派来了工作队，帮助我們发展生产。头人飄者見换了天地，当面再也不敢打人，暗地里却又在搗鬼，說共产党的坏話，有一天他对我說：“克坡，你們不要听工作队的話，他們在不长久；汉人靠不得；只有僂伲人靠僂伲人。”我不理他，因为我知道飄者是不会可怜穷人的。但我也不敢挨近工作队，怕他們走后，头人飄者又把我赶出寨子。后来，我看見工作队的同志天天都帮我們鋤茶园，不象要走的样子，心也就更亮了。有一天，一个年輕的工作同志到我家来玩，还送我一把鋤头：“拿去鋤茶地去吧，共产党要帮助僂伲人发展生产，过好生活。”我回答說：“不鋤了，

鋤了头人也不給采。”他笑了笑又說：“鋤去吧。将来所有的茶树都会是人民的！”我很奇怪，难道真的会这样嗎？几十年来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丘稻田，有一块茶地啊！

在毛主席的光輝照耀下，好日子終于來到了，一九五六年自治州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宣布了土改的法令！土地和茶园真的要回家了！

土改刚刚开始，飄者就悄悄地到我家來，“克坡，过去的事已过去啦，你欠我的債我也不要啦，共产党讲團結，我們要一个顧一个些。”他想拉住我的脚，不让我参加大家的活动。但是，解放前的痛苦已使我深深曉得了这个坏蛋的心。他的話反使我記起了以前的仇恨。我在会上痛痛快快地控訴了过去飄者对我家的压迫、剝削，以及把我們赶到山上的罪恶。人們憤怒极了，他們大声地問飄者：“这些罪恶是不是事实！”“是，是，”飄者低头承认。当时，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們的苦根，共产党給挖掉了；我們头上的石头，共产党給掀走了！头上的大石板掀掉后，我好象更年輕起来了，我一个妇人家也敢參加站崗放哨、斗争違法的地主。在党的領導下，土改終于胜利了，我們分得了茶园、田地，大家还給我蓋了一間竹樓！我过去痛苦的日子和我們的眼泪一起淌走了。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沒有党，我們全家人一定都死光了。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傣族岩峰記錄

老貧農的話

覺 非

在新疆喀什市郊区的一排綠楊掩映下的水渠边上，我遇到了一位放水的維吾爾族老漢，他就是色滿区的人民委員、夏瑪里巴克公社前途大队的大队委员、老貧农阿不拉·伊明。他一边放着水，一边跟我讲了一席話，使我很受感动，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而又生动的阶级教育，使我更加明确了應該怎样去爱，怎样去恨和怎样的去工作。現在，我把他讲的这一席話，都原原本本地記述下来，以便使更多的讀者也能从里面得到一些裨益：

你是从北京来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可好呵？

去年，有个作家来，我說請他給毛主席帶点瓜果去，以后他到別处去了，沒有帶成。

一九五八年朱德委员長到我們这儿来，我見到了。我这一輩子，还有一件感到不足的事，就是沒有見到过毛主席。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們穷人哪能翻身、哪能有今天这样的好生活？

我常跟孩子們讲，別生活在福中就忘了过去的苦，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要知道，那些反动派，巴依

(地主、老財) 們是仇恨咱們的公社，仇恨咱們的社會主義，仇恨咱們翻身人民的。咱們挖掉了他們剝削人、壓迫人的老根，分回了他們剝削咱們的血汗蓋的房子和土地，又眼看着咱們一天天過上了好生活，不愁吃，不愁穿，年年還有富余，社會主義和人民公社也越來越鞏固了，你說，他們能甘心嗎？

他們不會甘心的。所以，不光咱們要好好的干，不能放鬆警惕，也得教育子孫后代別忘了本，別放鬆警惕。

現在的孩子們都是生在福窩子里，沒有受過舊社會的苦，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高興了就唱，不如意時還要跟你鬧別扭，任啥不懂。這樣下去，怎能做紅色接班人呢？

去年，我那大孩子初中毕了业，我就讓他回公社來勞動了。不讓他們磨練磨練，他們又怎能体会到咱劳动人民的甘苦？其實，這算啥苦，比起我過去強上萬倍了！

過去，我小的時候……唉！一提起過去，我就忍不住要掉眼泪。

我家几代都是當長工的，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房子、地，都是住在巴依家的草棚子里。

上几代的光景，我就不大清楚了。我爹是因為我爺欠了巴依家的債，从小抵給巴依當長工，直到有了我們還在當長工。那時候，我爹當長工，我媽給巴依家里打雜、烤饢(一種烤餅)，可是我們却沒有飯吃。從我記事起，就

跟我媽到外村去討飯。我長到八九歲，沒有穿過一件衣服、一双鞋，沒有吃過一块白面饢。到我十二歲那年，我爹感到日子实在不好過，就想佃種阿迪爾·瓦依提巴依家十畝沙碱地。可是巴依硬要每畝地十二稱子小麦（一稱子合二十市斤）。我爹咬了咬牙答應下來，尋思：萬一趕上個好年景，不就可以剩把麸皮吃嗎！巴依把卡孜（法官）找來，叫他作證給立了契，我爹給人家按了手印，這就算講定了。

那一年，我領着弟弟妹妹在大道上，追着駱屁股拾了九個月的糞，一家人沒日沒夜地忙了整整一年，到麥收的時候一打場，除去六稱子稅，顆粒麥子都被巴依拉走，連麥秆都折合上，還淨欠了他十二稱麥子。阿迪爾·瓦依提硬逼着我們當場就得把糧食交清了。卡孜也拍着契紙說：“契上寫的多少，你就得交多少！”

我爹說：“連麥秆都給了你們，我還到哪兒去找糧食去？”

阿迪爾·瓦依提一把把我爹的祫衿領子揪住，掄起棒子就毒打了一頓。我爹難過地哭了一場，想想還是沒辦法，就丟下我們逃跑了。

我爹一跑，巴依就要抓我去抵債。我思忖着：我要是去抵債，家里還剩我媽和弟妹五口，他們怎麼活命呢？我也就拔腿跑了。

那年月，哪兒有我們窮人的出路？天下老鴉一般黑。我信步跑到天黑，到了牙魯古孜卡別勒村，坐在一家門

口。当时我肚子又餓，心里又难过。想一想跑是跑出来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个巴依——就是阿吉·阿洪。他說：“你是逃荒的？”

我說：“是。”

他把我拉起来，上下打量了一会，說：“你就在我这儿干吧，一年我給你四百斤玉米。”

在那个时候，我不干也得干了，家里还有五口人等着吃呢。

跟他說好，先借給我二百斤，剩下的一半到明年秋收才給。我把这二百斤粮食偷偷送回家去，跟我媽說：“这是一年的粮食，家里就湊合着吃吧。”

你想，二百斤粮食，娘儿五个吃，能吃得了一年嗎？我媽討着飯，再采些树叶野菜，总算对付了半年。以后，餓得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去找我。我只好硬着头皮一称子一称子地向巴依借。有一回，我媽又来了。阿吉·阿洪說：“你脖子上已經馱了我这么多債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說：“你就从我下余的那二百斤里面扣吧！”

沒想到，这个黑了心的巴依，他把牛眼珠子一瞪：“你这个穷鬼，我什么时候拖欠过你二百斤粮食？以后，干一年給二百斤粮食，爱干不干，不干就还我的債！”

我真恨不得上去打他两个耳光子，可是又一想：“我打了他，使啥还他的債呢？”只好忍了口气，含着眼泪跟他立了契。誰知，这就是我的卖身契。从此，就象在我的脖

子上鎖了一條鎖鏈，年年向他借糧，年年減我工錢；一年套一年，一直給他干了十八年。

這十八年，我怎麼過來的呢？

我住的是他家的馬圈，吃的是麸皮饢，而且是一天才給半斤。他家的麸皮饢，是一個月才叫人烤一次，等發到我們長工手里，干硬的象石头，我們咬不動，只好用石头砸着吃。半斤麸皮饢，放在我們肚子里，你說能吃得飽嗎？一天餓得人眼发藍。我們實在挺不住，看着沒有人的時候，跟狗搶把食吃。

你猜巴依怎麼說？他說：“這些窮鬼，就不能給他們吃飽，吃飽了肚子就不聽話了。”他把我們看得比狗還不如。養狗他還得喂飽它肚子哩。

我們三個長工，給他種着三百五十畝地，十五畝果菜園子，還經營着六匹馬、十七頭牛、十條駝、七十來只羊，外加給他家里挑水、劈柴、打雜。天天是頂着星星起，披着星星睡，夜里還得起來挑六七趟水飲牲口。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個假也沒放过節。一天由早干到晚，他還常提着根鞭子監督着你；一不順心，不是打便是罵。一年之中，我們挨他的打，數都數不過數來。

現在不是有人說，“那時節，你們不會跑嗎？”

我的天！那社會，我上哪兒跑呢？我從阿迪爾·瓦依提家里跑到阿吉·阿洪家里，还不是由屎窩掉進了尿窩？況且哪兒都是人家的天下。阿吉·阿洪告訴拜格（偽保

長)、百戶長、十戶長說：“出了我的地界以外，你們見到我的長工就狠狠地打，打完了給我綁回來。”

在這十八年裏面，我逃跑過三次，三次都是被人家打完又綁回來了。最後一次，那是我三十歲那一年。有一天夜裏發洪水，把巴依的菜園子淹了。他心疼他的菜，一肚子的氣惱沒處出，就把我給叫去了。進了屋，他把門鎖上，拿起鞭子把我毒打了一頓。渾身上下把我打的沒有一處好地方了。我心想：“照這樣混下去，什麼時候是個出頭之日呢？”我又逃跑了。這次，我是向着疏附縣城（今喀什市）跑的。可是，沒等我进城，就被巴依騎着馬追上了。他又把我抽打了一頓，然後拴在馬屁股後邊拖回來了。他用鞭子指着我說：“窮鬼，你想往哪兒跑？哪兒都是我們的天下。你飛上天，我拖着腿把你拉下來；你钻入地，我揪着毛蓋子（头发）把你拔出來。”最後他把我交給了拜格，說：“他不是想往城里跑嗎，那就把他交給城里衙門修城牆去！”

國民兵押着我們修城牆，只干活不給飯吃。我因為是綁着送來的，沒有人給我送飯。一起修城牆的，都是窮苦人，即便有的有人給送飯，也是吃不飽。大家分給我一點吃，也抵不住餓。我氣極了，就問國民兵，“巴依把我送來修城牆不給飯，你們又押着不放，你是他家的狗？餓死人怎麼辦？”

他舉起槍托把我打了一個滾，罵道：“你們這些牲口，

餓死幾個算啥？死几百也就是填一個坑子！”

過去，有人說漢族來壓迫我們。其實，那是胡說。你看，這不明明是巴依、卡孜、拜格和國民黨連成一氣，來壓迫咱們窮人嗎！

我們修了二十八天的城牆。等城牆修好了我也不成人樣子了。同伴們把我扶出來，他們給我媽捎了个信，才把我接回去。一病就是一個多月。

病好了以後，到了四月間，家里一顆糧食都沒有。這時候，一個叫卡迪的巴依，讓我給他干十五天活，給我四十斤玉米。當我給他干到十五天頭上，他反悔了。一定得叫我給他干一個月，不然，就得還他那四十斤糧食。我說：“咱們講好的是干半個月，要再干十五天，你還得再給我四十斤玉米。”

他擡起那把山羊胡子，想了想說：“算了吧！你就再給我看一天苜蓿。”

我心想：“咱一個庄稼人，出把子力，少生點氣，給他多干一天算了。”誰料想他這是一個圈套呵！

第二天清早，剛吃过飯，他就拿着根繩子來了，先在地里轉了一圈，眨了眨眼睛說：“哎呀，我這苜蓿丟了！”

我說：“這哪有的事！你看，整整齐齊，一點也沒有丟。”

他忽然把臉一變，嚷道：“你這賊娃子，明明偷了我的苜蓿，還說沒有丟？”說着就把我倒背着手綁起來，吊在一

棵树上就走了。

把我痛的呵，晕过去又醒过来，醒过来再晕过去，一直到傍黑的时候，托合特、烏斯滿他們从地里回来路过看見，才用砍土鏟（鋤头）把绳子砍断把我放下来。他一看，我这两只胳膊肿的，把绳子都給包在里面了，他就哭起来了：“巴依太欺負人了，几时咱們穷人才能报这个仇呵！”

司馬意·西拉木大爷气愤地指着年輕人說：“你們都来看看，巴依就是这样压迫咱們的。我們这辈子报不了仇，将来你們也要記住报仇。”

他們把我背回家，我媽一定要扶着我去找拜格告狀。那个时代，拜格和巴依是穿一条褲子的，哪兒有我們讲理的地方？

拜格听了，不問青紅皂白，硬說我們是說謊，拿了巴依四十斤糧食还偷人家的苜蓿，吩咐狗腿子就打。我忍着痛起来就跑掉了。可是，他們把我媽給抓住了，让她赔巴依苜蓿。我媽說：“我儿子給他苦了十五天，还不够嗎？”

拜格吓唬說：“你再說就打死你！有錢就賠，沒有錢就扒你的衣服！”

状沒有告成，挨了吊、挨了打，我媽的衣服还被扒去了。

我恨的起了誓：从此，再不登巴依們的地邊。

那时候，我已經結了婚。我岳母在烏魯木齊。我老

婆給她捎了个信，叫她想神法也得給我們捎点錢来。后来果真把錢給捎來了。我們买了几只羊，也搬到一个穷乡亲賽买提·克里木家里去住了。我老婆放着羊，我給人家帮帮工，慢慢地竟发展到了十五只羊，眼看着日子也就能湊合着过了。这回，总該可以躲的开那些巴依們了吧？嘿，不行！你躲他，他不躲你。

有一天，吐迪巴依——就是把我爹被逼跑了的那个阿迪尔·瓦依提的女婿，派人来找我五次，說是他們巴依“請”我。我心里捉摸：“狼披上羊皮还是狼。他請我，能有好事嗎？”我不去。后来，他自己来了。我說：“我不欠你的糧，不欠你的錢，找我干啥？”

他嘻皮笑臉地說：“哎！別誤会。以前咱們挺好嘛，走，到我家里去坐坐。”

他連拉帶扯地把我推到他家里。进屋一看，拜格、百戶長、十戶長、卡孜都在那儿，抓饭也早摆好了，看样子是专等着我开飯哩。我一看这架勢，是一定有事呵。炕我也沒有上，就說了：“你們找我有啥事，就干脆說吧！”

拜格嘿嘿地笑着拿出了一張紙，他們給我念了念——那是用我的名义写的，大体的意思是：我願租种吐迪巴依十二亩果园（只有几棵沙枣树，都是沙碱地），議定年終交二十口袋、即四千斤小麦，如交不出，情願受法律制裁。我一听，就火了。这不是成心想要我那十五只羊嗎？我說：“我起过誓，再不登你們巴依家的地邊。”說

完我甩袖子就走了。

唉！胳膊終究擰不过大腿去。三天以后，拜格还是硬逼着我接受下来了。那时候早已經過了播种的季节，我只好强种上了晚玉米。但到秋收的时节，玉米沒有熟，我交不起租子。于是，巴依带着狗腿子，杀气腾腾地赶到我家，把我那十五只羊搶去了不算，把我的东西全扔出屋，临走还把我那四岁的孩子从炕上拎着一条腿摔到街上。我跑出去抱起孩子一看，脑袋已經摔出了血。我憤恨地說：“事情不要做絕，以后也許有我們說話的时候！”

可怜我那孩子，几天以后就死了！

那个社会，就是个吃人的社会。为了錢，啥喪尽天良的事他們都干得出。穷人好比掉进了油鍋里，任他們煎油、吸髓。可是呵，他們万沒有想到，他們的口头也有落的时候。

以后共产党、解放军就真的来了。我們的太阳升起来了，我們穷人說話的时候真到了。把我高兴的，簡直就想唱、想跳。后来工作組到了苦木台，我跑去跟他們說：“你們可來啦！我向你們道一万声謝謝。我什麼都不要，只要讓我跟你干就行！”当时有个伍部长，他說：“老大爷，你就帮我們工作吧！”

到开群众大会的时候，过去那些巴依、拜格、百戶長、十戶長……都在路上等着我，跟我悄悄地說：“过去你說的話真灵驗了。以前怪我們无知，叫你受了苦，別記我

們……”我一眼也沒有看他們，揚長就去開會。我心裏那個痛快呵，就別提了。感到揚眉吐氣！

土改把那些反動派、巴依都打倒了，給咱們窮人弟兄報了大仇。

後來，工作組在苦木台給我分回了六亩地、兩間房子。我說：“我有言在先，啥也不要。只要看着咱們窮人翻了身，我就高興。”可是那個伍長，最後背着我在色滿還是給我分了。他說：“這是在黨的領導下咱們農民進行土地改革鬥爭的勝利果實，你就收下吧！以後好好搞生產，把咱新中國建設好就對啦！”

我一想，“這話也對。這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嘛！”

到搬家的時候，他們都敲鑼打鼓來接我們。這時我老婆激動得哭起來了。

我說，“這是咱們窮人的大喜事，哭啥呢？走！”我們就這樣高高兴興地搬進了新房子。

到一九五六年，合作社修水渠，正好挨到我那房子。他們跟我商量，我說：“行！這本來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才分得的，用在咱們社會主義建設上還能不行？”

他們說：“也不能讓你白交出來，給你一千塊錢，你再去蓋兩間。”

我一聽，吓了一大跳。怎麼一張口就給一千塊？我說：“不用浪費，有二百塊錢就足夠了。”

以后有人在背后跟我說：“你怎么这样傻？你把一千块錢要下来，不会留以后花！”

你說，我这是傻？公家的錢，不就是咱們自己的錢嘛！好比我放的这水，大渠里有了水，小渠里才能常滿；社会主义要建設不成，你个人有几个錢也是沒用；如果跌回到旧社会的道上去，不是你剥削人，就是人家剥削你。我們不能再走那条道，決不能忘記过去！

現在，你看看，我們这人民公社建設的，……哎，你到村里看看，都是象我家一样的一色新房；除了口粮以外，一年拿个二百元左右的人家还算是平常的哩。我跟我儿子說：“你就照着共产党、毛主席指引的道走，把咱們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設得好好的！”

春風吹拂換人間

华罗庚

我非常愛听侯宝林同志說的相声《昨天》。它描写了一个在旧社会中受尽折磨、失去知觉的精神病患者，經過治疗，在解放后十年突然醒来，旧社会的一切惨况犹如昨日；在接触到新事物时，觉得样样好——好到了不可思議，件件奇——奇到了出人意料。实际讲来，这种体会，在新中国，人皆有之；只不过我們看見的是連續变化的“电影”，而相声中的主人翁所看的是影片中两个分隔較久的“镜头”而已。

* * *

想到了四十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二十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住在两間小厢樓（還沒有現在我的办公室大）里，食于斯，寢于斯，讀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謂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盞，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搖，危樓欲倒，猪馬同圈，馬誤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則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

是清高教授。嗚呼！清則有之，清者清湯之清；而高則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

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读书，苦心钻研，偶有所得，便怡然自乐，自以为与世无争也！哪知却有那不辞道远，甘冒髒臭而来的朋友，說是非，讲长短，我辛苦研究的成果反而成为生气包。挑撥者不是說达人怎样鄙薄你的成果，便是說那人怎样譏諷你的研究。兴辞而去之后，留下憎恨，为之不欢者竟夕。老实說，我那时恨透了这种口是心非，当面捧，背后罵的知識分子。解放后才开始知道，应当詛咒的是旧社会，而不是个人。

正是：寄旅昆明日，金甌半缺时，狐虎滿街走，鷹鵰扑地飞。

* * *

把镜头移到四十年代的后半叶，到了美国。生活是有所改善了，但是社会关系却是道道地地的买卖关系。金錢第一，什么第二，我却說不上来。歧视黑人，固为人所共知，但黄人、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也都在被歧视之列。上舖子去买条褲子，店員拿出粗貨，当你請他拿細料的时候，他会悻悻然地对你說：你們黃人穿这种料子正合适，在洗衣作里耐磨經穿。是的，在他們心目中的黄人，不是洗衣作的佣工，就是中国饭鋪的厨师。这是美国恩賜給黄人們的两条活路。

人老珠黃不值錢，教授也不例外。老教授的下場也

是老境淒涼，拿些極為菲薄的退休金，出賣藏書，孤苦伶仃地度日。不要說學生，早如路人；就是儿女也不常來看你，如果你要去看他們，還得請帶飯錢來。師生關係當然也是買賣關係，入學就為將本求利而來的。現在說來可羞，我那時也在这染缸中掙扎，對學生，來者不拒，花上十分、二十分钟的時間，點他兩點，使他得些便宜，販些貨品而去；不來者，不追不逼，維持個“買賣不成仁義在”。對學生的成績更是好話多說，缺点少言，一來學生高興，二來也為自己爭光。

正是：資本制度已斜陽，走入昏黃，為了金洋，哪管親娘。

* * *

今天，我且不說人民生活的好轉，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最值得注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了：既不是封建主義式的從屬關係，又不是資本主義式的金錢關係，而真是一個互相關心、互相促進的平等關係。文人相輕自古已然，于今不確了，人與人之間相重起來了。當然，我說的相重，不是無原則的互相吹噓，而是開始以社會主義原則相互要求，相互鼓勵，肯定成績，指出缺點，實事求是，有啥說啥的風氣。去年我去廣州，就深得切磋琢磨之益，在學術會議上，講詞講稿一处不明，就大家提出討論，共同研究。

毛主席的“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名言，

“必須善于学习”的指示，都已深入人心，成为風尚。即以我这个从不虛心的粗人來說，也开始多方求教了！最令人感动的是：不管識与不識，同行与不同行，問无不答，求无不應，誨人不倦，有时还送貨上門，移樽就教呢！我受益了，当然感謝他們。而更感激的是党、是毛主席創造了这样的好条件，使人与人之間肯无保留地交流學問，比比以往“不談學問談天气，閑話他人是与非”的情况，其相距岂啻霄壤！

讲到学生，讲到年輕人，更是一番新气象。政治热情之高，学习勁头之足，固不必說，而且往往推着老師們前进。五年前，一年級的新生給我提了个終身受用不尽的意見，他們建議我：老师，你能不能再多讲些“怎样想出来的过程”。这个意見好。如果已有的发明創造，我們还能設想出他們所以能获得这发明創造的过程，我們还能有什么自己发明、自己創造的可能性呢？这一問題五年来一直貫穿在我的讲課之中，在我的学习之中。更具体的例子是：我对蒙脫卡罗方法的一知半解，就是在年轻人帮助之下学来的。真是“多年师生成兄弟，共同学习共钻研”，这样的例子是說不完的。同學們、青年們愈关心我，我的勁头也就愈高，愈想把所有的虽然很少的知識都又快又好地教給他們，这和“沒奈何教书为吃饭”，如果不留一手則“教会了徒弟，气（餓）死了师父”的旧社会比，其相去岂止十万八千里了！

劳动成果之被重视更不必说，今年出版有我劳动在内的有七卷书；这些书都是解放后开始写作的，这是我一生收获最丰富的一年。为中学生写了两本，为大学生写了两册，为搞数学及用数学的写了一卷，专门著作一部，连我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数学百科全书所写的一册都翻译出来了。这些成绩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有些是和青年们合作写的。更重要的是，我获得了几十个青年的帮助，其中包括其他院校同志的帮助，这样大的帮助是旧社会中能梦想得到的吗？不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组织的帮助能如此吗？不仅如此，组织上还经常地关心我鼓励我：写出来！拿出来！这增加了我的勇气，提高了我的工作积极性。出版社登门组稿，细心加工、排印、校对、发行，这都是旧社会不可能有的。回忆旧社会，写书时没人帮助。写好后没处出版，在辗转拜求出版的过程中，有时还搞了个原稿不知去向；出版后还说不定来个“文人相轻”，书不看，嘴一撇，讲上几句挖苦话。新社会情况大不相同了。解放后，我出版过几本书，写得当然很不好，但大家总是鼓励我，更宝贵的是收到了不少宝贵意见，从个别的错字，到论证的错误，都给我寄来。这种与人为善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使我更加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干劲更足，更想把一丝丝的力，一滴滴的汗都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 * *

真的，感受实在太多。如果把镜头更撥前些，看看二十年代，那正是我应当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風口，擦着清水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針地为了活命而掙扎，这怎能不羡慕生长在毛澤东时代的青年呢？

当然与工人农民的血泪史比起来，这是算不了什么的，这仅仅有些酸辛而已。但忆苦知甜，聞香識臭，使我自己知所奋发，使我自己更坚定地听党的話，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永远和青年人共同提高，为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学到老，干到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十四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国彻底变了样。在光明里想想黑暗，在春風里想想严冬，就更会对未来充满信心。現在还仅仅是开始，东方的太阳剛剛升起来，射出万丈光芒，照亮了我們的燦烂前程，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个乡村教师的遭遇

上海市青浦县赵屯人民公社
南勋小学教师 叶泮芹

我今年六十二岁，屈指一算，已經整整做了四十一年的乡村小学教师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深深感到：旧社会乡村教师的生活比黃連还苦，新社会乡村教师的生活比蜂蜜还甜。

我是在一九二二年从一所速成师范学校——青浦师范讲习所毕业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在所謂“国事日非”的年代，社会上有些人在高唱所謂“教育救国”的論調，反动統治当局也口口声声說什么要“普及义务教育”，而小学师资又很缺少。因此，刚从学校里毕业的时候，我滿以为找个乡村小学教师的职位是不成問題的；在学校当局把毕业生名单抄送给伪青浦县教育局之后，我就一直在家等候聘书。可是，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八月底，眼看人家都在忙着准备开学了，我还是沒有等着聘书。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慌了，就到老教师那里去打听。一打听，才知道聘书是不会自动送上門来的，得自己托人去說情；照我这样呆在家里等，一辈子也不会有人来聘請。

听了老教师的話，我心里非常气憤。可是，为了實現我那“挽救国运，复兴民族”的抱負，同时也为了要解决全家的吃飯問題，只得低声下氣地求人。后来总算找到一个介紹人，替我去向一个姓沈的伪“教育委員”說情。“礼”在“人情”在，說“情”是名，要“財礼”是实。但是，自从我的父兄相继去世以后，我家真是一貧如洗，全靠母亲替人家做針綫、洗衣服得到的几个錢过日子，哪里有錢送礼呢？还是母亲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指着家里仅有的那只会下蛋的老母鸡，說：“这样吧，就把这只鸡送掉吧。”我看这正在下蛋的母鸡，心里有些舍不得。可是，介紹人却說：“送礼要凑双，单单一只鸡，‘教育委員’怕不会收吧！”怎么，一只母鸡还不够？母亲听了，无可奈何地对我說：“好吧，王家嬪嬪已經答應借給我們三块銀洋，說妥等你領到第一次薪水就归还。我本来是打算替你买只面盆、买双套鞋的。既然要送礼，我就去借来先买点礼物再说吧。……”說着，她就出去借錢。等拿到錢，我就去买了四瓶高粱酒，连母鸡一起交給了介紹人。

旧社会真是“錢能通神”啊！四瓶高粱酒、一只老母鸡，終于換來了一張“苦缺”的聘書。事后介紹人說，这份“礼”太薄了，要不还可能弄到个“中缺”哩。什么叫“苦缺”、“中缺”呢？原来，当时伪青浦县教育局所轄各校，分三等。一等学校設在鎮上，学校大，学生多，學費收得齐；在这种学校里教书，算是“肥缺”。要弄到个“肥缺”，不但

要財礼多，而且要有靠山。二等学校虽然設在乡村里，但是村庄大，学生也还算多，学费也容易收得齐；在这种学校里教书，就叫做“中缺”。“中缺”也要有靠山，不过，財礼多送一点，沒有靠山也有可能得到。三等学校設在比較偏僻的乡村，規模小，学生少，学费也难收齐；在这种学校里教书，就是“苦缺”。沒有靠山，財礼又不丰富的，就只能到这种学校里去教书。“苦缺”虽然苦，但是，对我这个一无錢財、二无靠山的穷学生來說，当时能弄到这样一个职位，已經喜出望外了。我想，只要自己勤勤恳恳地教书，这只“飯碗”总能保牢的。再說，“教育救国”嘛，在偏僻的乡村教书，不也同样是“救国”嗎？

哪知道，这只“飯碗”并不牢靠，“教育救国”也只是反动統治阶级騙人的幌子。那时候，反动統治当局借办“义务教育”之名，在田賦上搜刮了一笔附加費。可是，这笔經費并没有真正花在办学校上，而是大部分进了官吏們的腰包。我初当小学教师的时候，月薪很低，每年只发十个月的薪，而且，发薪还没有定期。这还不算。那些伪“教育局长”、“督学”、“委員”們，每逢暑假、寒假，总要乘机把教师調动一下，撈一票財礼。因此，我們这些沒有靠山的穷教师，每逢假期，总是忧心忡忡，天天伸长头頸盼聘书；而你要得到聘书，还是多少得送点礼。我因为財礼送得少，从当小学教师起，八年內先后調了七个学校，最后調到現在的南助小学。由于这里位于昆山和青浦交界

的地方，离县城較远，交通也不方便，稍稍有点办法的人都不愿到这里来当教师，这样，我才得在这里耽下来。

穷教师最怕生病。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我在黃渡三官堂小学教书的时候，生了一場病，几乎送了命。起初，我得的是瘧疾，三天两头发冷发热。由于这个小学只有我一个教师，我就写了一封信給伪县教育局，請求他們派一个代課教师来代我上几天課。哪知道，这封信寄出后，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訊。我抱病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臥倒在一所孤廟里。看庙的老人虽然同情我，常常来給我一点湯水喝。可是，毛病不医，怎么会好呢？又拖了两个星期，病不但不見好，反而更重了，整天昏迷不醒，湯水不入。庙董——一个姓張的地主知道了，怕我死在庙里，要連累他，就叫看庙老人雇了一条小船，连夜送我回到青浦家里。母亲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突然見我病成这样，泪如雨下，接着就赶快去借錢請医生。

事真凑巧。在我离校的第二天，伪青浦县教育局的“教育委員”剛好到三官堂小学來“视察”；名說是來“视察”，实則想來敲搾。当时，我生病回家，学校里沒有人接待他，他扑了一个空，心中大为恼火。他要离校时，正好有群小学生来校。他就問起我，学生們說：先生生病，看庙老公公送他回家去了。这个“教育委員”回到局里，大发雷霆，随即叫人給我送来一張条子。条子上写着：“三官堂小学停課，着即請代前往复課，否則停職處分。”这时

我病得神志不清，母亲只得拿了条子叫人去看。她吓坏了，赶到局里去向伪“教育委员”恳求，說：“我們实在沒處請到代課先生，还是局里去請罢。”誰知他神气活現地說：“一个村角落里的小学，也要局里找代課先生，局里哪里来这許多代課先生？”經我母亲苦苦哀求，他才答应寬限一个星期，說一星期內必須有人去复課。天哪！叫我們到哪里去請代課先生？我的病又这样重，怎能去呢？我病了二十多天，病勢漸漸好轉，勉强能起床了。伪“教育委員”連連催逼，不得已，我只得抱病返校复課。病后头晕眼花，瘦得皮包骨头。人家都說应当休养調理。我拿什么來調理呢？六十开外的老母亲，为了替我付医药費，把自己的棉衣送进了“长生庫”（当鋪）。这时已是十月天气，我母亲的寒衣还没法贖回来。而且，我又受到伪教育局“申斥罰俸一月”的处分。当时，我真有生不如死之感啊！为了活命，我只得挺下去。挺呀挺呀，好不容易挺到寒假。

抗日战争胜利了。我想，生活也許会变好些。誰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只知压搾人民，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物价就一日数跳。我們小学教师发薪日期是不規定的。伪县政府財政科把款子扣发了一段时期再撥到教育科，教育科又瞞着教师，拿我們的血汗錢去做投机生意。过了几天，物价又上漲了，他們才把貨物脫手，通知我們去領薪。我們領到的鈔票，虽然票面數字依旧，然币值已非。記得在解放前夕，有一次发薪的时

候，我正臥病在床，隔了两天去領薪时，一个月的薪金只能买几包香烟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声炮响，青浦解放了。我們小学教师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政治上、經濟上都翻了身。过去被称为“坐冷板凳”的“教书匠”、“孩子王”，变成了人民教师，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尊敬。生活不但安定，而且逐步有了提高。生了病，不用說有人会替你代課，还享受公費医疗的待遇。一九五五年，我左手患严重的关节炎，不能动彈。領導上曉得后，馬上来慰問，还送我到医院去治疗。医师和护士都热心地为我治理，服药、打針、电疗，連續二十多天，終于把病治好，医药費全部报销。

想想当年我在三官堂小学教书时生病的遭遇，看看今天党和政府对我的百般关怀，我真感动得热泪盈眶。党啊，亲爱的党，要不是你，我哪能有今天啊！

我已經年逾花甲了。如果在旧社会，象我这样年紀的早就被一脚踢开了。可是，如今在新社会，党和人民不但不以我为老，反而給了我更大的信任和尊敬。在一九五六年，我被評选为江苏省优秀教师，光荣地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省优秀教师代表會議。青浦县划归上海市領導以后，一九六〇年，我又被評选为青浦县文教先进工作者，出席了上海市文教群英大会。这年暑假，市教育局和市教育工会又让我到江西庐山休养所去休养。从一九五六年到现在，我連續四次被选为青浦县人民代表、人民委

員會委員。在旧社会里被人瞧不起的“坐冷板凳”的乡村教师，今天居然也能和县的领导同志一起管理起国家大事来。这是多么叫人高兴啊！

最叫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看到了我自己的劳动成果。解放前，我們南勛小学只有一个班、三十二个学生；現在，却已經发展到三个班、一百二十个学生。解放后，我們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大多数活跃在农业第一線上，有的已当上了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有的在祖国边疆从事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捍卫祖国的战士。他們中間，有的已經參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參加了共青团，有的被評选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五好战士。每当接到他們的信，每当他們來訪問我的时候，我心中的快乐和安慰，真是难以言傳！

我已經整整做了四十一年的乡村小学教师。可是，只是解放后，我才体会到做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光荣和幸福。我虽然头发斑白了，但是，我并不感到自己老，相反的，感到自己更年輕了。我决心在党的領導下，在党的教育工作的方針的指引下，和同志們手携着手，肩并着肩，前进，再前进！

苦难的回忆

长春市京剧团演员 李筠秋

童年，谁还没有个童年呢！可是我的童年和今天的孩子们比较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每当清晨起来练功，看到我们团里的小学员在老师的亲切教导下，踢腿、下腰、吊嗓，都不由引起我对今天孩子们的羡慕，对自己童年苦难的回忆。

第一次出卖

我虽然赶上了个旧社会的尾巴，比这些孩子们仅仅早出生了二十几年，却也尝尽了那人間的辛酸滋味。人們常说：天亮之前最黑。我小的时候，正是敌伪統治最残酷的年代。那时我家住在河南开封，父亲在南徐州邮局当小职员，爷爷领着我們母女五个人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我六岁那年，河南連年閹灾荒，人們实在活不下去了。为了活命，爷爷把我們姊妹几个又送到父亲那里。灾荒之年，那些象狼一样的粮商富戶，又趁火打劫。穷

人一步一个坎。不久，父亲被裁职了，生活就更加艰难。父亲看我們姊妹几个頂数我长的机灵，便一狠心把我卖给一家姓李的当丫头。

六岁的孩子能知道什么呢？真是“买来的女，使喚的腿”，离开亲娘落到后娘手里，我真是哭不敢哭，乐不敢乐，看見人家孩子玩，我只有在一边掉眼泪。整天象个避猫鼠，人家吭一声，就把我吓的直哆嗦，总是看着人家眼色行事。一天爹媽叫个不离嘴，还是非打即罵，一有不順心的事就拿我撒气，身上的伤一块连一块。有一次，我忙活一天沒住脚，剛在外屋站着歇歇腿，李家的老太婆在屋里喊我，我动作稍慢了些，她便从床底下抽出一块劈柴柈子，一下子砍在我的头上。血立刻淌了下来，我喊声媽，就啥也不知道了。醒过来时，我捂着脑袋暗暗地喊着亲娘：“有錢人的心怎么这样狠，娘啊，你怎么不来救救我呀。”那时真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誰能可怜可怜这孤苦的孩子呢！头肿的象柳罐斗，一連几天吃不进一点东西，李家怕我死掉白花了錢，才給我买了点药治治伤口。直到現在，一阴天下雨，我脑袋上的伤疤还发痒。所以我始終記着：“我們这一代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啊！”

二次被卖

我九岁那年，李家看我沒多大用处，又把我卖给一家

姓呂的做童養媳。呂家是唱京戲的藝人，看我模樣長的不錯，干起活來也靈巧，把我买到他家，一方面是給他家做零活，一方面讓我跟他們學戲，將來會唱戲了，好變成他家的“搖錢樹”。因此，對我練功、學戲也就下了一番功夫。打戲，打戲，我是个啥也不懂的孩子，剛學戲，腿、腳、身子都硬，可是稍錯一步，就是一頓鞭子，還不准你哭。一天不知挨了多少打，身上總是帶着傷痕。賣身契象個捆身索，我連個出火氣的自由都沒有。每天當全家人還沒有起來的時候，我就得悄悄地爬起來，練功、吊嗓、倒便盆、收拾屋子。別人都起來以後，伺候人家吃飯、哄孩子、洗衣服、跑街。晚上公婆唱戲回來，再伺候他們吃飯、洗臉。一切活都干完了，別人都睡了，我才能去睡覺。我受不了折磨而想媽媽時，還得找個背人的地方偷着哭；不然，被人看見又得挨打。有一次，我挨打後，躺在被窩里偷偷地哭，在夢中看見了自己的媽媽，就哭出聲來了。婆婆發覺後就一頓狠打，打的我懵頭轉向，钻到床底下不敢出來。我是河南人，學唱時，總不免帶點河南味兒。一次我剛一張嘴唱，婆婆聽到後，就用兩根筷子插到我的嘴里，夾住我的舌頭狠勁攬起來，一邊攬一邊說：“死丫頭，我把你的舌頭攬爛了，看你能不能改這河南味兒。”舌頭被攬的真象掉了一樣，鮮血從嘴里直往外淌，好幾天連飯都不敢吃。那時候我真想死，死了離開這罪惡的世界總比活受罪強。在我十四歲那年，正式登台演戲，心里想：這回給他們掙

了錢，還了債，我總該有个出頭之日了吧！誰曾想掙了多少錢也填不滿這個無底坑。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身子骨又被他們折磨得瘦弱不堪，那次主演的戲又是《梁紅玉》，我身上扎着軟靠，“涮腰子”用力過猛，一下子沒站住就摔在台上了。狠毒的公公像餓狼似的，在我的後肩膀上，狠狠的咬了一口，當時痛的我從二樓的樓梯口，一直滾到樓底下，血把兩層衣服都濕透了。搭班演戲的師傅看我實在可憐，抹着眼淚把我扶起來說：“孩子爭口氣吧！”當時我想，離開這個家，也許就好了。豈不知天下烏鵲一般黑，那個社會把唱戲的藝人叫“戲子”，看成是“下九流”，到處受欺負，受壓迫，簡直就不把你當人看。到哪演出得先請客送禮，到處拜客，一處沒拜好就休想演戲。有些地方官吏和流氓、地痞，當面調戲侮辱你，也不敢出個大氣。有一次，我隨戲班到常德去演出，下車後還沒來及喘氣，就到處去拜客，送戲票。可是，因為忘記給國民黨某營送票，被砸了園子。

母女對面不相逢

離開親娘的孩子，遭到這樣的苦難，誰不想媽媽呢？七八年時間，我眼淚不知流了多少。十五歲那年我們來到了開封演戲。知道已經來到媽媽的身邊，我簡直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心急的象熱鍋上的螞蟻，可又不敢說。因

为我明知道，說了又得挨頓毒打，反而更看不成了。后来我偷偷地哀求看我练功的尹老师；他看我实在可怜，一狠心就答应了。但他对我說：“我帶你去，只許你看一眼，不許說一句話。”这是多么无情啊！但在我來說，已經知足了。总比近在身边看不见强啊。

在一个清早，借着“吊嗓子”的机会，尹老师偷偷地領我奔我們家走去。我就象个刚出籠的小鳥，但又被一条綫牵着往家走。到了我記憶里还殘留着的、夢里不知走过几次的家門口，我心跳的厉害。师傅假借找某某人叫开了門，出来开门的正是我的亲姐姐。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嘴張了几張，也沒敢叫一声姐姐。可是她沒看出这卖出家門、一別八年的苦妹子，只說：“沒这个人，你找錯門了。”

“沒錯呀！狠心的姐姐你怎不认我啊！”我含着泪望着她那張忧愁的臉，心里翻騰着這句話。隔着門我望見了媽媽正坐在炕上。苦难的日月，使她的头发变白了。我当时是那么緊張，心里說不出什么滋味，我站在那里連动都动不了一下，泪順着臉往下流，咬着牙不敢哭出声来。我恨不能一下迈进門去，趴到媽媽的怀里大哭一場，可我沒有这个自由。还没来得及看上第二眼，师傅就拉起我的胳膊，叫我快走，門也就格登一下关上了。我的心就象插进一把刀子，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苦命的媽媽万万也沒有想到亲生的女儿会在門外看她一眼。万恶的旧社

会，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母女对面不能相逢。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走回来的。后来公公可能从情緒上看出来了，演出合同还没有到期，就忙着带着戏班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从那以后，狠毒的公公常常威胁着我說：“你想走啊，想走也不能叫你囫囵着走，不打折了你的腿，也打断了你的胳膊，殘廢了看你还走不走！”

党救了我

一九四五年抗战結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內战，艺人们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我随着呂家到各地流动演出，給他們掙錢。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們正在宜昌演出，宜昌解放了。因为我当时已經是个主角了，呂家看我是块肉，想带我往当时未解放的重庆跑。沒等实现，这个戏班就在部队領導的动员和教育下全部参軍了，变成一支部队文工团。从此，我算脱离了苦海，获得了新生。参加部队不久，呂家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叫我退出剧团，繼續为他們卖命。部队的領導和同志們，关心我們都象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当时还是供給制，生活水平比較低，我也不願意离开这溫暖的革命大家庭。后来在部队首长和同志們的教育帮助下，我的觉悟逐步地提高了，懂得了十四年的生离死別，都是旧社会的不合理制度所造成的。

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在組織的帮助下，正式和呂家脱离了关系，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并恢复了“李筠秋”这个名字。沒有共产党，我这无边的苦难哪能結束呢！不久組織上給了我二十六天探亲假，我回到了开封老家，一家人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团聚了。媽媽一边流着泪一边說：“沒有党和毛主席，我的姑娘一輩子也不会回来！”亲戚朋友們，也都象办喜事一样来看我，所有的人那个高兴勁，我就是用三張嘴也形容不出来。回家后我才知道，父亲被生活所迫，在我第二次被卖不久，也去給別人家頂劳工去了。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不久就死了。家里只有母亲、哥哥、姐姐、弟弟，但是他們生活得很好。哥哥、姐姐、弟弟都有了工作。我想若是不解放，这孤儿寡母，就是要飯也找不上門。現在，我还常常接到媽媽的来信，她老人家总是告訴我：“要好好工作，听党的話，我今天的幸福，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給的，孩子，千万不能忘本哪！”媽媽說的很对，党不仅給了我幸福生活，更主要的是給了我新的生命。演戏再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革命为人民服务。在党的教育下，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今后只有老老实实地听党的話，坚决貫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把我整个一生，献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陈英杰整理

科学工作者的苦和甜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黄耀曾

一九三四年，我快大学毕业了，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想到大学毕了业，可以做一番事业，不禁感到意气轩昂；另一方面，那时的社会，“毕业即失业”，不禁感到前途茫茫。毕业时总算幸运，凑巧指导我做毕业论文的庄长恭老师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由他介绍，我进入中央研究院。心想，只要自己努力，就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做一番事业了。

谁知跨进中央研究院大门以后，就不得不对我那原先的“做一番事业”的想法怀疑起来。研究院的人员、经费都紧得要命，有些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当时我担任的是有机微量分析和有机合成研究。根据实践经验和按照国外文献报道，夏天做微量分析，室内应该用冷气机降温，否则往往得不到可靠的結果。可是，我们的实验室內，却连一架电风扇也没有。我想，要添置冷气机办不到，但添一架电风扇总还可以吧！谁知我提出了添置电风扇的要求以后，一天，一位负责人跑来声色俱厉地对我

說：“經費有限，將就點吧！”我除了擔負微量分析以外，還擔任有機合成的研究。可是却沒有一個輔助人員。一次我請求所方招請一位輔助人員，由我訓練做日常的例行分析。結果，又是“編制有限，將就點吧！”

一九三七年，我因病回家鄉休養。芦溝橋事變發生了。院里下達了一紙緊急公文，凡不在上海的人員一律停薪留職。過了些時候，我趕回上海；可是，研究院已經遷往昆明。當時，我對內地的研究工作情況還很不了解，曾考慮帶病到昆明去復職。正在這時，同學高怡生由重慶來信，訴說他在內地顛沛流離不能施展所長的苦悶。接着，他又來信說：同學羅永銳到达內地以後，郁郁不得志，又為生活所迫，竟投江自杀了。羅永銳的身世，正是當年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青年科學工作者的寫照呵！我會含着眼淚填了一首〔漁家傲〕挽他，其中半闋是：

自古男兒氣有志，而今有志酬無計。含恨毋寧
身玉碎。長已矣，可憐熱血隨波逝！

想想高怡生的處境，想想羅永銳的遭遇，我打消了去昆明的念頭。我在上海困居了一個時期以後，經友人介紹，到上海醫學院教了幾年書。我的理想是要在有機化學方面研究出一些成果，所以在教書期間也曾拼湊了一些儀器藥品，做些研究。可是不但得不到支持，還要看學校事務先生的臉色。他一看到我們做研究，就說我們耗

費了学校的水电煤气，噜噜不已。在这种条件下，我哪能做出什么出色的成果呢？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事爆发了，上海医学院停办。我又失业了。后来有一位朋友的亲戚（資本家），拟出資創办一个研究所，要我襄助。当然，做研究工作，是我“心向往焉”的宿願。因此，听了这话，电影故事片中欧立希发明“六〇六”的一个个镜头，又重新浮現在我眼前。欧立希想应用有机砷化合物治疗梅毒遭到許多朋友的白眼，凑巧一个資本家資助了他，終于发明了“六〇六”。我想，我是否也会碰到象这部电影中那样“好心”的資本家呢？一天，我来到这个研究所筹备处。进去一看，我的心就冷了半截。这里除了几間灰尘堆积的破厂房外，什么也沒有。我把几間空屋打扫干淨以后，約期和这个資本家面談。隔了一个月他才同我談了一次話。从他的談吐中可以看出他关心的是如何可以获得高额利潤的化工原料的小型生产和药品配方；至于科学的研究，他并不感到兴趣。“研究所”的招牌挂出来了，資本家的真面目也露出来了。他关心的只是哪样药物合成可赚多少錢，对工人的死活，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当我看到工人把很容易燃燒的有机化合物装到玻璃瓶里去，放在煤球炉上加热时，我真急坏了。我警告这个資本家說，这样做要发生严重的事故的，要求他尽快找一所有煤气設備的房屋，或是裝置安全設備。他置之不理。果然不久，一个工人因为鍋炉

爆炸受了重伤。我在气愤之下，便离开了这个“研究所”。在我离开这个研究所不久，又听说这个资本家创办的另一个小厂发生了爆炸事故，一次死了三个人！

我第四次失业的时候，又听说另一个资本家也要创办一个研究所。这个资本家见我年轻，穿著朴素，便录用了我。这个资本家的“研究所”是专门搞合成药物的小型生产的，房子小，设备简陋不堪，很不安全。看看这种情景，我劝这个资本家另找房子，改进设备条件。哪知，他很狡猾：为了利用我的技术，为他攫取利润，他装出很有远见的样子，满口答应我的要求，并且叫一个副经理出去找房子，还要我陪着他一起去。这个副经理三日两日陪着我坐了三轮车出去看房子，前后看了二十多处，都说不理想。一次，在一家殡仪馆隔壁找到了一幢合式的房子。回到所里和那个资本家一谈，他冷冷地说：“好是好，可惜隔壁是个殡仪馆，以后要顶出去啥人要呢？”至此，我才如梦初醒：啊，他要我陪副经理找房子，是在骗我！把科学事业寄托在资本家身上，本来是一个荒唐的幻想，这种幻想终于在冷酷的事实面前，象肥皂泡那样很快地破灭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费了一些周折，我总算回到了前中央研究院来。这时的中央研究院比过去还要糟。化学研究所全所人员包括工友在内，只有二十多人；我是个副研究员，却连个辅助人员也没有。仪器药品吧，只能挖库存；要新添没有经费。当时研究人员的研究题目是怎样

确定的呢？先到药品庫房中去看，有什么药品，就定什么研究題目。一次，我好容易从灰尘堆积的庫房里发现了一瓶氯基醋酸酯和几种醇，喜不自胜，定下了研究題目。但要进行研究，还缺少一百多克的桂皮酸。怎么办？便鼓足勇气向办公室申請购买。謝天謝地，这次总算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據說一个月的經費就此全部用完了。堂堂的中央研究院，为啥这样穷？誰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办研究院不过是挂块牌子裝装門面，它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当时，研究人員都掙扎在饥饿線上，牛衣对泣，朝不保夕，还談什么研究工作呢？我抑郁終日，逐渐消瘦，终于又病倒了。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下，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有真才实学，也沒有用武之地。那时，噩耗一个接着一个地傳来。又一位同学汪盛年自杀了。汪盛年原来是学物理化学的，后来又学冶金。抗战胜利后，他怀着一股热情，从海外归来，准备为国效力，进入了国民党軍事委員会的一个机构。进去以后，才发现自己上了当。他眼看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罪恶行为，忧憤交集，一切理想付諸东流，終於被迫自杀。他的死，是对旧社会的控訴啊！他的死，曾引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同事們无限的震惊和同情。我也會写了一首挽詩挽他：

前年罗子沉江歿，

今日聞君又自裁。
忍見故人投鬼籙，
可怜金劍沒蒿萊。
秋風瑟瑟玄云惡，
長夜漫漫百感哀。
搔首問天天不語，
佇看雲散月華升。

烏云驅散了，陽光普照大地。解放後，科學事業逐年發展。研究人員不是成倍地發展，而是幾十倍地增長；經費的增加不是幾十倍而是几百倍、几千倍乃至幾萬倍。回想起過去的科學事業和科學工作者的遭遇，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了。

值得提起的是：過去的研究院，有人比之為“花瓶”，擺擺樣子的；有人認為還不如花瓶，因為花瓶里的花，還得有人及時護持它。解放前的科學，有誰來維護呢？科學工作者有誰來培育呢？相反地，却受到不斷的摧殘。還值得提起的是解放前的有些研究工作，有人比之為根生在鄰人院子里的紫藤，縱然有幾朵花長入自己的庭園，但畢竟是無根之木。單就解放前研究工作中所用的藥品來說吧，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仰賴國外進口，即使搞出了一些成果，對發展自己的科學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解放後，特別在一九五八年以後，祖國的科學事業有

了巨大的发展。它已不是根生在人家院子里的紫藤花，而是一棵植根在自己土地上的万古长青的松柏。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祖国的科学事业才能得到发展。至于我自己，也只有在党的教育下，才能做出一些成績。在党的教育下，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开始担任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說也奇怪，过去我常常生病，解放后身体却变得结实起来。撫今追昔，感慨万状，填了一首〔浪淘沙〕作为本文的結束語：

忆苦复思甜，忍話科研。当年寥落有誰怜？更著狂風和暴雨，历尽摧殘！
春到百花妍，美景空前。好将心血赴辛艰，众志成城收硕果，紅遍入間！

旧 恨

——老运动员黃亨的叙述

承 志

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排球联赛结束之后，来自祖国各个角落的运动员，成群结伴，像大家庭里的亲姊妹亲兄弟，有说有笑地到西湖上去游览。适值初夏时令，大家泛舟湖上，桨声笑语，使得恬静的西湖一时间变得活泼热闹了。我们那条船上，有几个初次参加全国比赛的年轻人，纵情地唱起歌来。年近四十的教练黄亨同志，也随声应和。他笑容可掬，白衬衫的领子略略敞开，袖子卷持在两只肌肉饱满的胳膊上，显出刚劲强壮的姿态。唱完了歌，大家开始闲谈，黄亨同志不禁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正生活在天堂里啊！在从前那个世道，穷人出来比赛，苦头吃不了还兜着走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感叹，也许是年轻人对黄教练的敬重，大家要求黄教练叙叙他的过去。在年轻人的频频催促下，黄亨同志经过一会思索，便开始叙谈起来。

一九四八年岁末，我在家乡广东台山做散工。一天

傍晚，我在村边树底下照例用几块磚石搭成“炉子”，生火做飯。——因无家，劳动下来沒現成飯吃，得自己动手做。这天的晚飯，依然是稀粥和咸菜。正吃的当儿，忽有人来叫我即刻到“余財主”家去一趟。我心里不禁一怔。呀，这个所謂財主就是有錢有勢的地主和奸商，又是专橫一方的把头。他同我有何相干？他找穷人哪有什么好事？我疑虑重重，寻思着去呢，还是不去。然而来人在等着我，不去不行呀！

我在蒼茫暮色中跨进余宅的大門。大腹便便的財主从堂后走出来，肥嘟嚕的臉上亮光光地发笑，八字胡子在两嘴岔上展开了翅膀，豎起一只大拇指，劈头就說：“黃亨呀，你的球技呱呱叫，唔，硬是呱呱叫！”頓了一下，装出了关心之至的神情，又滔滔地說：“你有如此出众的球技，應該受到抬举，絕不能被埋沒。眼下有个絕好的机会。余氏决心組織一个球队，远征香港，特請你来参加，让你‘英雄有用武之地’。……至于来去一切費用，均由我余某包下，你尽可放心。另外，在港比賽的門票收入，客队也得一半。除去所花費用，余下的悉数归你們队员。”

我躊躇着。余財主旋即又許諾：“你若願意的話，还可給你在香港安插一个工作。”停停，他趋近我，附耳低語：“听说，你原来那个东家，不肯饒恕你，不久要来收拾你呢！……”

我的心弦一下繃紧了，想起原先那个狠心狗肺的东

家，我觉着像猫抓心窝，搅痛和烦躁不安。

在这里我得先讲讲我的家史，讲讲原先那个东家是哪号子人，讲讲我是怎样打排球的。

爸在我四岁上就永別了我們，他在我記憶里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而且漸漸地淡忘了。媽的性子可剛強，总想凭双手掙出个好日子来。一个女人家种地主的几亩薄田，要养活我、我的姊姊、弟弟、爷爷和奶奶。然而殘酷无情的現實，使媽的梦想破灭了。肩上越負越多的賬債，簡直把媽都压扁了。一年冬天，地主上門逼債，逼得媽走投无路，連急带气，一股气火攻心，就气死了。臨死的时候，我們圍在媽床前垂倒了头嗚咽地哭。媽舍不得自己的儿女，舍不得自己的家，用哭干了泪的眼睛，向我們投了最后的一瞥，又用干癟的手拉拉我，泣不成声地說：“我的，好孩子呵！……媽管不得，你們了。媽，吃了，一世苦，沒苦出头。記着，媽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才十四岁，这第一顆仇恨的种子便落进了我的心田里；同时，全家生活的重担和賬債也落到我的肩上。我年岁虽小，心上却已感到从祖輩以来的、深重的忧愁和不幸。不过，我抱有还清賬債、兴家立业的幻想，因而繼續租下地主的几亩地，独立地开始了耕耘播种的庄稼汉生活。我和只大我一岁的姊姊，拼命干了一年。在最繁忙的夏季，我从地里回来，有几次吃飯中間一瞌睡，碗就掉在地上打碎了；有时从水稻田泥脚泥手爬出来，躺在

树荫下青草上，像瘫痪了一般，无力回家。我担心成熟的稻子被人偷去，通宵在田边树底下睡觉。无情的蚊子把我的臉、腿和胳膊都叮肿了。但我吃得来苦头，总是一声不吭。我左盼右盼，盼望稻子成熟出場，让年迈的爷爷奶奶脸上也有个笑容。

到了秋收时节，地主派狗腿子来守候着，收一粒拿一粒。白发满头、瘦骨嶙峋的奶奶，拄着椴木棍站起来，弯着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放声大哭，绝望地嚷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姊姊和弟弟见奶奶痛哭，跟着大声嚎叫，变成了个泪人。风烛残年、卧床不起的爷爷，也不能控制自己了，瘋癲了一般抬起半截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你们，干脆，拿刀把我，这条老命，杀了算哩！”说着就一头栽到枕上，难受得哼唧唧。合家老哭小嚎，送殯似地送走了全部谷子。哭声象刀子戳着我的心窝。我捏紧两只拳头撑在腰上，横眉瞪眼，在一边听着看着，气呀，急呀，仿佛照脑门被掄了一棍，半天没说一句话。

这个比狐狸还狡猾的地主，眼看我种不成地，把田收回去了，借口賬債未清，逼着我到他家去熬小长工。姊姊被迫出嫁，弟弟出外跟修鍋子的拉風箱。

我給地主家泥里水里熬了一年，只得一担谷子送回家供养爷爷奶奶。两位老人就像油干灯草尽一般在饥馑疾病中过世了。我只能向东家借錢来葬送老人。东家要我白干三年活，并且立了一契，目不識丁的我，只听代笔

人念了一遍，痛心地在契上画了押。从此以后，我整年累月，身无分文；吃的是霉米、咸菜，逢年过节有一点臭咸鱼，就算是东家“款待”的葷腥了。我长年苦熬，骨瘦如柴。水田里可恶的蝎子叮烂了我的脚，因无钱治疗，越烂越凶。我用破布包着伤口下地，被浊水泡，被泥块擦，被草根刺，就一剜一剜地痛，我只能慢慢地干活。但刻薄无情的地主竟臉色铁板地对我說：“你这小賊子，像耗子一样吃我的米，契上的墨水未干，你就尽磨洋工，当心我收你的骨头！”我平素不大說話，但赶在这节骨眼上，也就作声了；但只說了一两句，地主就恶狠狠地往我嘴边打了一巴掌，罵道：“小賊子，你敢回嘴，我抽死你！”我只得忍气吞声。后来，幸亏有好心的庄稼人告訴了我一个草药方。我按照旁人的囑咐，把草剝烂了縛在伤口上，慢慢地把脚伤治好了。

到第三年，有一天我去玩了一会儿排球。地主得知了，嚴打我，又咒罵我：“你这小賊子，耗子一样吃我的米，人不象人，也去打球，閻王沒給你这份福气！”我心想，“我气死半地帮你干活，你不給我一点歇歇？”但我还是只能把怨气埋在心窝里。夏天，地主半夜里逼着我披星星戴月亮到田里苦干。我整天不得休息，四肢无力，缺乏睡眠的眼睛蒙着血絲，犁田时跟在牲口背后踉踉蹌蹌。狗腿子在田边监督我，用鞭子抽我。人不是铁打的，怎能天长日久地过度劳累和遭这毒打！我終于病倒了。地主只給

我一天吃两顿稀粥，却要作为我新欠的賬債。病愈之后，地主再次逼我立了一張白干两年活的契約，以抵偿臥病期間欠下的这笔新債。我含辛茹苦帮地主白干了整整五年，一无所得，只有一个皮包骨头的身子。但我年增智长了，开始感到辮子被抓在地主手里，干一辈子也无出头之日，于是想逃出牢籠。这个念头在我心里萦繞了几日，終於对地主讲明了。

我說：“你歇了我吧，我干不动了。”

地主瞪眼回答：“不行，你还欠我兩担谷子呢！”

“我干了五年，什么也沒有，你还要我干？”

“你要歇，就得把債還清。”

我忿忿然寻思着：欠地主这笔糊塗賬，永生永世也還不清；好吧，你不答应，逼着我上梁山。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当夜便逃出这个魔窟，到他乡落下脚来。为了躲避地主追究，我居无定址，专做散工度日。我整天苦苦劳作，无家可归。在号称“排球之乡”的台山，庄稼汉农閑时节也爱玩玩排球。我有工夫就和衣衫褴褛的散工們一块打玩。这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娱乐；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臉上才出現笑容，暂时舒散一下心头的怨悶，胸腔里会觉得寬敞一些。提起我們穷庄稼汉打排球，真是可怜哪！讓你們現在看見了，也許会笑破肚皮。什么球呀？是用紙头烂布做成的团团。什么球网呀？是用几根草绳子編起來的。荒坡草地，就是我們的球場。后来为了提高技术，每

人出几角錢，购置了球和球网。有时候做完工，太阳还有一竿高，我們几个无家可归的穷光棍，便拿着球在草地上玩弄起来。玩着玩着，累得球也傳不动了，才肯歇手。我的球技在同伴中漸漸地显露了头角。这一节，起先我是根本不觉得的，直到邻鎮邻村每每有人叫我去帮助比賽，我这才意識到自己的技术有了一点儿“名堂”。但我被人叫去比賽，几乎沒有一次不被人侮辱。

一次，我代表“三埠队”同“启信队”爭奪冠軍。比賽至第五局，“启信”見形势于己不利，扣球时故意摔倒，趁勢用脚在网下对我猛踩，結果我的脚腕被踩伤了。这还算小事。有次我被一个小学叫去参加“三合杯”決賽，对手在比賽之前下了賭注，揚言必胜。結果却被那个小学打敗了。我回来时，在半路上被一帮人截住。他們朝我破口大罵，拳头脚尖往我身上打来。我整整痛了半月，推車推不动，耕田也耕不快。隔了一年，毆打我的那一帮人，却要我去帮助比賽，然而暗示：我若不去，莫怪他們手下无情；同时我又得到另一伙人的警告：如果我去帮忙，当心骨头打断！我見情况不妙，偷偷地远避了他們。

至此，我不得不冷靜地想想了——我打球原是为了快乐，現在却为这挨打遭罵，伤透脑筋，何苦呢；我是靠勞力換飯吃的，身体負了伤，不能做活，便得餓肚子；同时我一年比一年大了，也还想成家立业，总不能老是混混糊糊过日子。于是，打定了主意不再參加比賽。……

可是，哪料到余財主又会来找我到香港去打球？哪料到原先那个东家又要来收拾我呢？当时，我在余財主面前竭力保持不动声色，心里可直叫苦：生活呀，生活呀！你为什么总給穷人出难题呢？我想，我在台山已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沒有出头之日了。我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赶东奔西，从这村到那村，从此乡到彼乡，从当长工到做散工，死干活干，如牛馬一般地吃了多少年的苦楚，受了多少人的欺侮，結果只落下个一无所有，头頂人家灭，脚踏人家地，沒家沒眷，稀粥或菜填塞肚子，勉强图个不死。我滿腹愁緒，严酷的生活逼迫我不得不考慮和抉擇。我心里一橫：干脆到外面去闖蕩，离开这个仇气地方。我便把胸膛一挺，对余財主說：“我去，跟你們去！”

球队搭輪船到了香港，被安置在“陸海空飯店”。当晚，在港的一位余總經理（余氏族里的头目）請我們吃飯。

余財主把他向大家作了介紹后，他就双手一拱說：

“諸位遠道來港，辛苦了，辛苦了！”

各就各位坐定之后，總經理首先起立祝酒：

“諸位，來來來，同下一杯，預祝馬到成功，節節勝利，為余氏光宗耀祖。”

他开始傲然地举目环視，最后定睛看我，目光咄咄逼人，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在这群人里，独我一个农民，穿著和舉止帶有乡村土气。而剛來的这批人，海派洋气，自

然不必說，即便其他隊員，也都是富貴子弟。我夾在裏面，氣氛極不和諧。總經理飛快地向余財主使個眼色，財主微微一笑，向對方附耳低語。總經理稍微頷首，唔唔几聲，頓作笑容，揚眉睜眼對我說：“喂，你要好好打，打勝了，有賞有賞！”

次日黃昏時分，我們來到鬧市中心一個露天球場。高高的洋灰看台上，觀眾已經密密层层。入場前，余財主給我們穿了印有“武溪”字樣的運動服，並再三叮囑我，“小伙子，好好干，打贏了球，你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裁判員的哨子吹響了。對手“港聯隊”發球。我振作精神，兩眼盯着球，準備作幾次漂亮的扣殺。球剛好飛到我頭上，我把它輕輕托給了同伴，同伴又把球傳給我。我疾速跳起，掄臂狠狠一劈，打響了第一炮。我也沒料到，一開頭就會打得那麼好。

我隊勝利在望的時候，對方發了一個又急又猛的球。球觸同伴的手向場外急飛，徑直飛到看台附近。我一陣快步沖去，躍身伸臂，全力一擊，把球救了回來。可是我歪倒在地，左腳膝部負傷了。但我忍痛堅持，直至最後一球勝利定局。

散場的時候，我緩步而行，剛跨進休息室，聽說有人在外面找我，踅身出去一看，是位中年男子。

“你還認得我嗎？”那人熱情地同我握手。

我定睛端詳他，一時竟認不出來。不待我開口，那人

情不自禁地說出了自己的姓名：“黃除漢。”

我終於記起來了。他是我的同鄉，也是同村，而且是隔了几房的堂兄。他已离家多年，現在如此蒼老而消瘦，簡直判若兩人，只是他的乡音无改，眉眼依旧，才引起了我久远的記憶。彼此略叙近况，他又少不得評贊我几句，因時間已晚，便匆匆分手了。

我在休息室坐了片刻，輕撫自己的膝头，一面思量：總經理、余財主他們會來問候我嗎？可是同伴們陸續離去了，我也只得動身回“陸海空飯店”。

當夜我膝痛失眠，到凌晨五点钟才矇矓入睡。然而不久便瞿然醒來，又覺着膝头的隱痛了。我想，該去請大夫治治。然而，我身無分文。不是說比賽後有錢分嗎？我急等着這筆錢到手。九点钟早餐時，一個同伴塞給我一疊鈔票，悄聲地說：“喏，二十塊，分給你的。”我心里涼了一截，聽說總共收入兩萬多塊港幣，為何只給我这么一點，這點錢能管什麼用？要是回家，乘船買半票還不夠呢！

“就這一點？”我問那同伴。

“你要多少？”同伴冷冷反問一句，撇開了我。

我权且把錢收下，心想治傷要緊，然后再去找余財主或總經理。我到就近一家私人診所，打了針，貼了傷膏，又拿了些內服藥。二十元花掉了一大半。回到“陸海空飯店”，不見同伴們的踪影。我走進自己房間，把几片藥

卷下肚子，歪臥床上，想閉眼養一會神。忽聽輕輕的敲門聲。我側耳細聽：莫非是余財主他們來探望我了，給我辦私事來了？“我就來！”我應聲叫着，一面走至門邊。可是，開門進來的，既非財主也非經理，而是一位白衣茶房。

“客人，請你走吧，這裡不能住了。”

“為什麼？”我感到莫名其妙。

“余先生結過賬了。”

這使我很失望、氣惱而且擔心。我向茶房說明我眼下無家可歸的情況。

“你要住下去，你得先去賬房那裡交費。”

我請求茶房容我考慮一會。這房間我半天也住不起。離開吧，形单影只，舉目無親。投到哪裏去？

“你究竟怎麼辦？”茶房見我躊躇，又逼問。

“這裡住不起，可又沒處住呀！”

“住大街唄！”

一句話一根針子戳痛了我的心。出來打球，還要我和乞丐一樣住大街，豈有此理！我決定即刻去找余財主面談，但不知他在何處；我想向同伴打听，他們又一個個消聲匿迹，不知去向了（他們在香港都是有靠山的）；若是乘船回家，一張船票四十余元，哪裏有錢？我左思右想，騎虎難下，只得離開旅館，暫時投宿到偶然相逢的黃除漢家里去。

那是个狹窄矮小的窮裁縫鋪子。擺着的若干辆縫紉

机，占去了除灶房以外的整个地盘。黃除汉只不过是伙計，寄居在此的。我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陈述了一遍，黃除汉叹气說：“阿弟呀，我說句真心話，世上的事情，你还懂得太少。不能太相信有錢人。但事到如今，着急也无用，在这里住几天再說吧。”

店主人也是台山人，同意我住下，夜間打个地鋪，一天亮就得卷起来。我决定去找總經理，請他代为安插一个小小的足以糊口的工作。黃除汉和店主人同意我作一番嘗試，并且告訴我如何去的路線。我沒錢坐車，慢慢地走着去。正午到那里，見是个高楼大厦的百貨商店，商品琳琅滿目。我向柜台上一位伙計說明了来意。他冰冷地回答：“總經理出去玩了。”第二天我在曉色朦朧中又赶了去，我第一个进门，仍旧問那位伙計，他不加思索地脫口回答：“經理一早去茶樓喝茶啦！”晚上他总該回来睡觉吧，我决定作第三次嘗試。不料那伙計一見我，便拉长了臉，說：“怎么搞的？你又來啦！經理不在家，你走开！”他像回复乞丐一般地对付我。我完全明白了，經理肯定就在里面！呸！混賬东西！我心里憤憤地真想闖进去，一把抓住这老滑头，打他几个响亮的耳光。

我心里憋着一股窝囊气回到鋪子里。黃除汉又对我說了句寬慰的話：“不要急嘛，就吃我們的吧！”

从这天下午起，我在街头百无聊賴地徘徊。虽则冬日，南国的午时的太阳依旧是热烘烘的。嘈杂的人声、車

辆的奔驰声、汽笛的怒吼声、恼人的爵士音乐和缠绵悱恻的黄色歌曲，在市区里乱纷纷混成一片。我感到空气窒人呼吸，心头纳闷和烦躁。这儿是什么世界？简直是满街豺狼。余财主、余经理他们就属这一类。我在台山还能给人家做苦工，而现在苦工也不由我做，恐怕只有一条路——饿死街头。一阵腹中饥饿的响声，使我昏昏悠悠，嘴里酸苦，我颓然坐到路旁石头上，手托下巴，合眼养神。这时我只有一个“吃”的念头了。但我口袋里和肚子里一样空，没有什么可以换得充饥的食品。虽身处闹市，我却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如同漂流在荒岛上，四周荒坡野草，灭绝人烟，不能求人救助。啊！这果真是鬼门关！我一刻也不能逗留在这里。这时，我恍然明白了：奸商资本家欺侮人剥削人这一点和地主一样可恶，我这样的穷汉，无论到哪里也一样被人欺压呵！我沉思来，沉思去，不如回台山做散工熬日子好呢。黄除汉他们见我实在可怜，东拼西凑，筹借了船票钱，让我回了台山。

不多时日，台山在喧天的锣鼓声中解放了。解放后的我，彻底地翻了身，而且翻得如此之快，简直意想不到。党领导着人民用巨手砸破了铁笼。但这不是梦，而是活龙活现的现实。自一九五〇年起，从县里到省里，由省里到大区，由大区到全国，一层层选拔我，一层层栽培我；不足一年，我便成为国家排球队的一员，而且组织上信托我当了队长。想想看，这是多么大的飞快的变化！若说我

在技术上有一点儿造詣，那么，說句真心話，也只是在这几年练就的；至于以往的技术，回过头来看，简直不算回事。

更使我感动的是一九五一年全国比賽后，周总理接見我們。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語重心长地勉励我。我細細体味，这不多几句話里包含着多大的哲理和多大的期望呀。同年，我又到了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从世界各个角落来的青年男女，尽管肤色不一样，語言不一样，服装不一样，但他們全都热情地邀我一起跳舞唱歌。那时的我，脚不会跳舞，口不会唱歌，但情不可却，只得跟着乱跳，瞎唱。他們又拥抱我，亲我，在我耳边上咕噜着我不懂的話語。不过，我却能听懂人們口口声声欢呼的一句話：“中国！中国！毛澤东！毛澤东！”在这人世間欢乐的海洋中，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凄惶日子来了，我的泪珠揩了又流，流了又揩，不断綫地流着。呀，今天的生活多有意思啊！太阳多紅啊！天多藍啊！人們多可亲啊！我觉得自己真正做了人，而且是值得自豪的毛澤东时代的中国人啊！

多亏党的撫育，我在一九五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懂得了自己是个什么人。我从前受人欺侮，这不是个人問題，这是阶级仇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沒有全中国的解放，哪有我黃亨个人的解放！党，教导我們：不能忘記阶级斗争，不能忘記阶级仇恨。每次出差回家，看到

我的孩子欢蹦欢呼，满脸幸福的稚气，我就想起我过去牛馬般受苦受难的年月，觉得自己有責任奋发工作。如今的年輕運動員啊，像小老虎一般，有股上天入地的勁头；鍛煉的条件样样齐全，要什么有什么。他們簡直幸福得无忧无慮，可就是不懂得旧社会是怎么回事，不懂得地主、資本家如何殘暴和过去劳苦大众如何受尽苦难，所以还有人有时嫌这个，有时怨那样。我要真心实意地奉劝他們一句：好好接受阶级教育吧，提高阶级觉悟，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船儿在不知不觉中靠近了“花港观魚”。黃亨同志不发言了。大家眼睜睜瞧着他，凝神深思。我也这么想：黃亨同志所走过的道路，其实也是許許多从旧世界熬煎出来的人所走过的类似的道路。今天的青年人呀，年轻的運動員呀，應該知道这条路，从中得到启示。